

雅集

贰

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副主编:	特约编审:	主编:		编委:	副主任:	主任:	编辑委员会	
	潘庆磊 吉强	魏方 张金凤 潘国政	杜恒 陈思	贾梦玮	彭慧	杜恒 张思东 朱浩	杨传林 张美云 陈童	唐旭明 黎玉林 彭慧	周和平	



主管主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中华文化学院

编辑出版：《雅集》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210007

网址：<http://www.jssy.org.cn>

电子邮箱：yajiji@163.com

电话：025-84287241

传真：025-84287243

封面题字：徐邦达

装帧设计：朱赢椿

杨杰芳

印刷：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出准印（2011）字 JSE—0003036 号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C O N T E N T S

本刊特稿

- 弘扬统战文化 推动文化发展 / 罗一民 / 001
- 新教育的文化使命 / 朱永新 / 004

历史遗韵·辛亥百年

- 辛亥革命时的南京 / 叶兆言 / 009
- “百年辛亥”在美国 / 殷志强 / 015

文苑菁华

- 《推拿》创作谈 / 毕飞宇 / 021
- 人生就是一次次偶然 / 黄蓓佳 / 023

文化论坛

- 当代中西文化差异的多重性 / 邵 军 / 025
- 呼唤文化通才的涌现 / 朱辉军 / 028
- 钻天洞庭遍地徽——苏商文化精神透视之二 / 吴跃农 / 032

艺术人生

- 朱墨写春山 但开风气先——朱屺瞻先生山水册页赏析 / 沙 洲 / 039
- 多重的身份 多维的成就——谈我认识的艺术家庄晖荣教授 / 刘大为 / 044
- 古法塑孔子 / 吴为山 / 048
- 今月曾经照古人 / 谢 舒 / 051

艺术立场

乐者，天地之和也 / 叶小文 / 059

关于《富春山居图》的思考 / 萧平 / 061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 孙晓云 / 066

南京傅抱石纪念馆札记 / 薛亮 / 069

传统文化

诗书琴剑：古里的记忆密码 / 徐雁 / 072

紫气飞扬 / 徐风 / 077

人物春秋

挑尽孤灯孤雁诉 莲心不抵人心苦——谈“情圣”词宗唐圭璋 / 赵普光 / 082

“叫回我惊散的唐魂汉魄”——余光中先生初归南京纪行 / 胡有清 / 089

哲人钱钟韩 / 封志成 / 095

此岸彼岸

南京的教堂 / 贾梦玮 / 100

佛光禅行 / 范文丽 / 108

海外传真

为何又是“最后一个”——张充和在美国 / 王尧 / 112

红场也相思 / 吴昊 / 115

埃菲尔铁塔与匈奴王 / 申赋渔 / 120

企业文化

矗立在美丽金鸡湖畔的东方之门 / 乾宁 / 124

生正逢时——关于《雅集》之二 / 周和平 / 126

弘扬统战文化 推动文化发展

III 罗一民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

加强文化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的资源优势，求同存异的思想基础，领域广泛的多元文化底蕴，其价值取向、社会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工作方式等，能为文化建设提供独特的贡献，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促进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中的软实力

思想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在文化领域具有基础性、方向性、引领性作用，可以说是软实力中的软实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统一战线服务文化建设应首先从促进思想道德建设入手。

通过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理论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统一战线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起，就开始产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理，在九十年的党及其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历程中，统一战线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从统一战线作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到建立海内外两个范围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从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确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提出“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无不体现着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统一战线思想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富有独特性、创造性、突破性发展的重要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应该在开展新的实践探索的同时，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推进统一战线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境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弘扬统一战线文化，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以“和”“合”思想为核心的统战文化是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政治文化，是统一

战线这个最广泛政治联盟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准则。这其中包含着许多道德文化的因素，如多党合作中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族关系中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宗教文化中的与人为善、爱好和平，阶层关系中的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海外联谊中的寻根祭祖、心向故国，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重视统战文化的建设，不断完善创新统一战线文化，以统战文化建设的成果来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通过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和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保证、精神支撑、道德基础和社会风尚，也事关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统一战线高举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近年来，在中央统战部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根据统一战线成员不同的思想实际，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与行活动，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今后，要进一步深化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发挥统一战线特有资源优势，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文化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人，作为人才库、智囊团的统一战线，

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界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培养一大批文化领域创新型、复合型、外向型、科技型的人才。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广大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不断创新、丰富文化的载体，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精品来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实力。

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作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参政议政的政治优势，做好挚友和诤友，是民主党派的重要功能。要积极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围绕文化建设中发展方针政策的制定、路径方式的选择等深入实际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引导他们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改革创新与发展繁荣等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要注意发挥其联系广泛的优势，加大培养和引进文化人才的力度，加强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利用其组织资源优势，通过“同心行动”等主题活动，深入老少边穷和中西部地区开展经济、教育、法律、医卫、文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文化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增强文化的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作为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部门，统战系统应积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和投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配合有关部门抓紧制定非公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关

政策和法规，努力形成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新格局，从而汇聚强大合力，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建设共同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

所谓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归属地和栖息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就在于有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并深深融入民族灵魂和血脉之中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世界上几千年来唯一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凝聚力。统一战线作为广泛的政治联盟，其特有的大团结大联合的目标宗旨，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功能优势，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

包含差异、增进共识，增强中华民族的政治凝聚力。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政治凝聚力，作为最广泛政治联盟的统一战线，其成员在思想文化、价值追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着不同的取向，但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振兴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要努力加强政治协调，不断扩大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增强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大中华文化圈。所谓民族文化认同，就是以中华文化为内涵的民族自我认同、自我肯定以及自我凝聚，在历史发展中，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逐渐形成了一个发源于中国、传播于四海的中华文化圈。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切入点，构建大中华文化圈，对于增强民族归属感和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球华人来说，其种族血统、文化根基、民族感情，都存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罗一民

在着共同点，所谓同宗同文，指的就是都属于同一个民族，都崇尚和认同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优秀成分。统一战线要不断拓展自身的工作领域，努力挖掘、整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统战功能，为构建大中华文化圈、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而显现“法宝”的新作用。

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其民族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文化发展速度却明显滞后，文化影响力也亟待提高。我们要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人才优势和工作平台，在不断培育、发展、传播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要努力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努力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从而以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的繁荣和昌盛。

新教育的文化使命

III 朱永新

全国人大常委会、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涂尔干在谈到欧洲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演进时说，“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重新理解。也就是说，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于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这个传承不是全盘的，而是选择的，是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一番审视、选择和编纂之后，才纳入“以文化人”的教育体系中的。而这里所谓“成熟”的思想文化，是指由系统的知识、思想观念、价值信仰和思维方式等构成的文化体系。

根据涂尔干的“选编”理论，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这样的“选编”，其实就为每一个时代的教育打上了特定的文化烙印，也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涂上了教育的色彩。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种“选编”往往更加大刀阔斧、惊心动魄。几乎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创造和继承下来的成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再阐释”，使之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当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发生碰撞和交流时，每个民族也都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异文化”进行“选编”。教育对成熟思想文化的每一次“选编”，都会形

成不同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留下一批经典文献，而从这些“选编”所蕴涵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教育史就是一部思想文化的选编史。（冯向东《我们在如何“选编”思想文化：一个审视教育自身的视角》）。

用这个理论来观照中国教育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选编”一直从未间断。孔子在春秋时期编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应该是第一次自觉的“选编”。董仲舒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第二次“选编”。此后，唐代的古文运动、宋代的理学运动和明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运动，也是三次重要的“选编”。这三次“选编”的共同使命都是努力使当时的中国文化从被破坏和消弱的境地挽救出来。其中前两次“选编”的共同背景是在它们的前代，均是被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造成汉民族社会文化面临失落的危险，但是没有动摇其根基；而后一次的背景则是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直接威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应该说，前五次的“选编”总体是成功的，孔

子与董仲舒的“选编”，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与精神家园。唐宋的古文运动与理学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与思想高峰，孕育出了美丽的唐诗宋词。而近代的第六次“选编”，则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认识历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选编”走了不少弯路。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三反”、“五反”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选编”的主导思想是“大革文化命”，不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被抛弃，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与我们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选编”兴奋点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让位于“物化”，在权力和金钱的漩涡中，许多人迷失了自己，而教育也放弃了自己对文化更新的巨大作用。教育一度屈服于错误的思想、滥用的权力和霸道的金钱，完全丧失了理想与追求。学校追求的是功利化的分数，道德与智慧均被踩在脚下。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没有自觉履行对于成熟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的责任，当今教育人根本没有从中国文化长远的发展来考虑学校的目标，也没有将人性的彰显看成是学校的生命。

新教育认为，教育应该是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学校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新中心。没有教育对于文化的自觉“选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和重建，也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神家园。所以，这既是国家文化建设与教育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新教育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在新教育实验发展的历程中，这个使命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

不断地清晰和明朗起来，在新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中，把中国文化作为新教育的根基和创造之源，已经成为新教育人的文化自觉。

第一，新教育实验提出了“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价值追求和追寻理想、深入现场、共同生活、悲天悯人的新教育精神，这明显受到了儒家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情怀。

第二，新教育实验提出了“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理念，努力推动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的建设，使教师与学生、父母和孩子乃至更大的共同体，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密码，共同的价值和愿景，为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新教育实验把教师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号召教师以孔子为榜样，书写自己的生命传奇，为中国教师树立了人生楷模。对久居新教育共同体之中的人而言，加盟新教育，乃是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更古老、更本真，与源初思想更为贴近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教育者努力让自己朝向（或处于）一个“生生不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境界中。敬畏生命，呼吸经典，与更年轻的

生命相互编织有限之生的不朽意义，书写自己职业生涯的传奇……这些，乃是身居其中的新教育人的内在体认，一种深切的生命体认、文化体认，同时也就是职业的认同。

第四，新教育实验主张“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在实验学校推进“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等六大行动，实践了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

第五，新教育实验通过开发“在农历的天空下”、“走进孔子”等课程，提出“知识、生活和生命的深刻共鸣”等主张，并且通过“晨诵、午读、暮省”的儿童生活方式，以及开学日、涂鸭节、毕业典礼等各种庆典和仪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上。

第六，新教育实验提出“文化为学校立魂”的主张，通过开展“文化植根”、“文化塑形”、“文化育人”、“文化强师”、“文化立信”等方面的学校文化实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渗透到学校建设的各个领域，让学校环境、教育行为的细微处浸润文化精神，凝练生命精华，令师生沐浴在道德、科学、数学、语言、历史、艺术等人类文化的熠熠辉光里，耳濡目染，行以成之。

近十年来，有一种意识在新教育共同体中越来越明晰：教育必须有根、有魂。而新教育，与其说是想为中国教育打造可以流传数百年的成熟课程，倒不如说是想为“失魂落魄的教育”重新召回灵性、魂魄、神圣性。而任何一个成熟的课程，也必须从文化和生命存在的根系中生出，且与悠久的历史息息相通，才是值得保

存与流传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我深信，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精神作品不是扎根于源初的原生性之中的”。对于中国大地上的新教育实验，其实就是曾经富有创造性的中国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次复苏。当然，我们深知，如果我们不能清理这一创造性的思想之源被层层遮蔽的历史事实，我们同样会沉陷在后世的形式主义中，丧失那创造的本质。

因此，新教育首先是一种创造性地寻根，是寻找这一文化的创造根源，使得生生不息的创造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教育实验，首先是文化的新教育实验和哲学的新教育实验，而不是封闭于某个实验室以采集数据的自然科学倾向的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中会有个体研究人员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某些实验，但这是从属于上述文化的新教育的局部探索）。

也因此，随着新教育的深入，它将越来越把自己与原初的儒家精神与道家思想关联起来，并以创造性地阐释那些塑造民族精神的经典为己任、为依据。当然，这里没有背诵经典的盲从盲信，自然更不会有认定中国文化是不再具有生命力的死物的武断。作为栖息于此一文化、此一语言中的新教育，它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当前的语境下，重新活出“生生不息”、“仁”（不麻木，恕与爱）、“恻隐之心”与“浩然之气”的儒家精神，和“道法自然”（依据字源，将自然阐释为‘以自己的样子显现’）、“天、地、人、道”和谐四重奏的道家精神。

在此语言和文化的原点上，新教育实验放眼全部人类创造的历史，将自然科学、西方哲学和各种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心理学成果，纳

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成为创造当前“具有创造性与本真性的教育”的必须借助的资源与视域。

当“生生不息”与“仁”（我们诠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与“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爱道）的本体精神，与人格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以及神话学、传记学、经典文学诠释打通的时候，新教育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叙事理论”——一种解释学倾向的教育学，一种把个体生命的成长视为上述精神的扩充或受阻变形的心理学。

新教育实验，将培植此一自强不息、仁心充溢的本质生命，并从其存在的诗意中，开发出一系列人文课程；从其存在的思性中，开发出一系列科学课程。而这一过程将始终确保诗与思的统一性，无论是生命早期的浪漫，还是高年龄段的精确分科，都将确保生命的完整与统一。

新教育人深知自己的责任是创造一种好的教育，而首先不是成为创制心理学理论、哲学理论的职业理论家，所以在拥有一个自己体认的文化原点和一个自己确定的解释框架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以行动者的姿态，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哲学思考，纳入到教育生活的相应位置，而最终目的始终在于：创造一种本真的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而这种开放的视野，以“复兴源初创造性文化”为己任的天命感，使得它和当前同样冠以“教育实验”为名的其他教育探索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最后呈现于世人面前较为成熟的新教育实验，将是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学的完整教育形态，一个从学校文化建设到所有学科课程的创制，以及师生、家校共读共写共

同生活的独特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形态。在这样的完全意义的新教育学校里，可能将不复存在当前命名的任何新教育项目，而只有每一个生命的自我叙事的不断展开，“晨诵、午读、暮省”，人类创造的最美好事物在共同生活和课程穿越中不断复活，师生生命也因此不断丰盈、丰厚。新教育人不愿意错过任何可以企及的人类美好，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存在局限于某一局部，更不愿意把自己研究的这一局部与存在整体相分离。

而在此种共同的文化诉求中，每个生命将依据自己的生命密码和存在境域，成为独一无二的生命叙事者，这一个个创造性的个体，将共同构成一道新的精神风景线。这样，我们的教育使命也在其中得到了安顿，既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也为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找到归属。如此，学校将重新回到文化与社会的中心，引领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美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在1988年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获得智慧。”

但如果没有我们文化的自觉，没有我们教育的行动，这些预言和判断将始终是一个画饼，是别人欺我、我又自欺欺人的安慰剂。中国文化能否再度复兴，能否迎来它再度令世界起敬的成就，一切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有赖于我们每一间教室的努力。

2011年9月，新教育人聚集内蒙东胜，用文化的视野关照教育，用教育的视角反思文化，

用教育与文化的眼光打量我们自己。我们形成了如下共识：

文化，是一个社群曾赖以生存、借以辉煌的模式，记录了这个社群自古至今的爱憎、企求、失败和荣耀。

文化，既有在特定历史中与具体环境相适应的形式部分（如中国文化中的礼乐、习俗、古代法律），也有超越时代的精神实质部分（如仁、义、爱、自强不息、逍遥自然）。

文化即教育，教育即文化。文化和教育的这种高度的同一，正是人类完全不同于、超越于其他生物的最大特征。人之成为人，人类之成为人类，其本质乃是文化，乃是教育。

文化是一条流动不息的河流，每一个人都是某一文化河流中的水滴。没有水滴的河流会迅即干涸；而没有河床，历史将失去方向，每个个体将陷入生物性的本能中简单重复。

我们（任何社群和个体）借文化而拥有语言、拥有自我；文化借我们而得以延续，并获得创生、更新的可能性。

创生、更新文化的，就是文化中的英雄、榜样、先知、楷模，他们创作的或为他们创作的诗篇、传统、故事、传奇，成为一种文化最明亮、最动人的部分。

于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法自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最珍贵的精神珍品，留下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留下了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留下了黑白之间天地宛

然的中国画，留下了四大发明和无数历史景观，留下了石猴成佛的神话传说……

教育的过程也是文化“选编”的过程。一种合宜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梳理自身的文化，对文化进行辨别、抉择，把文化中的创造部分、开放包容部分，传授给下一代，让文化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让文化借他们而得以更新，重新显现上述的这些根本精神。

好的教育应该有文化的自觉与自我省察。教育的真谛乃是文化的自我创生。爱历史不是爱历史中的罪恶与挫败；爱英雄与榜样但不是依样在新时代画不合时宜的旧葫芦；爱诗篇是要写出这个时代的新诗篇；爱传奇是要写出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的传奇，和“我们”的传奇；爱中国文化，就是要让它在我们身上显现其根本的创造精神。

非道弘人，人能弘道。新教育人的使命，就是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我们教育的根基和创造之源；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推动文化的自我创生，让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显现并焕发青春。我们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成为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这样的文化重建者，但我们应该努力做到，通过我们每一个新教育人的文化自觉，通过我们自己这个湍急的隘口，让中国文化这条河流奔涌前行。

亲爱的新教育人，让我们行动起来，用自己的真诚和信念，把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我们身上真正地活出来，为培养面向世界的中国人，为建设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的南京

III 叶兆言

—

1911年的10月10日不同寻常，对于绝大多数南京人来说，这一天并没太大不同。寒露刚过，秋天已有了模样，正是江南最好的季节。由于发明了电报，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过来，这个城市显然习惯了平静，感觉是迟钝的，无关紧要，好像千里之外的枪声，与自己没什么直接关系。

太平天国一点都不太平，曾给南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接下来许多年，这个城市一直在静静疗伤。长毛早已灰飞烟灭，湘军和淮军的影响却仿佛还在，在这做官的不是湖南人，就是安徽人。驻扎在城内的军队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其中倾向革命的新军有五千人，保守的旧军有旗兵和绿营二万人。老百姓对动乱充满了恐惧，对战争非常厌倦，最好的选择就是什么事也别发生，最好的生存状态就是太太平平。



浙军攻克南京后入城

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边远省份由同盟会领导的一次又一次暴动，四川的保路运动，过去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与南京没有任何关系。

武昌的起义似乎还不足以惊醒这个城市，革命接二连三，革命党人频频出击，到处开花。光复大旗随处飘扬，转眼之间，南京周围差不多都成了革命党的天下。远一些的陕西山西云南光复了，近一些的湖南江西安徽光复了，上海光复了，杭州光复了，苏州光复了，沿着沪宁线，无锡常州镇江接二连三光复，连江北的扬州也光复了，南京仍然还掌握在清政府手里。

这个有点让人感到尴尬的现实，让南京的革命党人感到很窝心，很着急。起码在外人看来，南京人不够努力，缺少血性。当然，南京人也作出了努力，11月8日凌晨，一次仓促的不成功的起义，让势力单薄的革命党人惨遭失败。负责守城的清军将领，显然做好了防范，防患于未然，早早地将可能闹出事的新军调出了城外，每人只发给三粒子弹。和很多城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拿下不同，南京注定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考察整个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之役不说最惨烈，但是也可以说相当麻烦，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时间可以倒流，站在清朝的统治者角度来看，他们一定会后悔做了两件事。第一，取消了科举，这让读书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就是一个屡试不中的失意秀才，要是考场得意，让他有了功名，或许就不会给政府添那么大的乱子。科举没有了，一代读书人有力无处使，有劲不知道该怎么用，仿佛没头苍蝇，巨大的能量发挥不出来，革命也就在所难免。第二，不应该冒冒失失地做军国主义的美梦。大清朝已病入膏肓，虚弱的身子根本禁不起重药，却还妄想

建立一支强国称霸的新军，结果国未强，霸未称，反倒给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就曾经在新军服役，后来转业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当了狱卒，他的故事非常适合再现当时的历史。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这位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开始不安分起来，他与新军的中下层军官秘密联络，约定时间里应外合，同时举行暴动。然而新军被突然调往城外，仍然还蒙在鼓里的他按照原定计划起事，时间一到，在监狱里为犯人打开了镣铐，用事先准备好的枪支将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呼喊冲向街头。

因为没有外援，结果就只能壮烈牺牲。从名声来看，朱东润的三哥不能与秋瑾和徐锡麟相比，也不能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虽然后来也得到了抚恤金，也算是个英雄先烈，说起来总觉得有点心酸。革命难免会有些牺牲，革命不是做买卖，不可以讨论值得不值得。然而他的牺牲至少可以说明，光复南京毕竟不是儿戏，还必须有些更有力的行动才行。

二

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按照革命党人的意愿，革命应该首先在边远地区发动，然后逐步推开，最终彻底动摇清王朝。偏偏事实证明，边远省份的起义，总是微不足道，很轻易地就被扑灭。众所周知，发生在武昌的起义更像是一次擦枪走火的意外，革命党人自己都感到手忙脚乱，最后不得不从床底下将黎元洪搜出，白白送了顶革命元勋的乌纱帽给他。

因此，辛亥革命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革命党人如何强大，而是大清朝实在太弱。光复成了多米诺骨牌，因为大清朝太弱，

因为寿终正寝，很多城市只要揭竿而起，发一篇通告，贴几张传单，就可以传檄辄定，立刻光复。巡抚大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本省的最高权力长官都督。城头变幻大王旗，革命成了一场欢快游戏，光复成了最时髦的词。然而骨子里的旧还在，官仍然是官，民依旧是民，知县摇身一变，成了县知事，一字之差，县太爷还是县太爷。

此时的南京却有着特殊意义，天下已经大乱，胜负还在一念之间。袁世凯打电报给负责守城的张勋，说“东南半壁，悉赖我公”，他的意思十分明显，只要南京还在，革命党人就翻不了天。只要南京还没丢，沪宁线上的城市虽然光复，其他省份已经独立，清军随时还可以再收复。这时候，革命已经不可阻挡，但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袁世凯却稳操胜算，他的北洋大军掐住了革命党的喉咙，已将武昌团团围住，置于自己的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拿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

革命党人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很显然，辛亥首义的武昌肯定守不住。事实已经证明，在军事上，黄兴督战的革命军根本不是北洋的对手。要解武汉之危，只有尽快搞定南京。“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一时间，南京成了重中之重，于是江浙联军组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不得不在此地进行决战。

说是决战，相对于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光复南京之役算不上什么大战，死伤人数也相当有限。但毕竟是一场改朝换代的生死决战，毕竟这一仗，彻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南京的光复，让快要逆转的形势，又一次有利于革命党人。很显然，

武昌起义惊天动地，而南京的光复，才正式宣告清朝的大限到了。

这样的结果，一向散淡的南京人肯定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城市，在风谲云诡的中国大历史上，会扮演了一个如此吃重的角色。革命军从不同的方向冲进城门，爱看热闹的南京人又一次成为了看客。炮声已经听不见，零星的枪声也已经结束了，南京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走上街头。在著名的革命党领袖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土著的南京人，退而求其次，就算是革命党中有头有脸的南京人也找不到。说起革命家史，南京人只能又一次惭愧。

三

辛亥革命是个模糊的概念，既可以指武昌起义，也可以是当时的一系列城市暴动。或许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革命就变成了一个常用词汇，十分正面，而反革命基本上就是骂人了。结论往往最简单，教课书一次次将标准答案灌输给了我们，不断出现在考题中，因此一谈起辛亥革命，是个学生就会滚瓜烂熟。首先，它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其次，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我的历史知识都是读闲书得来的，用行家的话说，是野路子。多少年来，我一直野史的爱好者，通过旁门左道阅读历史，借助前人的文章和笔记了解过去。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人有些什么心态，重新考察体会，或许会有些新的观点，会有些与流行不同的看法。

终于光复了，南京的老百姓开始咸与维新，开始兴高采烈相互剪辫子。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剪个辫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仿佛闹革命，在不同阶段，有着不一样的代价和结局。清朝留给汉人的辫子，原本和脑袋联系在一起，危险时，剪辫子意味着要丢掉性命，等到大势已去，连袁世凯也与时俱进，剪掉辫子也就是一剪子的买卖。到这时候，水到渠成，剪已经不是什么事，不剪辫子才是个问题。

用旁观者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人，显然有些不够恭敬，事实的真相或许就是如此。南京是两江总督所在地，掌管着当时最富庶的区域，控制着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历来为朝廷所看重。但是南京人根本管不了这些，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城市有着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只是以一种十分现实的心态，非常平静地去迎接这场革命。不仅平民如此，普通官员也是这种态度。攻打南京的炮声响起之时，除了位于最高层的那几位长官，夹着尾巴仓皇逃跑，大部分官员都静观其变，既不打算直接参与光复，也不准备为大清尽忠殉节。

清道人李瑞清当时的职位是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南京最高学府的校长。考察这样一个文化人的态度，显然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现场。李瑞清是中国最早参与高等教育的文化官员，曾经到日本考察教育，戊戌变法以后，新派思想一度落于下风，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但是随着科举制度取消，废书院，兴学堂，罢私塾，设师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那时候的大学生显然没有今天激进，更没有几年以后五四运动时的觉悟。虽然在革命军中也有李的学生，譬如后来的著名教授陈中凡先生，他曾在革命军中当伙夫，毕竟只是极少数，基本上微不足道。

当时思想激进的学生，也不过是先悄悄地把辫子剪了。作为大学的一校之长，对待自己的学生，李瑞清既不鼓励，也不阻挡，完全放任自由。在革命军的隆隆炮声中，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照常敲钟上课。天下再乱，认真读书总是不错。他这么做，依然这么固执，很有点书呆子，但是确实不容易。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十分感慨，佩服他的淡定，觉得人才难得，是“诚可寄命任重者”，当即火线提拔，任命他为江宁布政使，官居二品。这是个相当高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和民政厅长。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李瑞清已不可能大有作为，大局不可能更改，很快，两江总督张人骏跑了，辫帅张勋也跑了，美国和日本领事劝李瑞清去外国军舰上暂避，他依然书生本色，没有携款潜逃，而是“封藩库，积金数十万”，静待革命军的到来。南京光复的那天，他衣冠楚楚，奉印端坐在堂上，眼睁睁地看着革命军冲了进来。

革命军并没有为难李瑞清，毫无疑问，这样的书生不应该是革命对象。交了布政使的大印，回到学校，留校师生奔走相告，欢迎他回

来主持学堂。可惜李瑞清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去意已决，遂命人登记校产，抄录清册移付缙绅，上书督府，辞退校长职务。又眼见学生贫寒，衣衫褴褛生活贫困，心中十分痛苦，便卖去自己的车马，所得钱财散给穷学生，随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

四

由于南京是由联军攻打下来，谁来当这个城市的大都督，便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论功行赏，结果却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革命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平起平坐的机会，拥兵的青年将领都觉得自己功高盖主，革命尚未最后成功，各路英雄好汉已经开始勾心斗角，开始争权夺利。南京光复以后，革命党人纷纷涌向此地，投机者也如期而至。虽然革命还未最后成功，武昌仍然告急，可是这里已经俨然像个官场。

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赶到南京，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衙早就瓜分一空，部长的位置没了，次长的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从光复那一天起，南京就成了一个大的权利场。不能将李瑞清这样的教育精英为自己所用，显然是新的民国政府的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既可以说李瑞清顽固和清高，也可以说新政府根本就没时间没兴趣来网罗人才。新的民国政府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要开。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就像革命元勋黎元洪的遭遇一样，具有金陵王气的六朝古都南京，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所在地。

武昌起义时，革命军的旗号是十八星旗，它仍然带有汉族独立色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南京举行时留影



孙中山祭明孝陵后与文武官员合影

十八颗星象征着汉人的省份。南京民国政府最后选定的国旗，是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五色旗，从武昌起义到南京光复，从汉人闹独立到五族和平共处，也不过就两个月工夫，辛亥革命已迈进了一大步，此时的中华概念，事实上就是清政府原有的疆域，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汉民族的革命，而是所有中国人的革命。

南京悄悄地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从结果来看，它仍然还有骨子里的软弱，正是这种软弱，导致袁世凯最后窃取了大总统一职。然而有时候妥协并不一定是坏事，让步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妥协和让步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这就是取消帝制，反对民族分裂，停止南北对抗。从光复的那一天开始，南京就担当起了领导和调和的任务，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什么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它一次次满足了当时各种势力的要求，为未来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为大家找到了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着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民主，虽然有些混乱，有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心斗角，有让人不齿的权谋，

但是说到底，还是浩然正气占据了上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虽然只是初级阶段，然而却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这以后很多年，以讨论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完全考虑到民意来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方式，已完全被暴力革命所替代。

1911年的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为选黄兴还是黎元洪当总统争执不休，获悉袁世凯也赞成共和以后，立刻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很显然，还处在敌人阵营的袁世凯，才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黄兴这么认为，黎元洪这么认为，孙中山也是这么认为。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有比较高的威望，他受到许多革命团体支持，也得到了立宪派和旧势力的认可，一致认为他是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最佳临时总统。因此从一开始，孙中山的大总统前面，就加着临时两个字。

换句话说，袁世凯最后成为正式的大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窃取就可以解释，也不是因为南京的软弱就可以形容，而是代表着当时从上到下的民心。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在最后选择了袁世凯，错也好，对也罢，最终是尊重民意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是袁世凯对不起民意，是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如果在当选大总统之后不久便死去，他或许就真的流芳百世。

叶兆言 男，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南京人》、《旧影秦淮》、《陈旧人物》、《江苏读本》等。

“百年辛亥”在美国

III 殷志强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不仅与中国社会有休戚与共的关系，也与美国社会特别是与在美华人华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激发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长期在美国学习生活、从事革命活动；二是在美华人华侨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三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在美国华人社会继续发扬光大。

逸仙足迹今犹在

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伟人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名文，号逸仙。在避居日本时，化名中山樵，自署孙文。时人称孙逸仙。辛亥革命后，人们都称孙中山。

孙中山一生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美国求学、治学、探索革命真理、从事革命活动、谋划人类进步事业，六次到夏威夷，四次到美国本土，在美国度过了九年半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生涯，留下了许多憧憬思考、活动足迹、珍贵回忆、历史遗物……

百年辛亥前夕，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率

团访美，沿着孙中山当年走过的线路，先后访问了夏威夷、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与当地侨界及我国驻美使领馆举行了十八场座谈及拜会活动，共同主办了三场纪念辛亥百年座谈会，参加辛亥百年论坛等纪念活动。笔者有幸随团参访，所见所闻，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其从事的革命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与理解。

夏威夷，是孙中山少年时的求学地，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诞生地。1879年，孙中山随母杨氏首次出国远行，经澳门乘船赴夏威夷，进入教会所办意奥兰尼中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学习。中学毕业后，孙中山进入夏威夷欧瓦胡学院（现为普纳荷学院，也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母校）学习。一个学期后，孙中山兄孙眉恐其加入当地耶稣会，为父母督责，便令其回故乡，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男书院、中央书院。

夏威夷的这段学习经历，对孙中山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树立了拯救饱受深重灾难祖国的远大理想，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孙中山在回忆这一段学习经历时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夏威夷少年孙中山铜像

又说：“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1894年秋，孙中山由上海赴夏威夷，在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并酝酿建立革命组织。11月24日建立了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积极发展会员，成为支援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

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学习、革命活动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但他的革命足迹随处可见，他的气息无处不在。1883年孙中山在欧瓦胡学院读书的教学楼仍然屹立，并且还在使用。在夏威夷的中国城，孙中山活动过的地方，至今仍有许多建筑物，虽然房屋的用途多次发生变化，但主人都以孙中山曾在此留下足迹而自豪。居住在夏威夷的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副主席、孙中山曾外孙王祖耀博士曾向笔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的处所已不复存在，我们在夏威夷兴中会纪念馆的墙上见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有“李昌旧宅——兴中会成立时同志宣誓处”的说明。

孙中山因夏威夷而走上救国革命的道路，夏威夷以孙中山为骄傲。为了缅怀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学校、街道、公园耸立着多座孙中山像。在夏威夷市中心的孙中山纪念公园，有一座少年孙中山像，系夏威夷孙中山基金会筹款13万美元于2007年设立。少年孙中山铜像，头戴无檐帽，身着长马褂，右手夹着两本书，神情坚毅地望着远方，英姿焕发，朝气蓬勃。旁边的石碑上还镌刻着孙中山的回忆：“这是我的夏威夷……我在这里长大和受教育。在这里，我开始懂得什么是现代、文明政府，这样的政府意味着什么。”

1896年6月18日，孙中山由夏威夷乘轮船抵达旧金山（三藩市），首次踏上美国本土，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旧金山成为孙中山在美国本土从事革命的重要活动地。一方面的原因，旧金山离夏威夷较近，容易来往；另一方面，在淘金热的影响下，旧金山发展很快，开展活动有经费保证；更重要的是，旧金山华人华侨众多，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依靠力量。孙中山在此开展了一系列重要革命活动，主持召开旧金山同盟会支部成立大会，建立美洲同盟总会，提出“三民主义”思想，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等。当年孙中山用以印制文件的印刷机和存放革命军饷的保险箱，至今仍保存在旧金山中国城新吕宋巷3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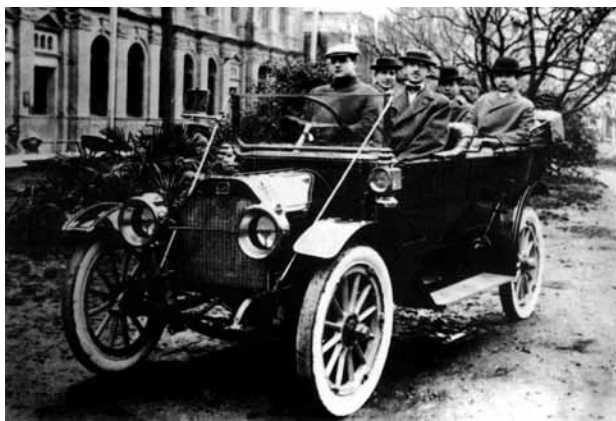
在旧金山中国城圣玛丽公园，一座样式特别的孙中山雕像如今依然矗立于花园一边。1911年7月，孙先生就在这个公园与同盟会成员誓师出发，为辛亥革命筹募经费。旧金山孙中山铜像为一正立像，系由美国雕刻艺术家，亦为孙中山先生挚友布芬那担任造像设计工作。1935年开工，1937年11月12日揭幕并永久耸立于公园内。

我们在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负责人池洪湖、伍柱钧、戴琦先生等带领下，在高低不平的旧金山市区爬山坡，穿老街，进旧宅，访会馆，忆往事，去公园，献花篮，追寻孙中山的革命足迹，缅怀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旧金山“城中城”的中国城，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一条条纵横的街道，一座座醒目的老宅，一个个高耸的牌坊，一家家热闹的店铺，一盘盘诱人的美食，似乎都与孙中山有关，激起我们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与无限追思，仿佛看到了孙中山百年前奔走革命的身影，街巷间回响着孙中山拯救祖国、关怀同胞的呐喊。

孙中山除在旧金山、洛杉矶等美西地区，还到圣路易斯、丹佛、凤凰城、芝加哥、底特律、巴尔的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美中、东地区大中城市从事革命活动。

孙中山曾先后四次到纽约，在此首次向美国主流社会公开宣扬革命政治纲领，强调中国必须革命，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英文稿，成立纽约兴中会，组建同盟会纽约分会，为革命活动筹款。孙中山在纽约的足迹难于寻找，因为纽约是一个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世界大都会。但从1909年11月孙中山在纽约与美国友人在敞篷汽车上的历史照片看，孙中山在纽约的革命活动，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著名的《纽约时报》，曾对1911年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足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在美国的影响。

幸运的是，在辛亥革命百年前夕，著名旅美华人专栏作家、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女士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寻找，终于搞清了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的活动情况。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1911年10月10日（星期



1909年11月，孙中山在纽约与友人在汽车上



1911年7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筹饷人员合影

二) 孙中山下榻的“布朗宫”饭店(The Brown Palace Hotel)，至今仍保存着他的入住记录，他当时住的是321房间。目前321房间已改为高级会议室，悬挂着孙中山像和入住记录的复制件。当地报纸还刊载孙中山发表演讲、筹款的广告。孙中山是在丹佛市看到当地英文报纸后，才知道武昌起义的历史性大事，于是抓紧演说筹款，争取国际社会理解，竭力支持国内革命活动。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四处演说，为革命筹款。

说不完的故事，寻不完的足迹。孙中山在美国留下的历史踪迹，穿起历史时空，架起文明桥梁，既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还是中美两国

人民携手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见证。

百年纪念忆先贤

美国各地侨界与中国大陆一样，2011年举办了近百场百年辛亥纪念活动，既有数十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也有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更有高规格的全球性的学术论坛；既有小型图片展览会，也有综合性的文物资料展览会，更有史诗般的大型音乐会；既有单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也有个人专著的出版，更有系列丛书的隆重推出。有人说，美国是除中国大陆外，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最多、内容最好、规模最高、影响最大的地方，身临其境更有切身的体验。

9月15日，民革中央团与美国纽约侨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总领事孙国祥先生大使主持座谈会。民革中央郑建邦副主席就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伟大意义发表了主旨讲话，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制度、人民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纽约侨界代表四十余人参加，踊跃发言，表示要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一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美国举行的纪念百年辛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会议，应是2011“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暨纪念辛亥百年论坛”，9月17日在华盛顿隆重举行。来自祖国大陆以及全球各地的华侨华人代表五百多人与会，大会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主题，缅怀革命先贤，重温中山先生遗训，共商两岸和平发展大计，共襄中国统一大业。大会引起美国社会和主流

媒体的强烈反响。一位旅居匈牙利的会议代表饱含热泪对笔者说，因为有了祖国的日益强大，才有海外华人前所未有的地位，才可能在敏感时期在美国首都召开规模、影响如此大的全球和平会议。

大型文艺演出，是美国侨界纪念百年辛亥的重要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反响热烈。由南北加州侨界联合举办的“百年辛亥·百年辉煌”大型交响音乐会，于9月中旬在洛杉矶、旧金山进行了两场规模盛大的演出，分中国序曲、民族复兴的艰辛、民族复兴的历程、民族复兴的辉煌四个篇章。来自南北加州的八个合唱团、洛杉矶管弦乐团、数十位艺术家参加演出，通过声、光、电、画等立体的表演艺术手法，采取领唱、合唱、独唱、朗诵等演艺方式，展现出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史。阵容强大，气势磅礴，艺术感染力强。海外媒体称，这是一场全世界海外华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最具规模的史诗般的大型音乐会，观众如云，掌声如潮。

在中华民族传统中秋佳节日期间，国务院侨办派出“文化中国·辛亥百年”艺术团赴美国华盛顿、休斯敦、旧金山、夏威夷等孙中山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巡回演出。艺术团由国内著名表演艺术家组成，演出阵容强大，艺术形式多样，有声乐、舞蹈、民乐、京剧、杂技、魔术等。一场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向海外侨胞、海外友人献上了精彩的中华文化盛宴，展示了祖国河山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带去了祖国人民的亲切慰问，激发了广大侨胞满腔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出版热潮中，有关美国与辛亥革命的图书也有多部问世，主要有郑曦原编著的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卢雪乡编著

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美国外交文件看民国诞生》，居蜜编著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居正与辛亥革命：居氏家藏手稿汇编》等。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前馆藏主任卢雪乡编著的《从美国外交文件看民国诞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内藏 1840 年至 1913 年间美国总统手稿、美国外交文件中精心挑选，收录了关于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创的许多珍贵档案文献。通过解读这些文献资料，诠释当年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先贤的艰辛革命历程，展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经历，他在美国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时美国三位总统的对华政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学术研究主任居蜜博士编著的新书《居正与辛亥革命》，由《居正与武昌革命》、《居氏辛亥革命家藏手稿》、《梅川谱偈》、《辛亥札记》等组成，将其祖父、武昌起义的主要参与者、辛亥革命元勋居正的八千余件手稿重新整理，并将居正当时所见证的辛亥革命各个重要起义等历史事件还原解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居蜜博士在华盛顿举行的纪念辛亥百年论坛上，还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详细介绍了居氏家藏辛亥革命文献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好评。

一次次讨论，一场场报告，一个个论坛，一本本图书，多少遍回忆，无数次汇演，追忆了美国华人华侨的辛亥历程，展示了华人华侨的精神风貌，抒发了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完全统一的强烈愿望。

辛亥精神永传承

百年辛亥，百年记忆，百年传承，百年辉煌。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在大会上致辞



居蜜博士作学术报告

覆地的变化，东方巨龙再次屹立在世界东方，海外华人华侨从来没有如此扬眉吐气，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如此意气风发，伟大祖国从来没有如此繁荣富强、如此受人爱戴与尊敬。

美国各地隆重纪念辛亥百年，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先贤，不忘历史，更重要的是承前启后，开拓未来，让辛亥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

辛亥革命的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美国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上，先贤后裔、专家学者、高层主管均有精彩表述，概括起来主要有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振兴中华的奉献精神，促进祖国统一的民族精神。



中国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常委林远先生（前排左三）与民革团合影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唤醒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爱国革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矢志不渝，一往无前，无怨无悔。中华民族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转折，其背后都有海外华人华侨的身影，有他们的力量。历史多次表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不仅是革命之母，还是祖国建设之母，他们是海外游子，更是祖国骄子。爱国主义是辛亥革命伟大精神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所在。

自1894年孙中山振臂高呼“振兴中华”口号以来，“振兴中华”一直成为亿万中华儿女的理想目标和前进动力，成为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2011年华盛顿全球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宣言指出：“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唤醒和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之毕生奋斗，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财富。”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在座谈会上指出：“辛亥革命先辈们所展示出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与斗志来振兴

中华。”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执行长李竞芬动情地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身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我们虽然身居海外，但是要加入到振兴中华行动中来，不做旁观者，要做参与者。”

一百年前，中山先生就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台湾新民党主席乐可铭身着绣着“中国必统一、台独是绝路”的西装前去华盛顿参加会议，表达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在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上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谋求国家统一是孙中山思想的核心内涵。辛亥革命的历史表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周铁农副委员长的讲话，受到美国华人华侨的广泛赞同，他们纷纷表示，要传承辛亥星火，弘扬辛亥精神，为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作出新贡献，无愧于辛亥先烈的殷殷重托，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卓越功勋黄兴孙女、美国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会长黄仪庄说：“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凡，‘百年辛亥’需要‘百年传承’。我已经70多岁了，我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以告慰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捐躯的先烈先贤。”

殷志强 男，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特约研究员。先后出版有《古玉鉴定通论》、《中国古代玉器》、《旅美华玉——美国藏中国玉器珍品》、《鉴玉甄宝——中国历代玉器鉴定通则》、《说玉道器——玉器研究新视野》等专著。

《推拿》创作谈

III 毕飞宇



作品和作家的组合关系也很有趣，如果是1995年——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31岁的作者该如何去写《推拿》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定会把《推拿》写成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语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顿说了，这是一个“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于盲人这个题材，31岁的年轻人也许会鼓起对着全人类发言的勇气，试图图解亨廷顿的那句话。年轻人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张三象征着局部，李四象征着局限，王五象征着人与人，赵六象征着人与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后，真理在握。在小说的结尾，太阳落下去了，它在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没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阳，它只是史前的一个蛋黄。

写作其实不是文学，而是化学。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们在小说家的内部所构成的化学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是好的语言？布封说：“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地方。”什么是好的机遇的呢？我会说：“恰当的小说出现在恰当的年纪。”在恰当的年纪，作品与作者之间一定会产生最为动人的化学反应。

我写《推拿》的那一年是43岁，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因为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过去，中年男人无比在意一个“小说家的感受”，为了保护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几乎是封闭的、绝缘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变了他，他开始留意家人，他开始关注“别人的感受”。对一个家庭成员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但是，相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就在我写完《推拿》不久，我在答记者



金炳华给毕飞宇颁奖



毕飞宇发表获奖感言

问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理解力比想象力还要重要。”这句话当即遭到了学者的反对。我感谢这位学者的厚爱，其实他完全用不着担心，想象力很重要，这个常识我还是有的。我之所以把理解力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原因只有一个，我43岁了。我已经体会到了和小说中的人物心贴心所带来的幸福，有时候，想象力没有做到的事情，理解力反而帮着我们做到了。

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一个四十七岁的老男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当说，人到中年之后，情怀比才华重要得多。

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人们常说，中国的小说家是“短命”的，年轻时风光无限，到了一定的年纪，泄了。这个事实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缺才华，但我们缺少情怀。

小说家的使命是什么？写出好作品。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小说家也有提升自身生命质量的义务。在我看来，生命的质量取决于一件事，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情怀。我渴望自己有质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至今也不认为《推拿》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它意义重大。我清晰地感受到，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和生活的关系扣得更紧凑一些了，我对“人”的认识更宽阔一些了。这是我很真实的感受。基于此，我想说，即使《推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我个人，也是一次小小的进步。

我找到了我的新方向，我又可以走下去了。

毕飞宇 男，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青衣》、《玉米》、《平原》、《哺乳期的女人》、《慌乱的指头》等多部作品，其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近30年来江苏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人生就是一次次偶然

III 黄蓓佳

我读小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六岁进学校，十一岁毕业出校门。小学期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高的一个，且又属于智力上的晚熟类型，身体与大脑的发育不够同步，印象中似乎九十分很少跟我沾边，五年的光阴也不知道是怎么糊里糊涂混过去的。我为自己的个子太高而自卑，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够优秀而自卑，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自卑……种种的自卑使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一个喜欢流连在小说世界里寻求安慰的孩子。

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夏天我已经考上初中，因为“停课闹革命”而在家辍学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非常关键，我在一个不停上演残酷闹剧的舞台之外，孤独地完成了自己化蛹成蝶的过程。1968年“复课”，走进中学校园时，我已经是一个目光冷静、心智相对成熟、读过不少文史书籍、有了一定的文学储备的十三岁少女。

我在班级中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老师们的宠儿。初二那年上数学课，我答对了老师在课上提问的难题，从此老师竟以为自己挖掘出了一个数学天才，对我另眼相看，每回上课总将最难的问题留给我回答。我受宠若惊，从此不敢懈怠，课前必做预习，免得当众丢脸。渐渐地，对数学有了兴趣，倏忽开窍了一样。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已经年近六十，我至今还记得他白

发飘飘走在校园里的样子。这位老师对我更是偏爱有加，据说他每次批阅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来做标准答案，如果有一题我错了，那就基本上全班皆错。老师的偏爱是举在我身后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测验我也不允许自己让老师失望。高中毕业考试，六门功课，百分制，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回想起来，我很感谢我的两位数学老师，高考时我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均没有考出高分，是凭着数学拿分才进了北大。

高二那年，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学校里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是篇超长的作文，有五千来字吧，题目叫《补考》。一天上午在操场劳动，有同学奔过来告诉我，我的作文在学校报栏里贴出来了，纸面上打满了红双圈。那时候，老师们批阅作文，喜欢在认为最好的字句后面画上红双圈。当时我心里很兴奋，即刻就想去看看，却又矜持，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园



里寂静无人时，我像做贼一样溜到报栏前，傻乎乎地笑着，独自欣赏我的打满了红色双圈的作文。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一共是九十八个红双圈。这就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对我的评价。

九十八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

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张贴了许久。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到学校办事，偶尔走过报栏，看见这篇作文，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刊登在县办刊物上。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交流，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几经周转，次年居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慧眼相中，发表在当年国内唯一的正式文学刊物上。

其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我的第二篇、第三篇作品居然也是每投必中。父亲说我命中注定要吃写作这碗饭。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两年曾经发疯一样地喜欢写儿童文学。其动力来自当年江苏《少年文艺》的主编顾宪谟老师。我记得给他投去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星空下》。小说很快发表了，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于是又寄去第二篇，他马上又采用。这样，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那几年里，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年轻的我受不了这番盛情，写作热情就加倍高涨。他一封信一封信地写来，我的稿子就一篇跟着一篇地寄去。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考试和上课，也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同一期刊物会发表我的两篇稿子，我不得

不用一个真名，一个化名。

成名之后，很多次记者采访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你当年是怎么想到要写儿童文学的呢？时间太久远了，我答不出来，心里也揣着这个疑问：是啊，我步入文坛时写的是成人文学，怎么会突然想起写《星空下》那篇儿童小说的呢？不久前见到顾老师对记者的一个访谈，才终于明白，《星空下》不是我的主动投稿，是顾老师见到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觉得我有一种写作儿童文学的资质，向尚在北大读书的我投书约稿，这才有了之后多年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使我至今没有离开儿童文学，并且还有着继续为孩子们写下去的愿望。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无数个偶然的片断组成了生命之链。不是“文革”停课两年，年幼的我会一直跌跌爬爬地跟班学习，永无开窍之日；不是数学课老师的一次课堂提问，我的数学天分不会开发出来，为日后考上名校打好基础；不是语文老师给我的九十八个红双圈，我不会成为作家；不是《少年文艺》顾老师的一封约稿信，我会跟我的无数个少年读者失之交臂；不是……

人的一生，可以一件一件拿出来把玩细说的事情实在太多。偶然的是机会，必然的是自己对命运的准备。偶然和必然的结合，那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在机会来临的刹那纵身一跃，把自己交付出去。那样的滑润和完美，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黄蓓佳 女，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民进江苏省委副主委、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著有《夜夜狂欢》、《新乱世佳人》、《日光一样透明》、《派克式左轮》、《心声》、《今天我是升旗手》、《家人们》等多部作品。

当代中西文化差异的多重性

邵 军

当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多重因素交叉形成的，因此，具有复杂的关系。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异时，必须理清这些复杂的关系，从多重角度把握并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认为，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时代性差异：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中西文化的直接冲突。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利用中华文化中的消极面顽固抵制西学，但中华文化内在的自新动因，

促使一代仁人志士痛定思痛，发愤向西方学习。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华文化并没有对西学持否定态度。而此时中学的问题，是仍然停留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之中。这个时期的中西学冲突，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是时代性的差异。在农业社会，西方的宗教认为是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中华文明认为是女娲造人。在政治方面，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这些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然而，文艺复兴后，工业起步，科学发展，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规律，建立进化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神学的基础，对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人性取代神性，人的主体性自觉得到发扬。进而，民主、自由、科学精神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反观上世纪初中华文化，仍然是以儒家理学的一套维护封建统治，这就使得中华文化在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最终由西学引领进入工业社会，走向现代化，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时代性差异造成的问题，不能同文明类型的优劣混为一谈。中华文明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发展，或不容于工业社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完全可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达成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已经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拉开了帷幕，更好的风景还在前头。

二、选择性差异：集体关注和个性关注的差异

中国在特定的背景下进入工业文明，面临工业社会中的两条道路选择。大工业带来许多新问题，工业社会的社会性和个性矛盾更加突出，注重公平还是注重效率，注重集体还是注重个体，注重市场还是注重计划，在世界范围内，

曾经在上世纪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大分歧，大试验。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偏重于从社会的角度来解决工业社会矛盾的道路，搞计划经济，搞公有制，倡导集体主义。这种选择，不是指个人为主体的主观性、偶然性选择，而是指人民为主体的客观性、必然性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有国际局势的原因，也与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是有渊源的。所以，在中国步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选择的道路和欧美不一样，时至今日，虽然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大选择的差异还是存在的。这种选择，与文明类型有关联，但不是文明类型决定的。更多的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文明进程造成的。先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差异，



罗马斗兽场

促使各国在世界现有格局中寻求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落后国家，为了追赶先进国家，企图寻求新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试验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上世纪的冷战思维，强化了这两者的对立。其实，理性地从人类发展进程来看这种选择和试验，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大家在经过了注重对立之后，较多地注重两者的互补，这更有利于解决工业社会的普遍问题。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和当代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而是两种倾向、两种选择的差异。既然是选择性的差异，最终还可以在继续的选择中得以解决。

三、类型性差异：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

世界范围内的几个大的古老文明类型，是存在差异的。以文明起源的区域和民族为基础，世界上现存几个大的文明类型，主要是，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美（西方）文明，以古中华为起源的中国（东亚）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欧美文明国家首先进入工业化，获得了以经济军事为支持的话语优势，并具有继续扩张的势头。其他几个文明正在经受工业化、现代化的洗礼。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扩大了文明类型的差异性，为当今政治服务，为美国建立单极世界服务，自多偏颇。其实，文明类型既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完全存在多样统一的基础。文明类型之间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学习，可以融合，还可以在交流融合中创新发展。中华文明就成功地接受并融合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日本古学中国，近学欧美，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而西方在面临后工业时代新课题时，把关注的目光又投

向中国古代文明，企图借东方智慧化解当代难题。这些都是文明交流的成功案例。在当代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华文化有过体制性崩溃，有过彷徨，有过混乱。但是，当经济等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华文化必然要复兴。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又必然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会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积极成果。

关于中西文化对话问题，涉及一个哲学界关注的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哲学。如果从西方哲学的狭义来理解，中国可以说没有哲学。如果中国真的连哲学都没有，作为文明核心的哲学如何对话？可见，拘泥于文字的游戏是没有意义的。中华文明毫无疑问具有可以同西方哲学对话的核心思想，我们有辉煌的百家争鸣，这里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有体制化的儒学，有更具哲学形态的理学，有生动的辩证法。当然，我们可以追求语义的进一步精细，概念的进一步精确，以求对话更准确有效。但是，哲学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哲学对话的障碍。

综上所述，就这三种差异的关系来看：时代性差异是必须解决的，中华文明一定会成功地进入工业社会，放射出新的光彩。选择性差异是会面临继续选择的，中国人民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类型性差异是会继续存在的，但这种差异不是必然导致冲突，而是应该相互学习，和而不同。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邵军 男，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工商联党组书记。

呼唤文化通才的涌现

III 朱辉军

经过近 200 年的积贫积弱之后，中华民族重又走上了复兴之路，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世界瞩目。但是，与经济的腾飞相比，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当代的文化建设上还没有相应地跟上，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那么，为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要造就一大批文化人才。其中尤为紧迫的，我以为，是要造就一大批文化通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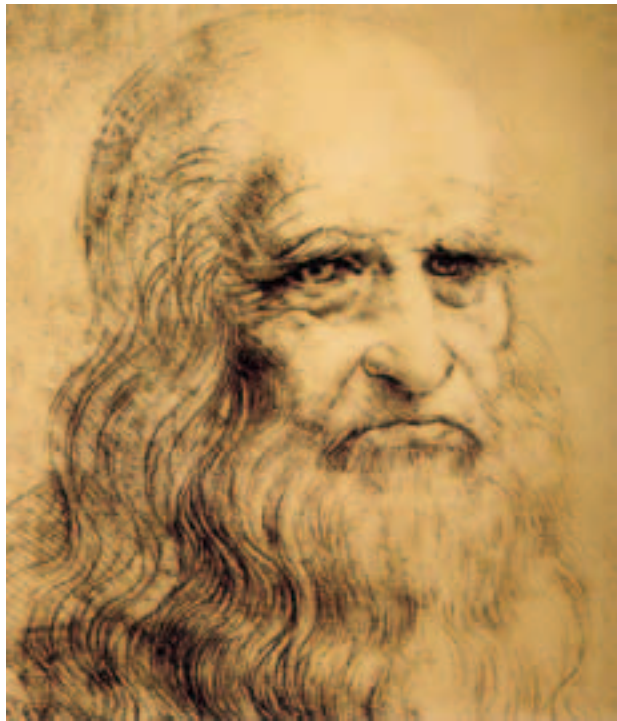
一、巨变的时代往往会催生杰出人才涌现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他的《蒙娜丽莎》闪耀着永恒的光辉。还有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加上《蒙娜丽莎》，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是欧洲艺术的拱顶之石，也是他为世界艺术宝库留下的珍品。

但同时，他也是科学的巨匠，在天文学方面，达·芬奇提出的一些观点甚至早于哥白尼的“日

心说”，他对传统的“地球中心说”持否定的观点。他认为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太阳本身是不运动的。达·芬奇还认为月亮自身并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辉。还在那时他甚至就在幻想利用太阳能了。在地质学方面，达·芬奇根据高山上有海中动物化石的事实，推断出地壳有过变动，指出地球上洪水的痕迹是海陆变迁的证明，这个思想与 300 年后赫顿在地质学方面的发现颇为近似。并且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他就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为七千余英里。



达·芬奇

在物理学方面，达·芬奇重新发现了液体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原理。他还预示了物质的原子原理，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原子能的威力。在水利学方面，达·芬奇对水利学的研究比意大利的学者克斯铁列早了一个世纪。为了排除泥沙，他作了疏通亚诺河的施工计划。他设计并亲自主持修建了米兰至帕维亚的运河灌溉工程。由他经手建造的一些水库、水闸、拦水坝便利了农田灌溉，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些水利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他在医学、建筑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开创先河的成就。他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而米兰的护城河就是他设计和监工建造而成的。

他还是发明家，乐器、闹钟、自行车、照相机、温度计、烤肉机、纺织机、起重机、挖掘机……达·芬奇曾有过无数的发明设计，而这些发明设计，在当时如果实现，足足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科学文明进程提前100年。有些发明，还在军事上引起了变革，他发明了簧轮枪、子母弹、三管大炮、坦克车、浮动雪鞋、潜水服及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滑翔机、扑翼飞机和直升机、旋转浮桥等等。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在那个年代就在手稿中绘制了西方文明世界的第一款人形机器人！

《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几乎可与达·芬奇比肩。他的学问包罗了当时许多学科：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医学、植物、音乐、法制、教育、古经文，还通晓十多种语言。此外，但丁、卜迦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哥白尼、弗兰西斯·培根、莫尔等，也都是“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

与文艺复兴相似，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西方文明源头的古



陈独秀

希腊罗马时期，就不说了，那毕竟与今天没有太多可比性。与我们当今近似的，还是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

五四时期，真也是令人热血沸腾、历久弥新的年代！那个时期，中国的天宇上群星闪烁、光耀大地。

被毛主席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不但以犀利的文笔唤醒民众，而且在诗歌、书法、音韵学、文字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文化之外，他是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些骨干鲁迅、李大钊、蔡元培、胡适以及章士钊、辜鸿铭、傅斯年、罗家伦等，也不仅在文化、艺术、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政治、教育、外交等多方面引领时代潮流之先。

文艺复兴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都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文化急剧裂变的年代。因此，一大批天才人物成批涌现，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也改写了文化的格局，并留给我们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新的时代对文化人才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文艺复兴、五四运

动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更大的不同。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和科技突飞猛进的年代里，文化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在书斋内奋笔疾书或在讲堂里慷慨陈词，就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当今的文化人除了以文化为主业外，至少还要熟悉四个方面的事务。一是在市场经济年代，务必要熟悉市场的取向、经济运行的方式；二是在高新技术年代，对科技要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电脑、网络及数字技术不能隔膜；三是在法制社会里，必须熟悉相关的法律条款，不能连《著作权》等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都一无所知；四是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所以，对于当今的文化人来说，比起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或者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所面临的要求更新，也更高。

这似乎是强人所难。但这个地球从来就不缺英才，总是有一些杰出的人物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被称为怪才的萨尔瓦多·达利，与毕加索、马蒂斯一道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他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内战的预感》《记忆的永恒》等，让世界为之震惊之余又耳目一新。但他不仅绘画，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塑和摄影作品，他同时还写作并演出戏剧，设计服装、道具和布景，还拍过两部在电影史上留下印记的影片。所以他不仅是怪才，也还算得上是通才。

另一位离我们更近些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标杆人物。他的《大白鲨》《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都已成为不同类型电影的顶尖之作，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从80年代中期起他又兼任电影制片人，主要制作动画片，并涉及游戏软件。1994年10月，他干脆直接“下海”，

与人共同开了一家“梦工厂”公司，并将他的作品行销到全世界。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他以影视为轴心，广泛涉猎科技、商业和外贸等领域，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看看这些当代的杰出人物，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差距有多大，目标离我们还有多远。惟有不断地跋涉攀登，我们才可能到达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

当前，已经到了必须正视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社会分工的时候了。我们数十年来严格的教育分科和严密的社会分工，固然培养出了一大批专家，但将人限制在狭隘的学科里和狭窄的社会角色中，是无论如何都出不了通才的，更遑论大家、巨匠！所以，恩格斯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特征的时候，才特别指出：“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处在时代运动之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在这里特别强调“生活着和活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打破了分工的局限，随着时代的激流应运而生，又顺应时代的激流积极斗争，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在如今这样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打破壁垒，打通各学科的限制，打通分工的束缚，应当说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三、当代中国文化人要自觉使自己成为通才

当代中国文化人一定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我们这几代人基本上在和平年代生活学习工作，

学校教育又严重地挫伤了我们的创造性，所以，我们先天不足，后天薄弱，很少有学贯中西、艺通古今的文化人；同时，我们又很快地卷入到社会经济文化大转型的漩涡之中，浮躁、苦闷、焦虑缠绕着我们，使我们很难静下心来积累自己、磨练自己、提升自己。“知耻而后勇”，知不足后才可有长进步。

通才，不是要求所有都通。作为个体，人生而有涯，学而无涯，艺亦无止境。因此，一定要有主业、主攻方向，兼顾其他。最佳的是，以文化的某个方面为轴心，辐射开去。不仅辐射到文化艺术的一些领域，而且要辐射到当今无法绕开的经济、科技、法制和国外去。不一定要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一定要了解甚至比较熟悉。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人！

对目前我国文化发展的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状况，我们也要有一个客观的、清醒的基本估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16日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1105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5%。那么，美国如何呢？2010年美国仅版权收入，就比上年增加了约3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4%。其中，国外收入约1340亿美元，大大超出飞机、汽车和农业等美国代表性产业的收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11月2日公布的估算结果显示，2010年美国的电影，再加上音乐和电脑软件等版权的收入，就高达9318亿美元。这些枯燥的数字，至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差距有多大！因此，我国的文化部长感慨：我国文化产业要称得起“支柱性产业”，至少要占到同期GDP的5%。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文

化产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例要翻一番。也就是说，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部文化产业到2015年还达不到美国版权收入的水准！

同时还要痛苦地承认，我们全民的文化素质还不是太高，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依然存在着弊端，我们的社会文化管理和运行也存在着缺陷。所以要坚持改革。

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限定的时空里，经由我们的努力，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又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成果来。这也是存在着极大的缺失的，主要的是原创力的严重缺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痛苦地指出：目前中国文艺作品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他举例说，目前我国一年的文艺作品达到4300多部，但是公众知道的、阅读的却不多，“原因就是创新能力不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人喜欢看外国大片，因为对方创意和传播能力比我们强。”这是权威发布的信息，振聋发聩而又促人猛醒啊！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吸纳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创造出真切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真实描绘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业绩、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风采神韵而又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和感动的文化作品来。唯有如此，当我们的后人回溯今天这一段历史时，就像我们回顾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一样，对我们充满崇敬、仰慕之情。否则，我们不仅对不起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恐怕都无颜去面对后人！

朱辉军 男，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文艺评论家。著有《艺术创造主体论》、《恶之花——变态美考察》等多部专著。

钻天洞庭遍地徽

——苏商文化精神透视之二

III 吴跃农

中国有首古诗，诗意是：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这个诗意最贴切地表达出苏商与徽商的关系。苏商的生命，有徽商的精气血；徽商的生命，有苏商的精气神。

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流传着“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说法，意思是说，苏州的洞庭东山、西山人和徽州人都执着经商，是经商能手。洞庭商帮与徽商，实乃中国近代商界双雄。为了经商营生，洞庭商人稳健务实，善于钻营，精明能干，无物不营，无地不去，能觅得商机，



创造商机，赢得商机，成就大好的商贸业绩，洞庭商帮活动地域之广、江湖影响之大，令人赞叹。而徽商也是无孔不入，天南海北无处不到，足迹遍及全中国。当时，南北二京、各省都会及其他大小城镇，无不是徽商活跃之地，都有徽商忙碌的身影。敢问路在何方？有路或无路，热闹或冷清，徽商都一往无前要去闯去做买卖；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徽商无处不在。江苏，既是徽商的故乡，也是徽商的近乡，更是徽商的发展腹地，苏皖两地血乳交融，人文相近，商情商脉相通。

一、钻天洞庭走天下

洞庭东西山是太湖中的两个岛屿，地较偏远，面积较小，是个自古至今连县都算不上的小地方，本是边缘，却成中心，风生水起，四海翻腾。洞庭商帮东西山所处的太湖，属于吴地即吴县（今苏州吴中区、相城区）内的面积接近1500平方公里，约占太湖总面积的三分之二，72个岛，58个在吴县，成为洞庭东西山的从属岛屿，这是一个通过太湖水系，开放的，直接面向环太湖及更为广阔地域的洞庭东西山。东西两山，有着诞生“洞庭商帮”的天时地利之优，可谓是天堂中的花果园、人间仙境、商贸乐土。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山上盛产梅、杏、桃、李、樱桃、枇杷、杨梅、橙、橘、梨、栗、银杏、茶等经济作物；湖中则多鱼腥虾蟹，有极为丰富的，人称“太湖三白”的白鱼、白虾、银鱼，还有莼菜、莲藕等。袁袞在《游洞庭山记》中说：“西洞庭，东南之沃壤也，梅梨橘柑、杨梅枇杷、鱼盐茶竹之饶，错以良田，山之人朴愿而信，涂无妇人，可不谓美乎？自夫差以来，不被兵燹，抑又美矣。”

王鏊在《洞庭两山赋》中也深情咏道：“星应五车，地绝三斑，卢橘夏熟，杨梅日殷，园收银杏，家种黄柑，梅多庾岭，梨美张谷，雨前芽茗，蜚余萌竹。水族则时里之白，鲙残之银，魴鲈鲋，自昔所珍。”正因为洞庭两山有鱼虾之利、果实之珍、菰莼之富，故“为商家所辐凑，舳舻肩负，络绎而不绝”（汪琬《具区志序》）。

天时地利人和，和而勤，勤而智，孕育了一个生命力极强的商人资本商团——洞庭商帮。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为名称的商帮是苏商的主体，其历史文化是苏商文化传统的核心和重要源泉。从春秋战国时期归隐情场制陶经商、泛舟五湖、财色尽得的，被当时天下人称为“陶朱公”的商圣范蠡，到明代出资与大明政权“对半而筑”南京明城墙的，拥有“聚宝盆”称号的苏州周庄巨富沈万三，都是源远流长的苏商历史中的知名人物；而近现代苏商中的知名人物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典型代表。关于这个商帮，昆山名士归有光曾说：“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则把这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了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小说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洞庭商帮心态如太湖水，相对开阔从容，从来不急吼吼，从来不会失魂落魄，他们就像太湖水一样风平浪静，稳健、谨慎又精打细算，用吴侬软语来说，叫“笃悠悠”。他们知道，看准了才可以行动，心平才能求长远，只有心境平稳沉着、专心致志，才能厚积薄发，有所作为。因此，他们总是能够抓住商机，创造商机，看得远而准，下手稳而狠，钻天入地，钻营有术，



吴江静思园

被誉为“钻天洞庭”。

苏商作为与国内其他商帮并驾齐驱的江苏本土商帮，影响至今，生命力越来越强大，依然青春蓬勃。其核心文化精神的形成就是积淀于江苏悠久厚实的商业传统，来自于明清洞庭商帮的发轫、发展、不屈不挠的壮大和近代化的加速成长。

必须指出，“钻天洞庭”之“钻”，即钻营，这是商人的一个本色词语。对于苏商来说，钻营就是对商机的审度，对时局的把握，对商场人际关系的拿捏得当、游刃有余，而不是行商之“奸”。洞庭商帮起势于明万历年间，在明清时期一直处于鼎盛状态。心思细密、洞若观火的洞庭商人，巧妙避开当时无数商帮，特别是

徽商争抢着的“印钞票”行业——盐业。他们独辟蹊径，以船运外销本土盛产的丝绸、棉布起家，返程捎回所需的药材、梨枣、杂粮，一来一往，船只从不空载，小生意做得稳稳当当；之后，他们依靠水路长期贩运盐、粮食、水果、木材、药材、丝绸、布匹等，实业商贸并举，生意越做越大，势如燎原之火。

二、“国之钱仓”看苏商

江苏，自古便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人间天堂、国之钱仓。由吴地崛起，苏商活动范围主要立足于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民风委婉尚文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及邻近浙江、

安徽的长江流域、太湖流域。贯通江苏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财赋流通、盐业中转的重要通道，淮北的盐场、繁华的扬州城，成为苏商崛起的又一个重要舞台。

隋唐以后，中国东部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苏州、南京成为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双中心，“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扬州成为南北交往要冲的城市。唐后期，长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地位越发举足轻重，“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谣更是把苏南的富裕唱得人心向往。而到了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南地区士商相杂成为社会的蔚然风气，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活跃，城镇消费能力达到了相当水平，苏州和无锡等太湖流域及沿运河的城镇，街市热闹，丝竹弦音、酒肆林立、商旅辐辏、店肆如鳞、檣櫓相接、客贾云集，各种货物云委山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苏州是“一颇名贵之大城”，他在游记里这样写道：“臣属大汗，恃工商为活。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哩，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假若此城及蛮子境内之人皆是战士，将必尽略世界之余土，幸而非战士，仅为商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此城亦有文士、医师甚众。”马可波罗在记载南京的商人时说：“南京是蛮子的一个著名大省的名称，居民是佛教徒，使用通用纸币，是大汗的臣民，大部分人经营商业。”

明清时期，苏商崛起为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商帮力量。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都会和文化中心。南京、苏州、松江（今上海）等地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十九世纪末，丝织、缫丝、纺织、面粉、采煤等近代工业在无锡、南通、苏州、常州、

徐州等地陆续兴起。其中苏州的丝织业，更是享有世界盛誉。以洞庭商帮为代表的苏商是当时驰骋于江苏和全国商界的劲旅。苏商队伍不断扩张壮大之时，也是商业竞争空前激烈之时，那是明朝和清朝前期中国经济较高速发展时期，是苏商与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和徽州商帮一起搏击商战的新一轮历史发展高潮期。苏商兴，则江苏的大商人资本兴，城镇建设兴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山陬海隅孤村僻壤无所不至，苏商发挥了强劲的商品市场主体作用，结构连贯了全国的商品市场网络，拉动了城镇消费需求。可以说，苏商是促进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力量，是“国之钱仓”的重要支撑力量和财富供源。

江苏的“苏”的繁体字“蘇”很形象地诠释了“江苏”的含义，“蘇”由草、水、鱼、禾四字组成，象征着江苏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自古至今，江苏一直是山川秀丽、物阜民丰、繁华不衰的风水宝地，是中华文明先行地之一。与其说苏商的成长离不开中国东部沿海最优裕的环境，不如说苏商以坚韧的性格、不畏艰难踏实干实业的精神，赋予了优裕环境新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他们和这块土地上的其他劳动者不断创造出更为优裕的生产生活环境。苏商历经风浪，源浚流长，根深叶茂。近代江苏工商实业家，如南通的张謇、无锡的荣氏兄弟、常州的刘国钧、南京的范旭东，等等，他们崇尚实业，主张“货殖为急”，诚信经营，低调做人，埋头追求，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杰出代表。

近代苏商经过了大浪淘沙的社会考验，激

流勇进，成为和浙商、粤商、晋商、徽商齐名的中华五大商帮，苏商也从一个地域性商帮转为以上海和东部沿海为根据地，面向全中国的有突出发展能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商派，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着“实业救国”、“实业富国”。爱国之心，昭然天下。

如今的新苏商，才俊辈出，他们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新的形势下奋勇向前，蓬勃成长。他们是当今社会脚踏实地、敢想敢闯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和新的社会阶层的现实写照。新苏商无论是在民营企业家数量的涌现速度上，还是在民营企业上规模和整体规模上，都是空前的；在民营经济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纳税以及解决就业上，所作的贡献都是突出的。而这离不开江苏所营造出的亲商近商重商安商爱商的社会文化氛围。同时，新苏商站在苏商文化巨肩之上，继承了其中的优良传统，以准确把握商机的敏锐触角和应变能力，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超越前辈的“实业王国”，涌现了一大批商贾巨子，成为建设江苏、建设祖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无徽不成商

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来江苏，苏商去安徽，是一种常态。而且从某种角度看，苏商甚至可以是江苏和部分安徽商人的合一名称。狭义上说，苏商最初是指洞庭商帮所在地的苏州府商人。广义上的苏商是指江苏商人、在江苏发展的商人。历史上，苏商活动的固有地域广于现在的江苏省行政区划范围，苏商是一个地域涵盖面更广的概念。苏商既是在本地和外地创业、立业的江苏企业家，也是包括徽商在内的，融

入江苏，在江苏创业、立业的客商。

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自古以来，徽商恰是在江苏最为活跃。他们以江苏为发展的深厚腹地。明清时期，江苏地区的商品经济最为发达，较之其他地区，其更具有对客商“引进来”的独特地缘吸引力、亲和力。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苏淘金。其中，徽商把江苏视为理想的发展福地，呼亲唤友，接踵而至，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他们大规模进入江苏创业，乐把江苏视为家乡。相对于苏南地区“无江不成镇”之说，当时更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遍江苏，在江苏南北各大城市和集镇，许多重要的商业部门都操纵在徽商手中。南京的徽商占据了木商、典商、粮商、丝绸商老大之位，呼风唤雨；苏州的徽商则在米市、布市、茶市、木市、丝绸市、颜料市等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有色布行业，他们控制的青蓝布能够运销全国。扬州是两淮盐业经营中心，也是徽州盐商云集的地方，明末扬州95%是客籍商人，其中大多数是徽商，近代诗人陈去病说，“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他们亦商亦官，把盐业专卖的官商文化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他们把持盐利，经济实力雄厚。据传，某一时期，清朝国库存银仅有7000万两，而当时在扬州的盐业徽商拥有资本却高达4000万两银子，超过国库存银的一半。在徽州大盐商的支持下，徽商在扬州各行各业都很活跃，尤其是垄断了典当业。

可以说，当年徽商商战主场在江苏，徽商能够在历史上发挥巨大影响，与江苏这片热土上良好的创业氛围是分不开的。也因此，徽商等客商中的一大批人留在了江苏，成为苏商。

历史上，江苏和安徽有着共同隶属于江南



苏州护城河

省的血亲姻缘关系，两者连接交合为一体。徽商视江苏是自己的故乡或本土，是有这种历史渊源的。江苏省最早得名是在清康熙时。1667年，清朝把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组建江苏省时，取江宁府（今南京市）之“江”字和苏州府之“苏”字合成省名。看看现在苏南、苏中留存的徽派建筑、园林艺术，不必以为这都是客居江苏的徽商的贡献，这里也有苏商的直接贡献。

今天，江苏省会南京及苏南苏中一些城市对毗邻的皖南皖北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依然强悍，江苏宁、镇、扬几个城市周边的安徽区域对接受江苏的辐射和影响向来主动、积极热情，

皖籍人到江苏创业，徽商移师江苏，变身苏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看看今天的新苏商，站在最成功前列的，竟然有不少是皖籍的，如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苏宁环球建设集团董事长张桂平、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祝义才、江苏天地集团董事局主席杨休、南京金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江宝全，等等。他们在被视为苏商的领军人物的同时，也被安徽省视为徽商精英。2010年，在安徽六安举办的第六届“国际徽商精英年会”上，评出了第二届“中华优秀徽商”，祝义才、张桂平赫然位列在了包括了132名徽商的精英榜榜首。

可以说，徽商与苏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江苏和安徽许多地域，徽商与苏商是合一的概念。他们中的成功人士，大多汲取了“徽派”与“苏帮”的共同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道”文化，如“天道酬勤、商道酬信”；他们也都十分重视构建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这些都丰富发展了苏商文化的内涵。

四、苏商徽商精神相通

历史上，各地人缘相亲、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近的商人互相提携扶助，结成松散联盟形式的“商帮”，苏商亦如是。苏商的诞生之地、立足之地在江苏，发展壮大之地主要也在江苏，今天的苏商更表现出以江苏为根基、为依托，走向全国，走向海外的特点。苏商是在江苏和去他乡创业的江苏籍实业家和商人，到了当代，更为明确地把在江苏的外地客商包括徽商一起容纳在苏商的概念之中，反映了当代制造业、服务业实践活动的特点。

江苏地势低平，平原广阔，生于斯，长于斯，苏商文化精神中自有一马平川、广揽天下的大度和气量。开放包容、圆融通达、精明务实、拼搏奋进，一直是苏商文化精神的最本质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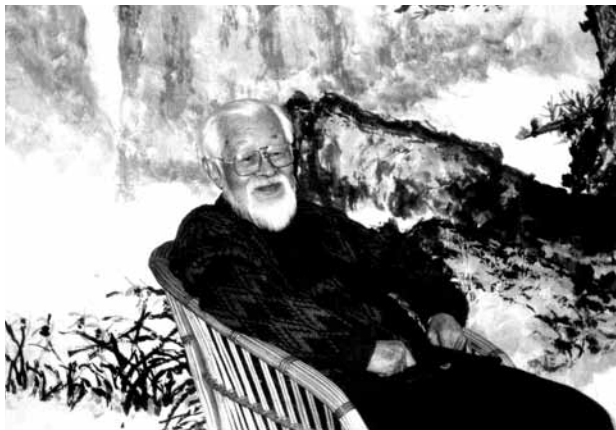
江苏地域人文内涵的显著特征是水文化，从南到北，河水纵横，水源充沛，襟带江湖，毗邻大海，五湖四海汇流，这实际上是胸怀开放、豁达的移民文化和文化大熔炉的品格：包容四面来客，融通八方风土，走向河湖江海，不嫌不弃，厚德载物，共创共荣。苏商的精神文化与江海情怀的水文化有着姻缘关系：有“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豁达胸襟，有“水滴石穿，以柔克刚”的钻劲韧性，有水无定势和定形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有容纳百川和虚怀包容及放低身段蓄力奔流、低调行事的处世作风。

苏商文化精神外柔内刚，沉稳不躁，勇往直前，应变灵巧，既有经风破浪的大开大阖，又有务实货殖的精明精细，务实而不喜空谈，低调而不惧竞争，内敛而不失大气。苏商文化精神中有着“四千四万”精神、张家港精神、华西村精神、“昆山之路”精神和“三创三先”江苏精神，也吸纳了“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徽骆驼”徽商精神传统，极自然地把徽商精神融汇进自己的文化精神之中。在苏商文化精神中，可以看到与徽商精神的相同之处：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谐精神，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江苏能够走在全国前列，民营经济能够高速发展，苏商队伍能够发展壮大，形成江苏的独特优势，都离不开江苏所独具的人文精神软实力的支撑。苏商文化精神中贯穿着“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三创三先”江苏精神的重要内核。

苏商的精血气脉，搏动着江苏的经济心跳，滋养着江苏的经济成长，也同样孕育培育着江苏精神。

吴跃农 男，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江苏民营经济研究》编委会副主任、主编，著有《江苏民营经济30年发展历程》。



朱墨写春山 但开风气先 ——朱屺瞻先生山水册页赏析

川 沙 洲

辛卯夏日，玉麟兄邀我至其府上，一同观赏朱屺瞻先生的山水册页。

册页是朱屺老送给宋文治先生的，作于癸卯年，即1963年，其时朱屺老72岁，正是创作的盛年。也就在这一年，朱屺老曾在南京办过个展，并到镇江、扬州、南京等地写生。

作于这年冬月的这本册页，让我们体会了朱屺老对乡情乡谊乡贤的情愫，更可以感受到朱屺老胸中所郁勃的一股创作激情。他以一种“笔为我用，法为我役”的磅礴气势，自在自如，任意挥洒，成就了这十二张精品妙作。

十二帧作品，朱屺老并未一一题款，只是总题。若以顺序，似可拟题为：收工、秋色、雨中、山寺、庭院、鬻泥、狩猎、山居、古松、旅人、归帆、江渚。每帧作品，从题材内容，到章法造型、设色笔墨，都可见匠心和巧思。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精髓，又能领略中西交融的成就，更可以看到一位文化老人为中国山水画所开辟的新的方向。



收工

朱屺老一生以“独”、“力”、“简”三字孜孜自求，他提出的“笔贵有力，力贵有势”、“笔整无画，落笔要邈邈三分”等艺术主张，他对中西艺术的参悟融合，以及他的刚健雄浑、朴



秋色



雨中

拙苍茫的艺术风格，都已成为中国画理论和实践的宝贵遗产。

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的画吧。在《收工》中，他用中锋运笔，线条有力有势，一波三折。居于视界中心的树冠，用扁圆点连环写就，可见书法功力，又用石绿渲染，加上几个过桥农人，画面安谧宁静。全图未见赘物，笔墨无多，色彩亦单一，却新意迭出。

《秋色》、《雨中》、《山寺》、《狩猎》均以色彩摄人，动人心魄。这种强烈明快的色彩，都是非自然主义的，完全由画家的主观感情所决定。朱屺老喜欢的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马蒂斯说过“我把色彩当作感情的表达，而不是对自然进行抄袭，我使用最单纯的色彩”。如何把这种对色彩的新的认识和理解，在水墨至上的中国文人画中，加以融合并浑然天成，这成为朱屺老对中国画色彩的新贡献。《狩猎》中，远山用了点彩法，树林则用了朱砂，浓烈的色彩犹如燃烧的火炬，使整个画面洋溢着生命的礼赞。《秋色》在用笔、用墨、用色之间相互照应，和谐共生。《山寺》则可见米家山水遗法，但朱砂和头青的运用，让藏于深山的古寺勃发了生气。《雨中》用了大块头青，两座山峰突兀而出，丛林下的土地，则用赭色筑底。由于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留白等手法，在色彩层次和空间上解决了过度 and 拓展，避免了呆板。再如《归帆》，画的是太湖秋景，画面上有流泻的光与影，



山寺



庭院



鬲泥



狩猎



山居

树梢上的落日余晖，湖上的归帆归鸟，这种构图和光色的安排，都在中西之间，却又不着痕迹，非大手笔不能为也。

受西方文化洗礼的朱屺老，更多地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囿于此，而是有取舍，求精进，从而自成一格，自立门户。看《庭院》，可见朱屺老笔墨之雄浑，内中有八大、老缶、白石老人之风格。他用山石皴法写就老树树干，湖石更是“横涂竖抹”，园内茶座、回廊安稳厚重，衬出茶客之散淡。同样写树，《古松》则是古意拂拂，山石峥嵘，似在诉说岁月迢迢。《山居》用石涛法，画面充满光感和动感，表现出了他浪漫的笔墨精神。《旅人》可见从元到清诸家笔法，但他又不满足于此，加以改造，参入新意，笔风飒飒，刚健劲拔。全部用墨写就的《鬲泥》，隐隐可见徐渭、石涛、虚谷遗意，用笔萧疏淡远，但却生机盎然。画中横枝逸出，垂柳轻拂，农人正在辛勤劳作，好一幅江南水乡图。

全册最后一张《江渚》图，朱屺老用率意简笔，写江上秋景，看似余墨信笔写来，其实大见功力，右侧杂花生树，应是点彩法写成。全图笔简意浓，但见江流远去，生生不息。

也就在这一帧上，朱屺老总题：癸卯冬月 画奉文治道兄指正 娄水起哉朱屺瞻于沪上客次。所留朱文印章为齐白石先生所镌。

在册页的后面，宋文治先生题曰：“癸卯冬月客居沪上 屺瞻道兄为我作山水册 12 帧 用笔苍茫拙朴 其章法别具心匠 有独特面目 创一代山水新风 敬仰敬仰 希珍藏学习之 玉麟儿存玩 文治”。

从中可见，宋文治先生对这本册页之珍重。

在玉麟的《娄江宋文治——忆我的父亲》中，

曾详细记载了朱屺瞻和宋文治的友谊。其中最感人的一幕当是：1947年，朱屺瞻先生介绍宋文治拜张石园先生为师，拜师仪式、请客等一切费用均由朱屺老承担。他们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维系了一生。

同样可贵的是玉麟亦沐浴了朱屺老的教泽。1965他到了上海读大学，从学校所在的华山路到朱屺老所住的巨鹿路很近，他便常常去朱屺老家讨教。在玉麟眼里，这位朱伯伯和蔼可亲，很大气，还蛮幽默，保持了一颗难得的“童心”。你向他讨教，同他聊天，他会反过来请教你。那句“瞎拓拓”的口头禅，玉麟也多次听过。但他知道，这是一种自谦，朱屺老在中国画上是下了苦功的。玉麟曾在他家看到过墙壁上挂满了临摹的山水画，内中有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他用的是意临。后来听说在近三年时间里，他一共临了五十多张古画，可见“瞎拓拓”只是一种自由心态的外化而已。

1972年底，毕业了好几年的玉麟终于分配了，要回南京工作。临行前，向朱伯伯辞行，老人精心作了一幅画相赠，并题款：“玉麟同志在沪分别写此留念 1972年12月29日 屺瞻”。这次画的依然是山水。

一晃，这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今年是朱屺瞻先生诞辰120周年。玉麟兄将家传的这本册页呈献给读者，我想，这也是对朱屺老的一种怀想和纪念。

沙洲 男，在省级机关任职。



古松



旅人



归帆



江渚

多重的身份 多维的成就

——谈我认识的艺术家庄晖荣教授

III 刘大为

我与萧君相知相交已久。这些年间，他对艺术创作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文化推广的热诚不悔，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重身份的“艺术人”

在我眼中，萧晖荣教授是一位情感真挚、多才多艺之人。首先，他是位极热爱中国画艺术，并且造诣颇深的画家。他从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开始就一直有作品入选每届美展，2003年

冬代表香港出席全国美术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多次受邀参加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各种艺术展览和活动，作品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等知名艺术机构收藏。他在艺术实践方面的坚持、探索和超越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他又是一位热心文化交流和艺术推广的活动家。从“文革”期间开始直到现在，他和艺术界及许多知名的已故前辈艺术家，比如吴作人（1908—1997）、刘海粟（1895—1994）、陆俨少（1909—1993）、朱屺瞻（1892—



“日出东方——萧晖荣中国画展”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

1996)、谢之光(1900—1976)、唐云(1910—1993)、赖少其(1915—2000)、周昌谷(1929—1986)、黄幻吾(1906—1985)、黎雄才(1910—2001)、杨善深(1913—2004)、宋文治(1919—1999)、程十发(1921—2007)、白雪石(1915—2011)等交往颇深。与当代学者王蒙(1934年出生)、黄苗子(1913年出生)、饶宗颐(1917年出生),艺术家如黄永玉(1924年出生)、杨之光(1930年出生)等及同辈艺术家都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美术界的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移居香港后,更是致力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宣传香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为增强港人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香港回归的那段时间,我曾率领美术家协会几次到港澳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萧君以极大的热情接待我们,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些接触频繁的日子,他总是神采飞扬,雄心万丈,对文化事业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深深地感染了同样投身于文化工作的我。

再次,萧君又是位颇成功的文化企业家。他到港后创办了在港澳及东南亚地区颇具影响力的“香港艺苑”,为弘扬优秀艺术传统、推动当今艺术创作作出了贡献。2000年,他又创办了“中国艺苑集团”,逐步实现着他的艺术推广梦。

最后,我认识的萧君还是一位倾心于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他成长于“文革”的动荡时代,所以因为历史原因而无法就学于任何高等艺术院校。但他博览众长,转益多师,刻苦自学,不但成为了卓有成就的画家,而且在专题艺术史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撰写的艺术史研究文章《众芳摇落独暄妍——探寻中国绘

画史上梅的历程》总结了自己对中国画中梅花题材的认识,颇有见地。2003年,他被西安美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04年,他又被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并受邀在浙江大学举办题为“海派的形成与发展”的讲座,客观地分析了殖民地文化、半殖民地文化和中国文化对艺术的影响,肯定中国艺术家要坚定其中国文化立场,得到了师生好评。这些都表明了学术界对萧君的努力和成就的肯定。

故此,我认为,“多重身份”乃萧君最大的特色,也是他独特的成就。这使他不同于单纯艺术家、艺术史家或纯粹收藏家,而为艺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前辈为师 获益良多

诚然,萧君的艺术发展之路有迹可寻。他是从与画坛前辈接触和艺术推广活动中学习,在与艺术家的交往过程中耳濡目染,吸收了不少宝贵的艺术养分。1984年夏天,比萧晖荣年长五十多岁的笔墨知己朱屺瞻撰文《萧晖荣的艺术》写道:“我生平得力于交游之处甚多,而萧君亦然。他尝为探绘事之奥而走遍大江南北,广交师友,他为人谦恭知礼,勤奋用功,被画坛诸多前辈所赞赏,晖荣每次造访,画友们都乐意为他而挥毫,这正是他学习的机会。他素性好学,从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对他创作有用的东西尽收胸中,他对不少画家的用笔用墨以及妙诀,都详尽了解,这样地博收诸师教益,对晖荣来说则胜过特定的师承。我认为,没有特定的师承,有其好处,可以少些门户之见,较能随意发挥。”

1982年,在移居香港后的翌年,三十六岁的萧晖荣得到前辈黄幻吾、周昌谷的赏识,在



萧晖荣《和谐图》

香港大会堂和美国图书馆举行三人联展，画展反应不俗，他的作品开始为香港同胞所认识，并广获好评。张大千先生以“书画家”题字相赠，可见前辈画家对萧君之器重。

大幅巨制 尽显豪情

2004年3月，萧君应邀到钓鱼台国宾馆作画，他是首位被邀请的香港艺术家。那时他创作的

是巨幅大画，我喜爱他绘画中所表现出的坚持、大胆、创新、生动等兼而有之。

在萧君的巡回展览和画集中有不少大幅巨制：有丈八匹的《松梅颂》、丈二匹的《万玉生辉》、三屏八尺合而为一的《老红图》，有六尺整纸挥写难度较高的冷金笺和红底洒金笺创作的《香海清韵》和《喜春》，及传统的四条屏《梅苑四色》及《梅友图》等，令人叹为观止。喜欢创作巨幅及组画作品，并能连续两三个月在

同一件作品上一一直纵深下功夫，是他的性格使然。每次和他接触，他总是精神奕奕、乐观自信，刻苦坚持、情感真挚，这些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慷慨、澎湃激情和赳赳雄心是创作大幅巨制的原动力，而他的独特个性往往在大组画中表露无遗。

钟情梅花 屡有佳作

萧君擅长绘制花卉、山水，亦作人物，尤喜画梅花。他从1982年就已开始创作梅花手卷，而且朱屺瞻、孙星阁（1897—1996）、饶宗颐、黄苗子、白雪石等十多位艺坛前辈为其题字，称赞不绝。杨善深题曰：“晖荣仁兄客居香海，尤勤于作画，此小梅花卷之用笔构图，超迈入古而有新意，斐然可观也。”赖少其则写：“画梅各有不同，亦有各家各种画法。王冕与冬心先生最有性格，但墨梅最好，红梅最难，因容易俗气。晖荣先生此帧，画得颇有生气，极难得。”二十多年前萧君绘制的梅花已别开生面，二十年来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地反复揣摩，每年冒寒走遍江南梅山写生，认真探索绘画的技法。同时又深入研究传统绘画梅花的历程和梅花诗词，从方方面面去丰富其梅花作品的艺术和文学内涵。萧君每次创作均要与古人较量，一直不以眼前成就为满足，永不休战，能大成者，非有此志不可，此应是萧君进步之座右铭也。

在谈到梅花的创作时，萧君强调：“自然中的梅具有那么多种类的美态，意喻中的梅又被赋予了那么丰富的内涵。我理想中描绘梅的画卷应该是让观者能‘闻’到它自然的清香，能‘触’到它不屈的傲骨，能融入它的生命。”萧君的作品，正是其理论的最佳佐证。他的梅花图往往是繁花累累，看似密不透风，却不经意地留下

了“气孔”。在2004年所作的《春风万里图》的题跋中，他为自己喜作梅花写下脚注：“今之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祖国繁荣安定，处处喜气洋洋，以传统之水墨梅花恐未能形容，余以多色并茂写之以赞昌盛之景也，见团结之力量也。”

书法入画 力透纸背

萧晖荣君在书法造诣上有相当成就，这要归因于青年时代所打下的牢固基础，当然还得益于他近半个世纪的丰富收藏。近现代中国书画大家作品，他都曾经收藏过。在欣赏的过程中，他领悟其中的奥秘，吸收了种种营养，从而建立了自成一格的艺术语言。故此，在绘画中他往往以书法的笔法入画，力透纸背，苍劲有力又不失灵气，极具风范气派。

再者，无论是小品册页或是丈八匹巨制，萧君皆喜用小字题款，而且经常是长跋，流畅生动，画龙点睛；又是巧作补充，增强内涵。他题字常题较大一组后，再补小字多行以增层次，更显书卷气，成功地将书和画融洽在一起，水乳交融，如鱼得水，充分体现出“书画同源”的传统，更尽显其书法的深厚功力。

早在十多年前，画坛前辈朱屺瞻就已经在《萧晖荣的艺术》中由衷而言：“萧晖荣先生是我热爱的年轻画友，虽然他比我小57岁，但彼此却成了忘年之交，笔墨知己。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年轻人，我很佩服他。”我也颇佩服萧君，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收藏家和艺术推广者，更是一位成功的中国书画家。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身份，实在是他最珍贵而独特的成就！

刘大为 男，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古法塑孔子

III 吴为山

对人的价值之评述往往要退远到一定的时空。当我们遥望一个历史的背影，便油然追问：他给这个世界照亮了什么？对于孔夫子，我们可以说：他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层心理、道德伦理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二十多年来，我钟情于现当代历史文化人雕塑创作，对象多是耄耋之年的学者、艺术家。可塑性的泥在手的运作中，常常痛快淋漓地表现着生命的颤动。以此法创作则塑痕鲜明，流动性大，可以凝固瞬间变化和感受。我塑孔子，开始也习惯地用这种手法。但越塑越觉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符号的孔子，应有的凝重与浑朴失去了。

匡亚明先生曾说：“世界历史三大名人，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前两者搞宗教，而孔子一生为人类，我看孔子更伟大。”虽然古书中对孔子的形象有描写，唐代吴道子、宋代马远均有画本传世，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尊只可意会而不可言状的孔圣人像！文字描述中多奇象。马远的画太夸张，前额宛如年画中的“老寿星”；吴道子画得飘逸、有仙气，但转化为雕塑，则“分量不够”。以西方雕塑写实的手法塑造，尽管高额、垂耳、长须等特征都出来了，却缺乏古意。文化人的长相对应其文化特性，而文化的生成受时间、空间及种族的影响。凡大哲皆为某一

文化之代表，故有异相、奇相，非以一般意义上的比例、结构所能刻画。所谓古意便是时间的悠远，它是古代文化留给我们挥之不去的想象与意象。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石窟雕塑，那体积的稳衡和精神的恒久，均是不拘泥于生理结构，注重整体体量对比所致，

它有历史的遥远与静穆。

这是“古法”，是我们文化中的生命音符，是古代匠师对天、地、



孔子
青铜铸造
吴为山作

人认识的朴素体现。以此法塑孔子会获得文化背景与文化符号的和谐——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就如同在古代的歌谣中寻找一个古代的人和事。

找到了形式的框架，碰到的是如何具体塑造孔子这个问题。为此，我专门找到了孔子嫡传后代的照片，但令人失望，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孔子相。倒是冯友兰、匡亚明身上有这种影子，特别是冯友兰由内到外的一股儒气，浓密丰茂的胡须，匡老饱满的天庭……这是儒学精神熏出来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源流、渗透是何等的潜移默化，甚至影响到人的长相。仔细回味，我所熟识的大文化人，或多或少都有孔子的影子，未必全在长相，有的体现在举止言谈中。即我们所说的“儒雅之气”。

我把孔子塑成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渊博。外形式上尽量单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凹凸，轮廓趋于弧线，身体以半圆体喻示儒家的中和，衣纹用阴刻线表现，简朴、纯化，古韵十足。

这尊1994年塑成的孔子胸像，头微前躬，谦恭、大度。见者都说，是“春秋战国时的鲁国人”。

2006年，我的雕塑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主题为文心铸魂，重在展示古今贤人雕像。孔子像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时空里，他是云中之巅峰；在文化里，他是和煦之春风。当然，他更是一尊凛然的化石，那仁慈，从脸上道道皱纹中绽出，似山脉水系，流韵弥长。手的礼仪传达着“仁”，孔子之仁，二人为仁，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伦理关系。

塑像以大方淳正为造型基调，形体的线面变化在敲塑、压塑中呈现。创作的快捷和感觉的敏锐成为二重奏，在拍、削、切、揉等手法

的交响里锤炼出平实、大方、温和、仁慈的孔子形象。体量的厚实与凝重，外化了大哲大圣的文化内涵，我曾作诗：

春风宣圣煦千秋，
仁者爱人励索求，
盘古当今弘教化，
和谐日月满神州。

这尊两米高的孔子像不仅成了文心铸魂展“和”的核心，也成了英国菲茨威廉博物馆雕塑广场的中心。同样还为我最近创作八米高的孔子像提供了借鉴。

著名的古典主义雕塑家、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先生在南京博物院吴为山文化名人馆观看了这尊孔子像后写道：现在我坐在这里看孔夫子，觉得他就是那样，越看越觉得是那样，那么久远，就像我国的莎士比亚，他像一条河流的源泉，像中国文化长河的源头，放在中心是非常好的设计，似乎所有这些雕像都源于孔夫子。安东尼的评论阐述了“中心”问题，不仅是空间中心，也是精神中心，这可能也是西方城市公共广场中心理念的延展。

我塑的这件八米高的孔子像立于室外广场。室内雕塑与室外雕塑有别，非只尺度差异。关键在于室外雕塑的参照对象是天、是地，这八米的孔子像背靠雄伟高大的建筑，面对众生川流的街衢，它当元气淋漓、壁立千仞。故雕塑必须大，所谓大，不只是尺度的概念，更多是气象、气度。它体现在雕塑自身各部分造型的体量对比关系以及轮廓线的角度、线面交接关系的塑造。当然本质是作者的胸境，胸纳乾坤，天地为塑。否则，尺度再大，也只小模型而已。

我根据自己创作的80公分孔子像小稿进行

等比例放大，结果十倍于模型的大稿并未显大。原因在于放大后的雕塑其视觉方位及心理感受已不同于小稿。它必须延展竖向的线沟，增强高远，才能形成“仰止”感。

我们通过研究乐山大佛、研究云冈和龙门石窟，对这些造型规律获得感悟。此中有以小观大、以大观小的宇宙观和观察方式与造型智慧。北魏时期高僧昙曜在云冈石窟的主佛雕造时已妙用了线体的关系。雄阔浑然的量体辅以疏密有殊的经纬，由此而生发的庄严肃穆感和神秘崇高感，是我们民族的造型之法，是古法。

立于现代都市广场的孔子像，倘以相对写实的形体衣纹表现，则在视觉语言上格格不入于现代建筑。古代衣冠是古代文化的样式，它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将封建文化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而孔子的概念已超越作为“古人”的孔子，它是跨时空的精神坐标，当是一座文化泰山。今天立像远非“像”的意义，更在于立碑。立意既定，形式天成。故而，孔子的造型便在人的生理结构与山体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自上而下纵观，山脚、山腰、山顶，层层递进；自左而右横看，道道天沟，一泻而下，纵横万里。或峭壁奇凸、或峰壑互生。孔子面含春风，满怀慈爱，智者仁相，巍然山巅。这种文化与自然的双重意象使得它与现代都市环境虚实共存，古今相融，这是自然之法。

古人长于在主体与客体间找到平衡，在人与自然的和谐里获得意象，这意象令人们由诗性表达遁入哲学反思。科学理性、现实功利愈来愈远离于这诗性、哲学，它反映在造型上为俗相横生。今天，文化复兴的意义在于呼唤那

失去的魂魄。唯念唯此，像成诗成：

其一

注经立传“易”乾坤，
德润中华蔚国魂，
治乱兴亡多少事，
崇儒浴日正逢辰。

其二

铁树扬花吟杏雨，
至圣大哲寿尧天，
国学苑里群贤起，
构厦华章日益妍。

孔子像的正气，缘自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大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磅礴，得益于山脉构造的伟力。中国画论中强调“师造化”，其实更适于雕塑艺术。关于法，我以为：

法古之法始成法，
变法求法我为法，
法由有法至无法，
方得法中之真法。

吴为山 男，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员（FRBS），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睡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天人合一——老子》、《孔子》等。

今月曾经照古人

III 谢舒



左起：宋玉麟、于青、萧平、邓仕勋、周和平 2007年9月在纽约漆研草堂欣赏明代绘画成扇

“皇冠大酒店”在新泽西州，是著名收藏家邓仕勋先生的家族生意。今年中秋节，受邓先生邀请，前去他家看藏画，之后到“皇冠”聚餐，过中秋节。

这个“皇冠”我们曾经来过两次。第一次来也是秋天，也是晚上。那是一九九六年，萧平先生受马里兰大学邀请去讲学，也受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东方部之请去看库房画，其间用两天时间专程去邓仕勋先生家看藏画。那天我们开车送萧平夫妇从纽约到“皇冠酒店”，晚餐后我们回纽约，他们随邓先生去斯坦顿岛的宅第。那是第一次见到邓先生和他的“生意”，酒店开得很好，规模和格调都是上乘的，但我对邓先生的收藏没有太多了解。

未曾想到邓先生的收藏如此令人震撼。

从九六年算来十五年过去了，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和殊荣亲眼见到这批令人高山仰止的藏画。整个下午我们都在邓先生家看画，忘记了世界，忘记了时光，等到看完天已经黑了。开车一个多小时才到酒店，那时一轮明月正在升起。走出邓先生的越野车，抬头仰望，月亮又

高又远，光华如水，年年如此，那么熟悉。再看陪我们的邓先生夫妇，竟有些隔世之感。“皇冠酒店”里璀璨的灯火流泻到外面，林木婆娑，花草朦胧，好像身在一个梦里。这个梦，不知



宋 佚名《鸡冠花》



元 王蒙《滦研图》局部

是唐宋明清那些大画家的梦托到现世，还是我的迷思回到久已远去的朝代。我们是那些古画前的过客？或许那些刚刚亲眼看过的古画是我们梦中的海市蜃楼？

与十五年前比，“皇冠”似乎一成未变。墙上的画还是那一年的，玻璃鱼缸中的水草和锦鲤，仿佛是从那年活到今天，前去吃饭的美国人永远那样轻声说话。我们六人落座的圆桌，离九六年萧平夫妇来时大家落座的圆桌仅一步之遥。当年墙上挂着一幅陈逸飞的女子吹箫图，如今，那幅油画依然悬挂在老地方，可是陈逸飞先生已经不在在了。

十五年的时光，若以“如水”形容，不过

是雨后浅洼中的积水，瞬息被蒸发。不要说十五年过去了，唐宋至今，一千年都过去了。在邓先生家，我们亲眼见到的唐宋元人的《集古惊奇》、南宋马远的《王宏送酒图》，直到邓先生重中之重的藏画——元代王蒙的《滦研草堂图》，都承载着八九百年的历史；明仇英扇面《春江幽亭》、徐渭的《竹石牡丹图》、清八大山人的扇面《鱼群》、板桥的《水仙》相较于唐宋元，到底近了几百年，但也有三四百年，光阴在这些惊世的画面上留下清晰的足音；近现代中国画中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傅抱石、齐白石、张大千和徐悲鸿，他们虽都只是上世纪人，可已无一在人间了。千百年来的传世之作在短



元 王蒙《漆研图》



清 八大山人《鱼群》扇面

短五六个小时中匆匆过目，能不恍惚？能不觉人在古今之间徜徉？

邓先生说：“喝酒吧，喝点什么？红酒。”

殷红的酒色让我想起齐白石的一幅挂轴《梅花图》，用了两种红色来画梅，酡红和浅红，酡红浅红的梅花茂密叠生，从漫长的老枝一路垂下，泼泼刺刺的。杯中的红酒就很像那梅花的酡红。我当时就问邓先生能不能拍照，他说：“能，能，你们拍吧。”

那是一个“时刻”，一个你一旦进入就将永难忘怀的“时刻”。能去邓先生家看画，实乃殊荣。十五年前萧先生前往，我们因为有事没有去成，遗憾与机会失之交臂。我很想对邓先生说，很荣幸有机会见到这样珍贵的收藏。可因为下午受到的冲击太大，还没有恢复平静，竟一时不知如何表达，仅只举杯，祝他和夫人健康。

邓先生是个擅长表达的人，说话讲述深入浅出，以质朴的语言表达内心里的感受。说起傅抱石笔下的侍女，邓先生说，“看看，仕女画

得好清爽，傅抱石画的女人是喝露水的噢。”他的国语是香港口音，而惟其有着浓郁的地方口音，听上去才格外贴切。

邓先生因藏品丰富且品质精绝而享有盛誉，美国各大博物馆的亚洲及东方部没有不知他的，并且与他交谊深厚。接待我们之前，他刚刚去了波士顿美术馆，以及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受到主管热情接待，他们为邓先生专门开放库房，让他看传世藏画，也允许他带远道而来的朋友进入库房。在美国，有建树的华人不少，收藏圈中的华人也不少，极少有人像邓仕勋先生那样得到这样特殊的礼遇。

看画时听他的解说和赞叹，感觉那些画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也去看人家的收藏，是第一次看，那种激越的感情十分罕见，又毫不遮掩，不时展现的笑容有着孩子般的感动和惊讶，传神地阐释了什么叫“迷恋”。

人总是会倦怠的，不论收藏还是写作，不论做官还是挣钱，都会累的，光阴对世上一切

人和事都有销蚀的作用，惟具有因爱而生的激情的人，才会永不倦怠。

二十多年前，收藏在中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虽然中国之前经历过四次收藏热，宋、明、清、民国时期，收藏古物之风蔚为壮观，但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收藏在中国未能兴起。我们在美国，在读书和打工，对古玩和收藏尚在两界中。但因为一幅傅抱石的《湘夫人》，邓仕勋这个名字，走进了我的生活。

“皇冠”离南京何其遥远？往事已经远了，如不是这次见到邓先生，那远去的往事只会更加遥远，渐渐不再能触发珍贵的记忆。

下午，走进邓先生的书房看画，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谢小姐，你家那幅《湘夫人》还在吗？”

我说：“在的。”他转头对夫人说：“她那里傅抱石的画可是一幅好画啊，很难得的！”

说这番话时，他眼睛里的神采，与十五年前我在皇冠酒店看到他时，丝毫没有改变，充满神往之情。

邓仕勋爱画究竟爱到什么程度？

他说起自己一段往事：曾有一位藏家与他协商，要出高价希望他出让石涛的册页，邓先生碍于朋友情面没有办法说“不”，反复思考，最后答应了。与那幅画分别的前夜，邓先生万般不舍，昏昏入睡时竟在梦中哭了，直到把自己哭醒。第二天，他打电话告知那位藏家，实在对不起，画不出让。

邓先生之前问我的那幅画，是傅抱石先生送给我父母亲的，作于一九六一年深秋，在南京莫愁湖旁的胜棋楼成画。当时作画的情景，在《江苏五十年大事记》中，有一张黑白照片为记。当时父亲母亲都在一旁看，傅先生俯身正在作画，还有画家亚明和其他一群人立于一



宋 马远《王宏送酒图》

旁。当时傅先生喝了酒，有些微醉，微醉是傅氏作画的佳境，无酒不成画。萧平先生曾说，这是傅抱石所有《湘夫人》中尺幅最大的、人像离画面最近的一幅，眼神尤其好，他还说，因为傅先生是喝了酒下笔，所以画上的书法是狂草，十分罕见。

邓先生得知我家有这样一幅《湘夫人》，便托朋友引荐，希望能够一见，也想问一问能否出让给他。但因当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的怀

念耿耿于心，自然不舍得，所以邓先生也没有看到。我就是这样知道美国有一个华人老板藏家，正在收藏傅抱石的作品。在中国史上第五次兴起的收藏潮中，邓先生的确走在最前面。很多年后，邓先生再次到南京，仍旧希望能够见一见这位“湘夫人”。那次母亲同意了，但仍旧因不舍得父亲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珍品，而没有出让。好在那次邓先生亲眼看到了“湘夫人”。

看画到中途我才知道，邓先生是特地邀请我看看他收藏的二三十幅傅抱石画作的。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字。今天，收藏拍卖场上，只要有傅抱石的画作，基本可以奠定这场拍卖会的品位和档次。傅抱石成为当代中国传统画高度的标尺，不要说二三十幅，就是一幅精品，也足够让人欣慰不已。很久以来，我一直不知道邓先生藏有那样多的傅氏画，后来跟傅抱石女儿傅益瑶聊天，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是傅家的朋友，深得傅家人信任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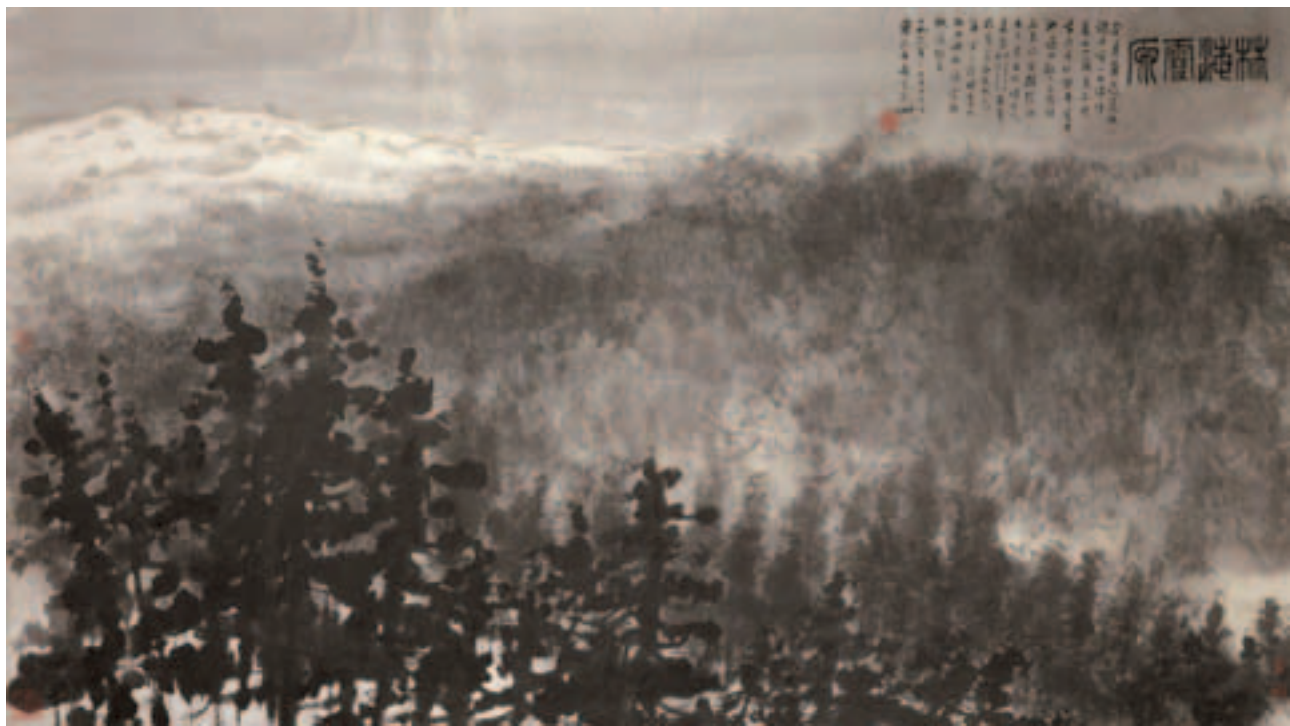
邓先生从傅抱石画开始收藏，只因为他看中了傅氏画超凡的美和笔力。于是从那里出发开始了他长达二三十年的收藏，直至收藏宋元明清巨作，成就斐然。

有一次相聚时，一位老板藏家私下问我：“你看，我们现在买一幅宋画，没有上亿想都不要想，这个老邓，他就这么一家酒店，竟有宋画！”

邓先生何止“就这么一家酒店”？邓先生何止“一幅宋画”？这位先生看起来是没有参透天机。

在邓先生的藏画中，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他的压箱之宝是王蒙的《涤研草堂图》，所有看过并且作文介绍的，都把最重要的段落放在这幅画，以及马远和夏圭的画上，然而傅抱石藏画的数量和质量都仍旧是邓先生藏画中极有份量的一份财富。由于数量多，所以每一批去看画的人，并不是都能看到所藏傅抱石全部画作的。

邓先生说：“谢小姐今天你来了，我给你看



傅抱石《林海雪原》

我全部的傅抱石的画，《林海雪原》也给你看，这幅画在这里我从不拿出来给人看，因为你父亲也是藏家，他跟傅抱石又是朋友，所以我要全部给你看看。”

当《林海雪原》缓缓从高处往下展开的时候，我那颗很难感动的心起了激动，时光交错，此来彼往，影影绰绰几十年的人和事顷刻之间交汇在画面上，令人掩面。

这幅画作于一九六一年，迄今整整半个世纪。画作完成四年之后，傅先生与世长辞。

《林海雪原》的用墨和气象，我无法用文字描述，需亲身去感受画面上和画面后的意境。邓仕勋所藏傅抱石画，爱莲居出版社印刷出版的《涤研草堂珍藏画集》中，有萧平先生专门写的文章，做了精准专业的阐述。

面对《林海雪原》，我突然走进别人看不见的所在，站在墨色淋漓的画面前，人是静的，心里却翻江倒海。往事奔涌而来，我看见早已不在人世的父亲，嗅到了父亲书房里熟悉的书卷气息，桌上的水丞、端砚徽墨、笔架和毛笔忽然一一陈列眼前；看见父亲常年挂在书房的“湘夫人”，她哀婉宁静的眼神，朱砂红唇，衣袂飘飘，身边数片凄清的落叶。进去看到她，出来还是看到她，我当时不懂得为什么父亲如此钟情这幅画，画画的人不是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傅抱石先生，但也许见过的，因为他常去我家，在父亲诸多的朋友中，一定有过那个了不起的身影。而那时的父亲也未必想得到几十年后，傅抱石先生会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成为擎天大柱和一代传奇。

我也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人生，总是与这幅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我结识的很多人也都与傅抱石先生有关，及至今天，到邓仕勋先生的家里欣赏他的精绝藏画，与他共度中秋，



左起：蔡苏津、邓仕勋、谢舒、萧戈、谢念和《林海雪原》

无不与此有关。

邓先生拿出所有珍藏的傅抱石画，使我在远离南京的纽约，忽然感受到久已远去的人生状态，那种精致文雅但又豪迈恣肆至真至美的人生状态。这种状态被父亲带走了，被傅抱石带走了，但却因为邓仕勋先生的不懈努力，她又闪亮起来，像烧红了的红炭火埋在灰烬中，一朝拨开灰烬，炽热的光芒便在周围气息辉耀。

邓先生知道我喜欢文字，于是拿出来一封信让我读，那是一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先生写给邓仕勋的信。邓先生说：“来，听说你很会写，很能写，让你看一封信。”

我本以为是一封英文信，不料这个道地美国人却是用极好的中文写的，文笔流畅，字字达意，精确而情意切切。

何慕文先生称邓先生“涤研草堂主人”，这个堂号就是来自他本人所藏王蒙的《涤研草堂图》。

摘录几段何慕文信中的文字：“……恭喜您建立起美国一个最好的中国画收藏，这是个大成就。您的每件藏品都值得在博物馆展出……保存您的收藏的完整尤其重要，以显扬您的鉴

赏力和您所赞赏的画家的创造力……我希望有机会与您合作，使您的收藏将来纳入大都会博物馆，与中国近代其他最重要的鉴赏家像张大千、王己千、翁万戈等人的收藏汇聚一处……将其藏品的大部分集中在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中保存……”

接下来，何慕文动之以情的笔触更深深地打动了，我竟忽然落泪。他说：“作为一个来美国成家立业的移民，您的收藏若能长远地造福其他美国人，以此答谢美国给您成功的机会，将会更有意义……您也将协助我们教育美国民众中国文化和艺术鉴赏的最高理想……你提供的傅抱石画就有助于阐释中国地景画的悠久传统。”

在场的人一时都静下来，让我流泻的感情有个宁静的空间，邓先生一言不发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他一定猜到我是看到哪一段掉泪的。以他在收藏中展现的洞烛幽微的洞察力，他对人的心理也一定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没有这一点，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他多么富有，都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藏家。

何慕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给邓先生的信：“蒙特伯乐馆长常说‘伟大的艺术无法彰显自己’……希望我们能够协力达到更高的目标。”

一个早年从香港来到美国的默默无闻的移民，辛苦努力地经营餐饮生意，一家人同心协力，在异国他乡合法劳动合法挣钱，用挣来的钱开始漫长而智慧的收藏，直至走到光辉的顶点，这是何等的成就！

何慕文先生的信文，用的副词都是比较级中的最高级，但在我读来，“移民”两个字最感性、最动人，正是在“移民”二字的背景下，邓仕勋先生才彰显了他的伟大收藏和他作为藏家的响亮名字。

晚宴结束之前，我们再次举杯感谢邓先生给我们如此的荣幸。邓先生说，“不客气，我这是替大家暂时保管的。”

“皇冠酒店”外夜色清澄，月亮升上中天，孤独宁静，纯澈一如千年之前。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知道马远、夏圭、王蒙、董其昌、王原祁、八大山人等等卓越的名字，并有幸看到他们杰出的画作，除了史书的记录，历代的藏家功不可没，他们默默无闻地承接和传递着文化的记忆，他们的名字同样功垂千秋。邓仕勋这个名字，便是其中之一。

北宋书法家米芾说：“绢八百而神去，纸千年而神去。”祈祷再有八百年一千年，后代仍旧有幸能看到伟大的真迹。

那时候的人，将会在众多的神品上，看到一枚收藏印：仕勋心赏。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纽约

谢舒 女，现定居美国。翻译并发表《女性与美》、《全美中学生获奖作品选》、《陪读太太》、《华尔街石漂》、《海外寻奇》等。

乐者，天地之和也

——写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55 周年交响音乐会节目单上

III 叶小文

《礼记·乐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是我们的先人对交响乐的描述和想象，这也是中国文化对交响乐的认同和赞赏。

交响乐不光属于西方，也属于中国，且早就属于中国。

作为以“社会主义”命名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作为以“中华文化”命名的中华文化学院；

作为正在大力贯彻中共中央颁发的《2010—2020 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加强正规化建设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作为正在大力贯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努力的中华文化学院——

应该有交响乐来为她“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应该有交响乐来为她鼓劲，为她洗礼，为她祝福，为她歌唱！

来了！今天，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的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家们，来到了我们学院。



叶小文大提琴独奏

听吧！脍炙人口的中外交响乐名曲，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的礼堂里缭绕和回荡……

叶小文 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中央社院建院 55 周年交响音乐会侧记

11月22日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礼堂华灯璀璨。享有盛誉的中国爱乐乐团为全国的“社院人”带来了一场视听的盛宴。在文化艺术方面颇有造诣的李岚清同志亲临音乐会现场，并向中央社院赠书，送上了良好祝愿。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红旗颂》，音乐会拉开了帷幕。曲目既有富有民族特色的《炎黄风情》组曲，更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乔治·比才的《卡门》组曲和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叶小文书记的大提琴独奏自然是整场演出的最高潮。小文书记曾是业余大提琴手，对交响乐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在担任国家宗教局局长期间，就大力提倡用交响乐这一西方的艺术形式来诠释东方文明的心声。今天，在中国爱乐乐团的伴奏下，小文书记为我们完美地演绎了舒曼的《梦幻曲》，旋律悠缓，渗透着梦境般静谧甜美的诗意，博得全场掌声。

小文书记在祝辞中说，我国先人早就有对交响乐的描述和想象。傅聪更是说，“西方音乐的境界，我们中国文化早就达到了”。普契尼的经典歌剧《图兰朵》已经在古老的故宫太庙上演，亚洲的小泽征尔、祖宾·梅塔可以指挥西方乐团，中国的李云迪 18 岁就能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这不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吗？交响乐巨匠贝多芬自豪地宣称：“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可见，音乐是世界的语言，不受国界种族的文化障碍，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载体。用这样一场交响音乐会来庆祝中央社院建院 55 周年，正体现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担当！

结束曲依旧是《拉德斯基进行曲》，乐声在礼堂余音绕梁，这正意味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永远不会结束。其实，这也是一场雅集！

潘庆磊 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关于《富春山居图》的思考

卍 萧 平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我曾两次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亲密接触，第一次是1996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第二次是今年6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次仅看到了《无用师卷》，第二次则是《无用师卷》与《剩山图》之合璧，还同时看到了曾被乾隆误判为真迹的《子明卷》及数家临仿本。欣幸之中，想到了一些问题，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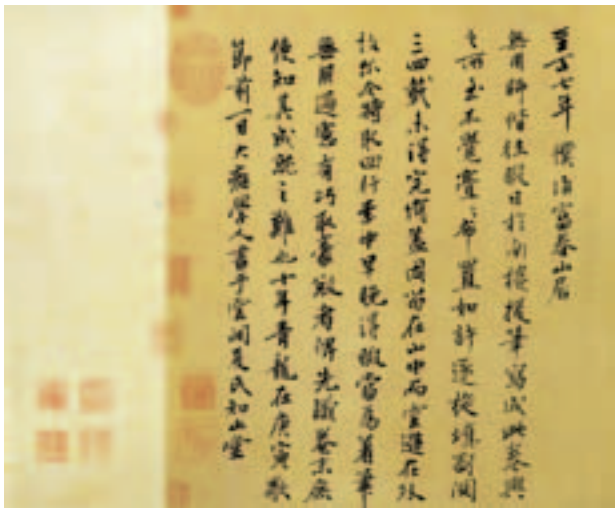
《富春山居图》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于1350年创作的山水长卷，在高33厘米，长约700厘米的画卷里，画家以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富春江沿岸的自然景色与生活状态，表现出作为隐者的黄公望“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生命情怀。在艺术上，以书入画，拓展了笔墨的表现力，开创了抒情写意的新境界，在中国文人画传承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件旷世名作。

黄公望（1269—1355），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江苏常熟人，本姓陆，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永嘉九十岁老翁黄乐，无子嗣，收养了陆家这个孩子为义子。黄翁高兴地说，“黄公望子久矣！”这便是孩子取名“黄公望”，字“子久”的来历。黄公望虽出身低微，但他奋发上进，博涉经史，多才多艺。年轻时曾在府衙里任办理文书的小吏，中年被引荐入京师任职，后因案受牵连入狱。五十岁出狱后放弃功名，浪迹于江湖之间，以道士

为业，并以寄情书画为乐。他经常游历于苏州、杭州、松江、富春等地，游历所见，皆化作胸中丘壑。在元至正七年，他前后用了四年时间，为他的同门师兄弟一个叫“无用”的道士，画了这幅《富春山居图》。一幅画何以画了三、四年？在画家卷尾的题识中，得到了答案，“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时79岁），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叠叠布置如许。逐旋填割，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其成就之难也。十年（公元1350年，时82岁）青龙在庚寅，歇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这段题识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有三点：一，《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的晚岁之作，此作完成五年后即去世。二，此画是画给一个叫“无用”的同门师兄弟的，无用担心有“巧取豪夺”者，嘱黄公望在尚未完成的画上先题上自己的名字。三，因常常云游在外，“早晚得暇，当为着笔”，这幅画从其79岁画至82岁，长达三、四年时间。

《富春山居图》的流传

黄公望死后十三年，即1368年，元朝灭，无用带着这幅《富春山居图》由元入明。如朝代的兴亡更迭一样，《富春山居图》也进入了人世的纷争，



黄公望于《富春山居图》卷末写的跋尾

开始了它奇异的流传历史。

一百年后，吴门大画家沈周曾经短暂拥有过这件名迹，却被别人巧取转卖给了苏州节推樊舜举。

沈周在1487年背临《富春山居图》的题识中说得较为清楚：“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平生不见多作。辍凡三年始成，笔迹墨华当与巨然乱真，其自识亦甚惜。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乾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即其思之不能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

此卷后归无锡谈志伊。其时在1570年，他又请了文彭、周天球等人题记。

公元1589年，《富春山居图》流转至北京，为周氏所藏。董其昌（1555—1636）时在京师任职，有机会亲睹此画。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是“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具畅”。他终于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奉旨往长沙的途中，在一个叫泾里的地方，由友人华某介绍购得此画，欢呼雀跃，如获至宝，藏之“画禅室”中，连呼：“吾师乎！吾师乎！”

或许因为晚年景况困难，董其昌于崇祯九年（1636年）以千金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了宜兴

的吴正志。不数年，董氏故，画即归吴氏所有。其后，继归其三子吴问卿。吴问卿对此画极为宝爱，筑“富春轩”藏之，还请其友人书画家邹之麟为之题跋。据邹云：问卿数十载“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坐右，以食以饮；倦之为爽，闷之为欢，醉为之醒”，真是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然而，这种病态的“宝爱”的结果是使《富春山居图》遭遇火殉之难。

清顺治七年（1650年），吴问卿临终时，竟命家人将《富春山居图》与智永《千字文》等为其火殉。第一日，焚《千字文》，第二日焚《富春山居图》。幸其侄吴贞度在问卿弥留昏瞶之际，易以别卷，从火中救出，但已烧焦前段四尺有余。

焚后的《富春山居图》在重新装裱时，烧焦的部分被割下，即是所谓的《剩山图》，先为王廷宾所得，1938年经上海汲古轩曹友卿介绍，为吴湖帆所有，1956年征归浙江省博物馆。

焚余长卷《富春山居图》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后又辗转被季寓庸、高士奇、王鸿绪所藏。王鸿绪死后，其家人欲以此图利，索价千金，可惜当时吴中文人无大力者，王氏家人遂携此卷至扬州，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书画鉴藏家安歧所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安氏家道中落，遂由友人傅恒介绍，将此卷连同其他古物以两千金一并卖给了清内府。至此，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身首异处。

在此卷进入清内府的前一年，乾隆皇帝先得到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因上款为“子明”，故称“子明卷”，此实为明人摹本。乾隆却视为真迹，在画上一题再题，前后题了五十四次，画上所有空白处甚至部分山石上都题满了。第五十五次，观览后书了“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这样一来，当真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来到乾隆宫中的时候，即被判为伪作了。因为乾隆皇帝真伪颠倒的误判，《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从1746年被打

入冷宫，直到民国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在上海停留期间，邀请上海名家吴湖帆、沈尹默、叶恭绰及吴湖帆的高足徐邦达、王季迁等鉴阅后，才发现乾隆皇帝把假的当真，真的当假了，两百年的冤案方得以澄清。

《富春山居图》离与合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讲一个故事，在元朝有一个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

《富春山居图》的流传经历，是一件宝物的离合故事。离的悲，合的欢，实在是沧桑人世的悠久主题。于物如此，于人生，于家国民族，无不如此。东坡居士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富春山居图》的杰出创造，与其在六百多年过程中经历的沧桑之变和悲欢离合，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关注。今天，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这个焚断三百六十年、分离两岸六十年的巨作得以完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当我们与众多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徜徉在台北故宫展厅里，仔细地观赏着先辈们留给我们的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时，早已忘却了身在遥远的海峡彼岸，其感觉，就是在自家的厅堂里欣赏自家的宝物。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得更远的！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流传的经历，说到底是一个个有关艺术品收藏的故事。不同的故事，折射出不同的心态和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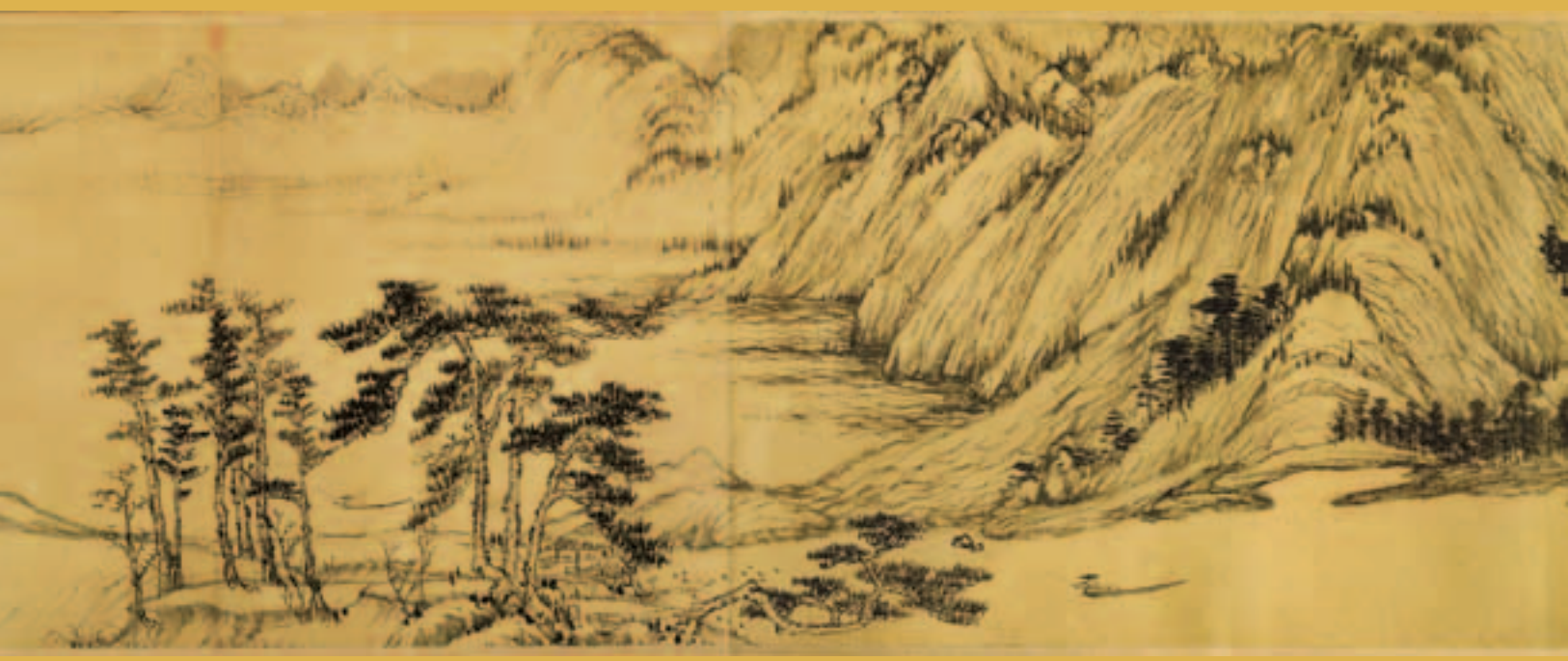
第一类如沈周、董其昌、吴湖帆等，他们收藏艺术品的目的是欣赏、研究、学习与借鉴。

沈周，为明代杰出的山水画家，“吴门四大家”之首。沈周对于《富春山居图》的从有到无，其态度是“思之不能忘，乃以意貌之”。他凭印象追仿的《富春山居图》，完全出于对先贤艺术的热爱，是继承与借鉴。沈周的《富春山居图》，民国初被徐世昌收藏，徐的后人在“文革”中被抄家，这幅画被送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落实政策归还后，其子女将其送到北京的拍卖会拍卖，徐邦达先生看到了，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由故宫博物院买下收藏。这次也被借展于台北故宫。

晚明董其昌，富收藏，精鉴赏，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是中国画“南北宗论”的倡导者。他对元人绘画推崇倍至。他得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连呼“吾师乎！吾师乎！”这样的痴狂，也只能是真正的画人才有的。在董其昌之后的金陵大家龚贤，曾师于董，他在古稀之年所作的画中说到王绶、沈周晚年以“倪黄为游戏，以董巨为本根”时，也激动地发出：“吾师乎！吾师乎！”的感叹，这里所反映的，是画家对于艺术的不加掩饰的真诚。

吴湖帆是现代海派书、画、鉴藏大家，他得到《剩山图》珍爱异常，对火焚的原作进行了一定的修补和重新装裱后，亲自在包首题写“画苑墨皇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真迹烬余残本”，珍藏于自己的“梅影书屋”，并对《富春山居图》真伪事非的还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才有了今天这个圆满的会合。

第二类如吴问卿们，是对艺术品病态的占有欲。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他是爱的，爱得执着，也爱得痴愚，他被缠缚得无法解脱，而缠缚他的正是一己之私，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对艺术珍品的摧残，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第三类是权贵者的心态，他们将艺术品当作玩物或精神的附属，不仅贻笑大方，还可能让艺术品蒙受另一种灾难。乾隆帝对于书画的痴迷，并非真正出于艺术上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物的态度。他喜欢在书画名迹上题跋、钤印，对书画珍品而言，这常常是一种灾难。因为画家的创作，十分讲究画面的虚实与位置经营。幸亏在真的《富春山居图》进宫前，有了一件仿作《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否则，真迹《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也必将成为他无病呻吟的题字消遣之处了。

今天的国人，对于艺术品的收藏，尤其是古书画的收藏，无论是规模还是热度，大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这个热度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又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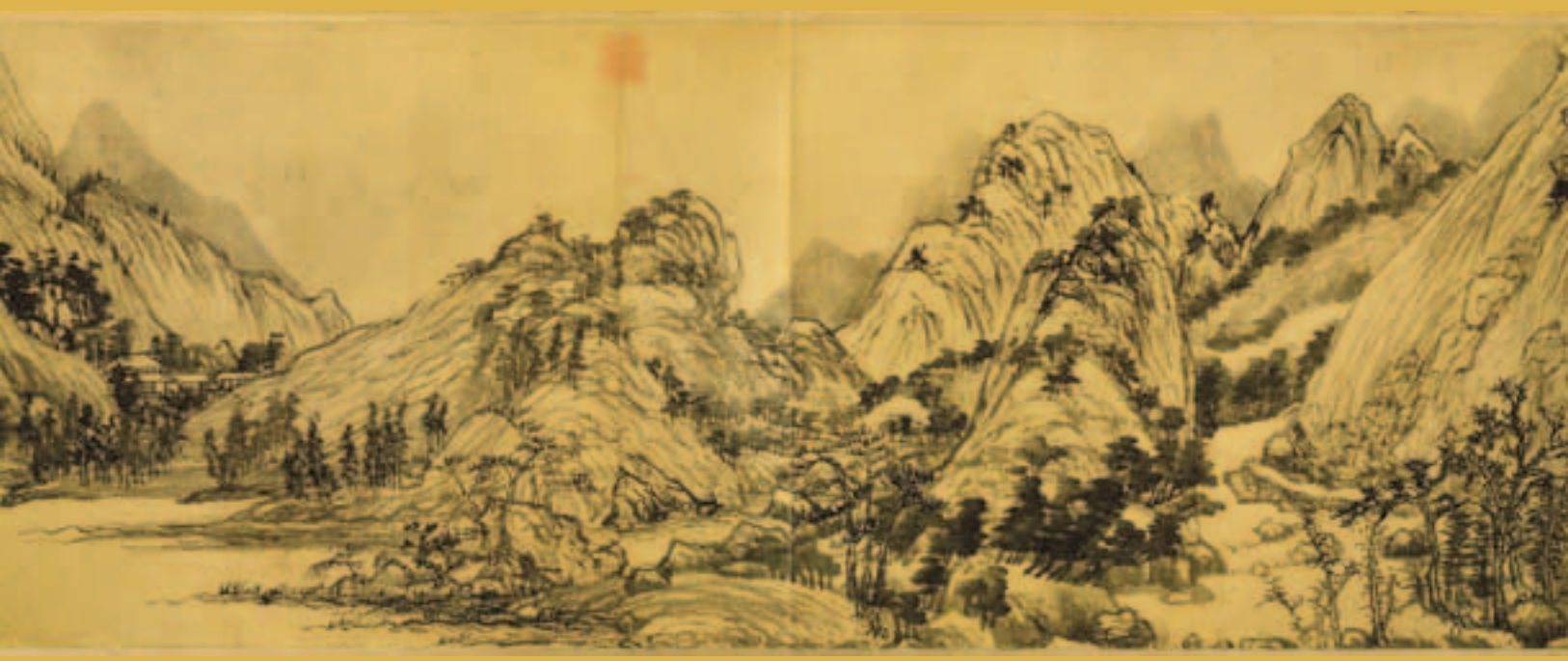
一是人们对于著录、出版物和权威的笃信与依赖。如近年许多创纪录的高价书画都出自《石渠宝笈》的著录。二是求大、求贵，或追逐皇族遗物。一件作品，有了皇帝的题跋或印记，便身价百倍。其实有些印记和题跋，恰恰是对于原作章法的破坏，显得极不和谐，它所反映的只能是一种皇家对于艺

术品霸道的占有心态，是一种“俗”，与书画本身的高雅、清逸的品质是相背离的。三是跟潮、跟风，对于大名头、热名头的追逐。历来书画家名头有大小之别、冷热之分。其实，大与小，冷与热都是有时间性和相对性的。清初的八大与石涛，他们的作品虽有很高、很独特的艺术价值，但在清代并不为皇室所接受，清宫基本没有收藏他们的画，仅有的一幅石涛墨竹，还是因为有王原祁补画了坡石，由满族官僚博尔都呈进的。因此，八大与石涛在尔后的一、二百年中基本被埋没，直到二十世纪初始被重新发现，渐由冷变热。那么，艺术品收藏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元代文人绘画的意义

因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激发，我们不妨重新关注一下元代绘画。

元代（1271—1368）绘画受士大夫论画标准的影响，文人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在这个时期，中国画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写意精神与诗书画的合体，已经完备成熟。赵孟頫在题画诗中写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出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说明了书与画的关系。吴



镇说：“画事为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表明画家本身应具有的文化素养及诗文、书、画的自然结合。在绘画风尚上，元代绘画以复古主义为主导，元初两大主将赵孟頫、钱选，他们跳过两宋，取意唐人，倡导“以古为新”，其实是一种创造。在绘画实践上，元代的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被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瓚、吴镇在山水画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他们对自然山水的理解，超出了一般具象的认识，将参禅悟道活动融入到对山水的理解中，且都具备着文人写意精神，对中国山水画意象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英国的东方艺术收藏家莫士搦曾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与中国的“元四家”相比较，认为中国文人艺术超前欧洲近十个世纪，因为“元四家”的写意精神，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绘画中才能看到端倪，这是我们民族艺术的骄傲。然而，在我们的义务教育中，中学生往往能够说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却不一定知道黄公望、王蒙、倪瓚、吴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遗憾。

在认识元代文人绘画时，我们不妨对照当今画坛。可以说，元代绘画的“特长”，正是当今中国画界的“特短”。文化学养的缺失，写意精神的委顿，制作之气、炒作之风与急功近利，无不是中国画的

大敌，是我们需要深省的。

在参观“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的过程中，陪同并给我们做讲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副研究员，她在与我们交流中说，其实，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过去也展过，都没有引起这样热烈的场面，这其中媒体的力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宣传不仅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新闻媒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导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是宣扬高雅文化，还是宣扬低级、庸俗的文化，反映着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中国画的传承与推陈出新并不矛盾，一味的模仿，不是传承；一概的否定，不叫创新。无旧何以为新？盲目无根由的所谓创新并没有意义。温故而知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萧平 男，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美术馆鉴定顾问、南京博物院鉴定顾问、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民进江海书画会会长、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政协书画室顾问。江苏省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书法：

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III 孙晓云

学习书法不是功利的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我们中国人起码的义务。传承书法正是为了维系我们民族自尊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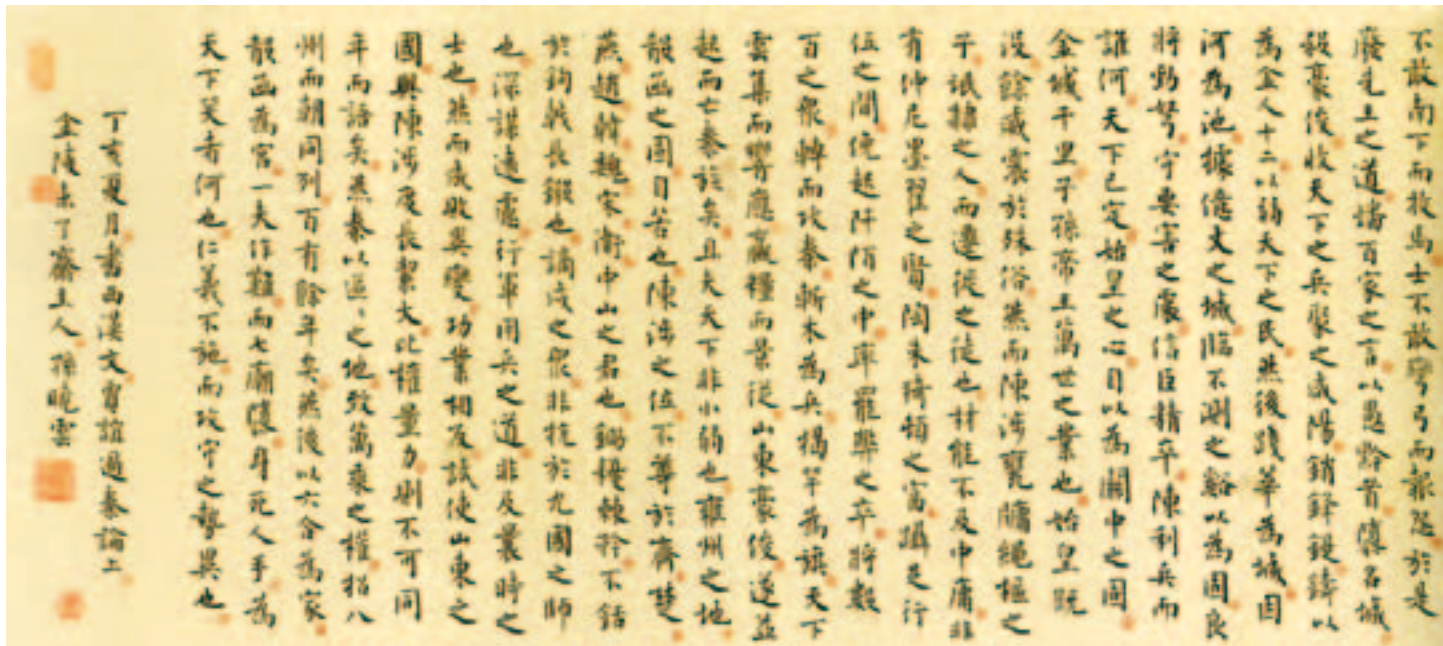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立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弘扬中华文化。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面临着传承、弘扬、创新的使命。

作为来自书画界的唯一代表，我有幸列席十七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我提出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着眼文化强国的长远建设，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如何与时俱进地承担一份神圣的职责？文化的繁荣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文化永远是炎黄子孙的骄傲。作为书法的继承者，我感到在当今世界文化不断碰撞的时代，传承中华文化意味着传承文化的自觉和民族的自信，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书法上，每个中国人都要写好中国字。

书法传承面临挑战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



作者手书贾谊《过秦论》

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

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

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

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用在上奥数班、外语培训。书法一度成了选修课、兴趣课，学习书法要花钱另外找老师、上培训班才行。

当代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已成为完全的纯艺术，成为极少数“艺术家”的工作。“字如其人”、“字如心画”已失去了它的最终意义。作为书法传统来说，我们面对的历史境遇是前所未有的。

书法传统的误读误解

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



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课程。

近二十年来书法发展表面看起来繁荣热闹，展览频频，出版物大量涌现，书法博士硕士培养人数逐年增多，多处书法名城建立等等；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书法最基础最关键的幼儿训练，把它作为选修课，耽误了人生最重要的学书法的阶段。书法这门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成了兴趣和特长。家长希望孩子学书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功利思想，如在书法大赛中获奖可在中高考中加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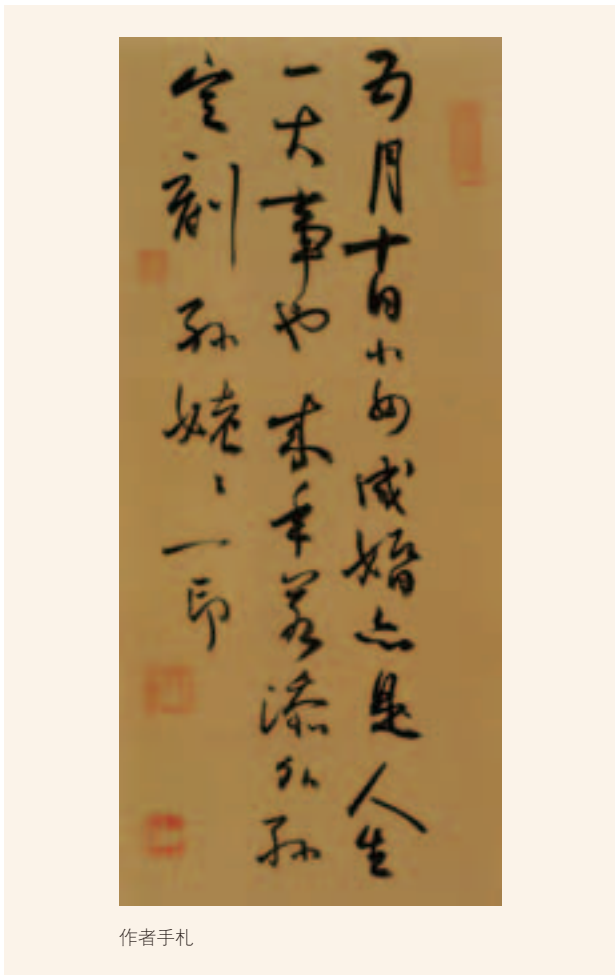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

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当前书法发展遇到的问题在于，书法发展、延续了五千年，至今全民还在使用汉字，却在短短几十年中忘却了书法——如何用毛笔写字。因为文字与书写断裂，造成书法作为国民基本文化素质的缺失，对汉字整体认识的缺失，继而造成了对书法史论的误读、误解，以及对中文字、文化发展的误读、误解。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书法的承传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化的承传不是一句口号。中青年一辈的书法研究与创作者，对传承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是最重要的坚持者。和前辈相比，他们的坚持未免要艰难得多。中青年书法家不仅需要不断充实和学习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用已有的知识，来适应和感染社会，起到引领的作用。中青年年富力强，承上启下，有充足的精力，有着广泛而集中的话语权。如果中青年不仅从自身做起，还可以用自己的条件，号召和影响更多的人重视国家的“软实力”，那必将在社会上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作者手札

孙晓云 女，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市书协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书法有法》、《孙晓云书法精品选》等。

南京傅抱石纪念馆札记

III 薛亮

南京历史上过往的文化名人多，所以名人故居也多。在如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北侧就有一幢西式小楼矗立在一座小山上，这里曾是近代中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的故居，现已作为傅抱石纪念馆向公众开放。

傅抱石先生举世闻名，不仅艺术成就卓越，而且为江苏省国画院的首任院长，开创了新金

陵画派的辉煌。因此崇拜、仰慕傅抱石的人众多，而傅抱石故居则成为最好的拜谒之地。要说明的是傅抱石的故居在南京实际上有两个：傅厚岗故居和汉口西路故居。外地的游客经常混淆，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这两处的渊源。

抗战结束后傅抱石回到南京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于1948年在傅厚岗购地建房，与



纪念馆内傅抱石塑像



傅抱石《长征第一桥》

徐悲鸿为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受聘国立南京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于当年12月由南大宿舍迁入傅厚岗6号新居。1952年，南京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傅抱石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傅抱石任院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傅抱石全家都居住在傅厚岗6号，而随着傅抱石声名日隆，来访者日多，这里愈加忙碌了。只是后来傅家对面的印刷厂的噪音严重影响傅抱石的创作，1963年在政府关照下，傅抱石携全家搬到了汉口西路132号，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汉口西路132号原本是民国一位要员的别墅，溯其历史据说曾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小仓山房”旧址，与金陵女子大学旧址（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隔路相望。此处建筑建于

上世纪四十年代，历经沧桑，至今来访者无不被这里清幽的环境和深厚的民国气息所吸引，可谓一个有历史的大花园。傅抱石所居时的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小山头上的米黄色西式小楼，围绕小楼的几间平房，从山上主楼到山下大门口的蜿蜒大路和主楼后面藏于紫藤架下的崎岖小道，民国时建的大门门房……整个小山草木葱茏，特别是原来在主楼南面有五棵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参天雪松擎天而立，气势撼人。现在还保留着四棵大雪松，殊为难得，只是松下原有的金鱼池不见踪影，甚为可惜。除了雪松，主楼东侧的庭院还种植了各种林木花草，树阴下散放着石桌石椅，在此品茗聊天是十分惬意的。傅益璇回忆傅抱石曾很喜爱庭院中的紫藤，总是“安静地欣赏那静静地飘落的花瓣。我想，

那时的父亲，心情应该是愉快而宁静的”。令人唏嘘的是1965年9月傅抱石突然病逝在汉口西路寓中，在这里只生活了两年时间。“文革”中傅家历经磨难，曾被迫迁出这所大宅。经过漫长的等待，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1985年9月傅抱石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汉口西路的故居建立傅抱石纪念馆，并于198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2009年，江苏省文化厅又拨专款对故居进行了全面修缮，并新建了“傅抱石先生生平陈列”展厅，使纪念馆的馆容馆貌呈现出新的气象，焕发勃勃生机。傅抱石纪念馆首任馆长是傅二石先生，第二任馆长为徐善先生，现任馆长由笔者兼任。

目前傅抱石纪念馆由故居和生平馆两部分组成，占地约三千平方米，庭院中有傅抱石女婿叶宗镐先生所塑傅抱石汉白玉头像及傅抱石书法碑刻。

由于“文革”的冲击，故居楼内的家具、陈设基本无存，现只能基本恢复会客室和画室。会客室南墙上悬挂着清代“西泠八家”之一黄易手书的楹联“左壁观图右壁观史 无酒学佛有酒学仙”。这可是傅抱石生前最喜爱的对联。从墙上挂的老照片对比如今复原的客厅布置，窗外景致如故，可以想见傅抱石在这里迎来送往的情景，而现在却只能睹物思人了。上二楼进入傅抱石画室，这里尽藏着故居的精华。画室门头挂着郭沫若手书的“南石斋”匾额。画室内陈列有画案、青铜笔架、笔筒及各种画笔。墨盘内的墨迹已积累了尘垢，但仍依稀可辨傅抱石探笔调墨的印迹。画案后是书橱，里面收藏有各式线装书和画册数百册。这些藏书纸质已经发黄变脆，现已封存起来得到妥善保护。画案对面墙上挂着傅先生未画完的大幅山水画，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现为纪念馆的镇

馆之宝。画室门边的百宝架摆放着遗存的收藏品，其中一个发旧的茅台空酒瓶格外醒目，令人不禁想起傅先生“往往醉后”的许多佳话。画室内还保留了傅抱石生前用过的画箱、沙发、座椅等物品，它们使得画室整体布置极有现场感，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在去世的前夜，傅抱石仍在这里笔耕不辍、纵情挥毫的情境。与其他空荡荡的屋内陈设相比，画室是整个纪念馆保存实物最多、最完好的展室，让人不禁感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欣慰。除了客厅、画室，整个故居内还有傅抱石和夫人罗时慧及其子女的卧室，墙上挂着的十多幅家庭照片见证了傅家过去生活的难忘时光。

故居西侧的办公楼新建了“生平陈列厅”，里面珍藏有傅抱石曾使用过的文房四宝、手稿、出版物、印拓等展品，并且按照现代博物馆陈列要求制作橱窗展柜，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全面展示了傅抱石不平凡的艺术人生。另外陈列厅还开辟了音像室，运用声、光、电、多媒体技术展示珍贵的傅抱石影像资料，为游客全方面了解傅抱石提供了更详实的信息。出于安全的考虑，纪念馆的馆藏作品均以仿真画的形式展出，但作品仿真程度极高，一般观众是难辨真伪的。

傅抱石纪念馆规模不大，却是规划精巧、内容丰富的一处景观。它现在全天候对外开放，每年要接待许多海内外观众，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已被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薛亮 男，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傅抱石纪念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政协常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诗书琴剑：古里的记忆密码

III 徐雁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履庆堂

古里镇旧称“罟里”，或称“菰里”，隶属于江苏常熟，地处“虞山福地”东南十里许。“天下常熟”的稻米与“网船捉鱼”、茭白丛生的古里，形象地交织出了一幅江南鱼米之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生动场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清道光年间，这一带“沃壤千畦，桑竹弥望”，“稻畦柳陌，蟹舍渔庵，弥望无际”，有“绕岸一湾溪水绿，当门十里菜花香，垂柳又垂杨”（瞿镛《铁琴铜剑楼词钞·望江南》）的风景，深得“柴门临水稻花香”的高士隐居之致。因此在177年前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县张组绶特书“古里仁风”之匾，予以表彰，从此改称“古里”。

在中国文化史上，常熟古里镇以源远流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茆山歌”，“虞山十八景”之一的钱柳氏“红豆山庄”，以及瞿氏从“恬裕斋”到“铁琴铜剑楼”藏书而闻名。如今，

又获得了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所授予的首个“华夏书香之乡”的人文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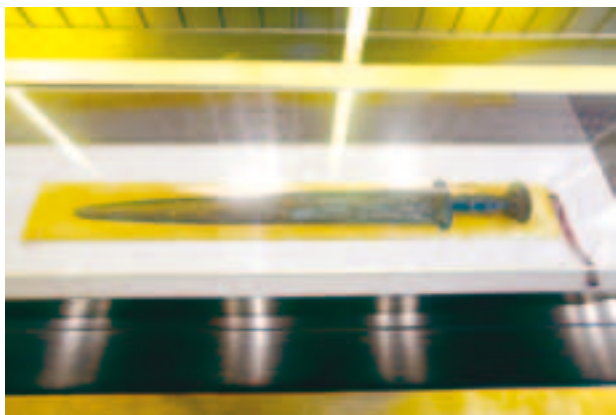
瞿氏远祖可上溯到晋代高士瞿镛；常熟瞿氏的始祖，则是明末抗清名臣瞿式耜。古里瞿氏五代藏书有五个特点，也是我们认识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五大亮丽看点：

一、藏书求宝，富有宋元善本，从而雄踞中国“晚清四大藏书楼”之列

清嘉庆、道光年间的瞿绍基（字厚培、荫棠，1772—1836年）自奉甚俭，有“一裘三十年”之风。他“一试职即归隐，读书乐道，广购四部，旁搜金石。历十年，积书十万余卷，昕夕穷览，尝绘《检书图》以寓志”（黄廷鉴《恬裕斋藏书记》）。

瞿绍基的收藏，很有眼光，他关注的是书中的精华瑰宝——“宋元善本”（同治《苏州府志》）。起初，其恬裕斋藏书曾与常熟城内的“藏书二友”——破山寺下的稽瑞楼藏书主人陈揆（字子准，1780—1825年）、张海鹏（字若云，1755—1816年）鼎足三分，“竞事储藏”。陈揆藏书多搜集史志、野乘、家说，手自校勘，并辑注多种与常熟地方史志有关的书籍，著有《稽瑞楼文草》等。所藏多至十万余卷，吝于借人。而张海鹏所藏与陈氏相当，也是十万多卷，但他喜收宋、金、元文集和新旧钞本，尤其是常熟钱氏、毛氏旧藏之书，精秘之本多达一二万卷，所刻书甚多。陈、张两家所藏散出后，瞿绍基“复遴其宋元善本为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书，遂甲吴中”。其时“海宇升平，江表无事。于是大江南北，浙水东西，书贾云萃，自前明暨国初以来诸家旧藏之本，咸集其门。府君辄出重价购之，不足则谋诸质库以应之。”（张瑛《瞿君家传》）杨文蓀题诗中有“先生嗜好专，重值酬书贾。精勤谢尘事，研覃阅寒暑”。曾觅得古董级文物铁琴、铜剑各一，这是瞿家藏书楼名字的来历。嘉庆时名儒孙星衍手书“铁琴铜剑楼”篆字横匾，至今珍藏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

绍基之子镛（1794—1875年）是贡生，字子雍，居菰里村，他继承其父藏书之志，尝自咏其楼云：“吾庐爱，藏弄一楼书。玉轴牙签频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铁琴铜剑楼词钞·望江南》）据说，他“好聚书……博且精”，“暇辄静坐，手一卷，或鉴别古玩，率以为常。”汪氏艺芸精舍藏书承黄氏百宋一廬、周氏水月亭、袁氏五研楼、顾氏小读书堆等大家之绪，瞿氏得其半，于是宋元本多达二百余种，抄、校精本难计其数，共积至十余万卷，藏于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履庆堂内陈列的铜剑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履庆堂内陈列的铁琴

铁琴铜剑之楼，遂由“常熟藏书三大家”崛起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

二、编书立目，前仆后继，为中国文献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宝贵学术资源

瞿绍基所著有《恬裕斋藏书记》、《恬裕斋书目》各四卷传世。瞿镛有《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四卷、《恬裕斋碑目》不分卷稿本、《罟里瞿氏邑人著述目》一卷等传世。瞿镛编纂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瞿果行标点，瞿凤起复校）。该书日本由瞿镛延请季锡畴、王振声厘订撰成，凡二十四卷，“每书之后必载其行款，陈其同异，以见宋元本之善”（宋翔凤《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序）。凡收书一千三百余种，辨析版本尤精



铁琴铜剑楼第一代楼主瞿绍基

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棠。自奉俭约，崇尚多文为富。在父亲度藏经史图籍基础上，广泛购置宋元善本，历十年积书十万余卷。书斋取名“恬裕斋”。

当，为世人所称道。书稿成后，仅刊行经部三卷，不幸遭逢战乱，书板毁于兵燹，未及刊完而卒。

至光绪元、二年（1875—1876年），秉清兄弟延请同郡学者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至罟里家中，重校该书目，完成了经、史两部，子、集两部迁延近三年而未成。秉清“乃于光绪三年八月初旬，偕（张）瑛同赴郡中，面邀诸友来乡萃业。留滞两日，聚晤极欢。诸君约以重九赴虞山看菊，兼校子集两种，君闻约欣然。初七日于舟中适霍乱……行至陆墓卒”，临终时遗言要求继续完成“重编书目”之事，因此张瑛在《瞿君家传》中评价说：“功不可没，志尤可悯，君不特为一家保守遗书，实为东南文献留一线之传。”

至启甲时，与其兄启文、启科刊印经累代撰写、增补、校正之书目凡二十四卷，两兄早

逝，良士乃独力支持，于光绪二十四年始底于成。至光绪二十八年（1898年）问世，共收录图书一千一百九十四种，其中，宋刻一百七十三种、金刻四种、元刻一百八十四种、明刻二百七十五种，钞本四百九十种，校本六十一一种，其他七种。历祖孙三代历五十余年乃成，可知事之艰。

瞿凤起先生擅长版本、校雠之学，服务于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保管和研究工作，校注家藏本《周易要义》等多种。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标点重印此书，延请凤起先生担当此任。于是从一九八六年夏开始，凤起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该书目稿的校补工作之中，他“边喘边咳，边用颤抖的双手剪着小纸条，写上注文，逐条贴在书名下端加注。至一九八七年春节后，全部完成校雠、增补及文字纠正工作。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托同里友人将书稿送交出版社。不料二日后凤起即卧床不起，于三月一日与世长辞，距书稿送出不足十日！”（《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跋）

一九九六年春，该书目稿交瞿果行先生校正。两年后，尚未付梓，果行先生亦弃世而去。直到一九九九年秋，经常熟地方志办公室多方协商，方解决出版事宜，书乃问世，亦十五年矣。这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编撰问世的曲折如此。

三、读书明理，乐善好施，体现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福邦益国的传统人文精神

瞿绍基、瞿镛父子世代都是乐善好施、造福乡邦之人，地方史志载述不绝。

绍基先生时，“邑岁时有天患，民病饥寒，若在其身，规画调护无不挚，输家助官，如取诸寄，而未尝有得色。邑有大工作，任其董督，

必捐资劝成，下及施衣食、施医药，世俗所谓善事，无不为之”（李兆洛《署阳湖县学训导瞿公墓志铭》）。子雍先生亦“性好施，宗党间周恤尤至”（丁祖荫《藏书家瞿子雍先生传》）。

瞿氏藏书历五世，而好以书公诸读者，嘉惠学子，“至嗜书之人有欲观珍秘者，瞿氏亦许入楼参阅，但不许假出，而于阅书之人辟有专室，供人饱览，且供茶水膳食”（觉述《谈铁琴铜剑楼》），甚至招待留宿。遗憾的是，因读者不讲文明、道德失范，以至于书籍多有被窃丢失者，最后无奈之下，只得停止开放。因此，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伦明在诗中叹息道：“绛云楼后此名山，儒素相承创守艰。末世人心难与善，瞿家楼户镇长关。”

1940年，启甲以战乱中艰难守书数十年的经验，临终遗命说：“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瞿凤起《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瞿氏书传至第五代，其三子凤起（1908—1987年）《自传》云：“我自弱冠后，恒以课读之余，阅览家藏目录，取某书据原所参校者，对照取证，藉于校勘方面得到教益。迨从事工作，公退之暇，无所好尚，惟与书为友，阅肆访求，习以为常。每遇同好，往往相至交换见闻所及，以资谈助。昔人于书每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寂寞以当友朋，而我亦作如是观……晨书暝写，溽暑祁寒，未尝稍辍。往往管箬交替，见者莫不窃笑之。私念千里之行，始于起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舍长期积累不为功。此中甘苦，惟好之者知之。”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遵照启甲遗命，瞿凤起与其兄济苍、旭初三人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全部归诸北京图书馆（其中部分属于捐赠，部分则是售卖）。



瞿氏捐书清单及资料复印件



瞿氏捐书清单及资料复印件

四、藏书屡经兵燹，书楼岿然独存，为常熟历史文化名城“人文杰出地标”之一

瞿氏藏书传至第三代，则有秉承家学的诸生秉渊（字镜之、敬之，1820—1886年）、秉清（字濬之，1828—1877年）昆仲二人，“旁搜博采，日累月积，相与编摩，已历三世，远追古人，近比毛氏，将益盛焉，无不及也”（翁同龢《瓶庐丛稿》卷二《题瞿浚之〈虹月归来图〉》）。

在清军与太平天国农民军战乱期间，铁琴铜剑楼藏书历经坎坷和散亡。据张瑛《虹月归来图记》，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闻警，敬之、濬之昆仲检世所罕有者，分置邨北之荷花楼、西之桑坝及香塘角，又取经部寄于周泾

口张氏。八月，常熟陷，亲至各处捆载，舍去十之二三，择千余种，一寄归市董氏，再寄张市秦氏，复运至鹿阿唐氏。已而土冠蜂起，复运至定心潭苏氏。同治元年十二月，吾邑首先反正，四乡蹂躏殆遍。瞿氏之书，一劫于菰里，再劫于香塘角，所存仅苏氏一处。乃更择宋元刊及秘钞精校本，汇集十夹板，二年二月渡江，藏之海门大洪镇。五月寇退，载书回里，其幸存者计若干种，可谓艰矣。”

凡历四年、迁移七次而后定，乱后珍秘之本幸存。绘有《虹月归来图》以为纪念，翁同龢题词云：“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槧，其精者尤在经部，乾、嘉以来通人多未得见。龢尝谓镜之昆弟，假我二十年之力，当老于君家书库中矣。”

瞿氏书传至第四代，秉清子启甲（字良士，别号铁琴道人，1873—1940年）。亦乐善好施。他幼受家学熏陶，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有著述多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之洞、端方派缪荃孙征调铁琴铜剑楼藏书，良士“不为利禄所歆，力持不可”，幸得叶昌炽、邵松年诸君斡旋，且影写罕见本百种以进。（徐兆玮《瞿良士〈检书图〉记》）事后缪荃孙称道说：“铁琴铜剑楼岿然独存，为吴中第一大家，而瞿良士兢兢保守，不为势屈，幸而得存。”（《艺风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三《华亭韩氏藏书记》）1923年冬，苏南遭遇北洋军阀齐、卢混战，幸得启甲先生及时地将藏书珍罕之本转移到上海爱文义路（后改名“北京西路”）1475里11号租屋内秘藏。

抗战中又经兵燹，藏书受到损失，幸行篋之珍本尚存。因此，苏州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王謩在诗中叹息道：“烟树茫茫罟里村，废池乔木亦难论。高斋空锁尘封日，凄绝长恩欲断魂。”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大门

五、藏而能读，书香继世，形成具有古里乃至常熟乡土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底蕴

“恬裕斋”藏书主人瞿绍基隐居读书，喜好宋元之本，开创了古里瞿氏诗礼继世、书香传家的人文传统。太仓季锡畴在《检书图》题词中，曾评价其“非徒藏之而能读之，且义方有训教，其子子雍为高才生，以博闻著吴中，诸孙诵声琅琅一室。盖非徒一己读之，且欲令世世子孙读而守之，以迄无穷……”从瞿氏五代家学传承、书香世代，我们足以感受到诗礼传家的文化生命力和历史竞争力。

徐雁男，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有《秋禾书话》、《南京的书香》、《江淮雁斋读书志》、《中国旧书业百年》等。

紫气飞扬

III 徐风

中国人对壶的感觉，一直是很深情和入微的。自古以来，壶是一种很实在的器皿，人们用它盛酒或水。水是人活命的一个依靠，酒则是人宣泄快乐与痛苦的一种琼浆玉液。人离不开酒与水，自然也离不开壶。如果我们温习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封存的坛坛罐罐中最不胜枚举的便是壶。汉代的陶壶总是那样大模大样，它的器型，非常像一个“容”字。我们从中见到了大度、质朴、从容。壶的本身就是一种器量。一位文史作家说，中国人十分倾情

地创造着壶，仿佛是在创造着自己。

宜兴紫砂乾坤千奇百妍；历代艺人以巧夺天工之技，将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出神入化，演变出万千英姿与风情。关键在于，紫砂壶的造型完全用手工拍打身筒、泥片镶接成型，每一把壶都留下了艺人的心态与技艺，成为世界造型一绝。其间又通过变形与装饰，彰显其斑斓多姿的风貌。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把它细分一下，则大致可为三类：

一是几何形体，俗称“光货”。其中又分为



提壁壶 顾景舟制

方形器和圆形器两种。“光货”的造型要求是“圆、稳、匀、正”，柔中寓刚而圆中有变，厚而不重且稳而不笨。方形器则追求线条流畅，轮廓分明，平稳庄重，方中寓圆。

二为自然形体，是一种模拟自然物体形态的壶艺，俗称“花货”。可雕可镂，师法自然。大千世界，花卉翎毛，瓜、果、虫、鱼，松、竹、梅、橘，皆可作为装饰。最能体现制壶艺人的匠心独运，以造化为师。提炼取舍是其根本，适度夸张为其艺术，寓意象征手法多样，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

三是筋纹形体，俗称“筋囊货”。特点是将壶体分成若干等分部分，然后组成精确严密的整体结构，再组合成完整的壶体。上下映衬，身盖齐同，纹理清晰，明暗分明。单是口与盖严丝合缝，尚不足为奇，其工艺要求如精密机械，达到了无微不至、无以复加的程度。

终于，一把承载了紫砂艺人和窑工血汗、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壶出品了。我们如何来鉴定它的优劣呢？

壶人一相，神形兼备。不懂壶的人怎么看壶呢？那就像看一个人那样看吧，看他五官是否端正，四肢比例是否协调；看他神态是否自然。大度饱满、质朴从容，就是好壶。实用是必然的。泡绿茶宜选扁形口大的壶，这样散热快，不易变色；泡红茶宜选高形小口壶，经沸水冲泡后茶汤色香浓。还要看端把是否提握方便，壶嘴出水是否流畅，口盖是否严密。接下来要看色泽肌理效果，听其音质，就像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一把好壶的音质，应该是沉稳、清脆的，有金属的质感。然后再看制作的精致程度，壶的表面应该光洁圆润、线条流畅、底部平整；刻画周到。最后要看印章，名家的壶，印章十分讲究，有一整套印章分别盖在壶底、壶把、壶盖内；大小相宜，还配有签名证书、作品照

片等，有的在壶上某个部位作了暗号。总之，每个作者都有他的自身印记和防伪方式。

如果说，富贵土的神奇传说只是人们把朴素的心愿附丽于想象的翅膀，那么，紫砂陶的发现和由此焕发的巨大魅力，却让世界记住了一把壶，记住了这个坐落在太湖西岸的壶城。“陶都”的美誉让宜兴一路风尘，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宜兴却有幸在时间风雨的穿越中呼朋引类、广结知己。

文人壶

说文人参与紫砂，宜兴人首先不肯放过的，是苏东坡。

宋代宜兴，已经是一个逾十万户的都市。有一天，苏东坡驾一叶扁舟，悄然驶入太湖。“吾来阳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这位旷世奇才与宜兴有着天然的缘分。官可以不做，甚至文章可以不写，而阳羨茶却不能不喝。他在蜀山脚下讲学，提倡“饮茶三绝”，即茶须阳羨茶，水要金沙泉，壶需紫砂壶。后来的宜兴人喜欢用一种叫“东坡提梁壶”的款式，两叉在前，一叉在后，如此三叉提梁，一是便于搁在竹炉上煮水，二来呢，亦体现出“野饮”之风雅。若壶上再镌上“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类的雅句，则便从头到脚皆雅得不能再雅了。尽管东坡的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紫砂壶，但这里的人为了纪念苏东坡，遂将此壶命名为“东坡提梁”。他们都愿意相信，东坡大人正是有了这三绝之宝，才感叹一声，从此买田阳羨、种橘品茶而吾将老矣。

郑板桥喜欢紫砂壶。他有首诗曰：“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板桥大人性情中人，他批阅公文、审理案子的时候，那把紫砂壶，就在他

案头供着，好端端地替他撑起一股文气。有一次，属下犯错且狡辩，板桥大怒，顺手去抓惊堂木，没料想错抓了，好端端一把壶，已经被郑大人玩出了包浆，顷刻之间就粉身碎骨了。板桥懊悔而自责，说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从此不再玩壶了。这个坊间的传说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谁也说不清楚。但板桥的那首诗，想来应该是玩紫砂壶的性情之作吧。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大概没有不喜欢茶与紫砂壶的。成功的文人都在做官，能插上一脚的地方，都能见到文人们忙碌的身影。得志与不得志的，皆挤成一团。种田人倒是不言苦，为官人却都说累。明代以后，社会风习受新儒学的影响，平淡闲雅、质朴温厚已成为一种时尚。文人们的内心到底文弱，受不住镶金错银，更扛不动青铜重器，你就是送他一座独善其身的园林，再送他一把“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的官帽椅，他也不会闲得住。关键是他的心闲不住。手上有了一把暖心贴肺的紫砂壶，那浑身上下的敦厚内敛、古雅蕴藉，倒是把文人们心驚八极的意绪收回来些了。以绚烂的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的功业之“重”，是当时许多文人的生活写照。有一位生于清顺治年间的文人张潮，写过一部仅一万多字的《幽梦影》，其中的文字，表明了明末清初文人们生活中的诗意达到了何等的高度：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窗内人于纸窗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



圆僧帽壶 时大彬制

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蔗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园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绘琐屑。往往见人家园亭，屋脊墙头，雕砖镂瓦，非不穷极工巧，然未久即坏，坏后极难修葺，是何如朴素之为佳乎。

明季之后，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融合了儒、道、释的哲学理念，这里面既有儒家的温暖，又有道家的逍遥，同时也有佛家的清空。那个时代，一方面文人纷纷入仕，意气风发；另一方面，朱元璋已经开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也让许多文人屡遭迫害，命运坎坷。一时失语，是当时文人的真实状态。文人的集体失语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上的集体出走，紫砂器的构造拥有自由和灵性，可以暖手温心，可以成全一种委托生命想象的大美，于是品呷香茗、把玩砂壶渐渐成为时尚，人生感怀寄寓其中，枕石醉陶已经足够，仕林官场已经忘情。若果既能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在一把紫砂壶上寻找入世与出世的平衡点，那岂不妙哉！

在传媒不发达的明清时代，文人的诗文著作流传非常困难。他们发现，平生在笔墨上学得的拳脚，居然可以在一柄小小的紫砂壶上大放异彩。宜兴多溪山，一壶盛风流；茶陶欢欣处，

恍惚是仙州。许多传世的诗文与画卷，就这样不经意地从文人们的胸中流泻出来。有一句流传千古的禅林法语只有三个字：“吃茶去”，那是叫人把缠绕于心的世间烦恼抛却一边，以空虚清明的心境去过一种清淡无为的生活。

另一方面，没有名气的紫砂工匠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做壶只为换饭吃，基本上没有尊严可言。他们非常需要借助官员与文人的话语权来提升自己作品的知名度。这样，文人与工匠各得其所，体现在一把壶上，早已是血肉交融，哪里还分得出贵贱呢？

盛行于明代的理学，讲究正心修身、节俭养性。竹风一阵，清茶飘香，甚合于他们讲学交友、会党结社的风气。当时的江南已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带。山清水秀的宜兴更是人文荟萃之地。许多文人志士聚集流连于此，品茗清谈、击节高歌；紫砂壶不用上釉，朴拙自然，合于人的本性。他们还惊喜地发现，一个小小的壶坯上，既可以题写壶铭，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又可以篆刻花虫鸟草，以寄托行云流水的性情。天下哪一种陶瓷器皿能与之比肩呢？想那才高气傲的徐文长，为了寻觅一把紫砂壶，专门从绍兴跑到宜兴，还写下了“青箬旧对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的诗句。

有经济实力的文人，像明代的赵宦先、董其昌、项元汴等，他们干脆专门在宜兴住下来，寻找他们合意的紫砂工匠，在共同的交流、切磋中定制砂壶。还有的文人，如晚清的吴大澂，喜欢把紫砂艺人请到家中做“客师”，顾名思义，这是客人级别的师傅，区别于一般佣工级别的工匠。当时的紫砂艺人大抵文化不高、见识较少。突然被请到身价不菲的官宦人家，看到了平生从未见过的名家字画、文房雅玩、博古陈设，

着实开阔了一把眼界。民间艺人大抵有个特点，过眼不忘且模仿性极强。没费多大劲，他们就把那些古玩上的好东西潜移默化到紫砂壶上来了。所谓的文人参与紫砂，骨子里就是这样的痴爱加才情；再加上名工的绝技，那才叫真正的珠联璧合。原本粗拙的紫砂壶因此文通气贯、风流韵畅，在闲散悠雅的岁月里默默提升着它的品位。

在中国古代，书法历来是文人的必修课，紫砂陶坯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宣纸。半世倜傥，一生风流；性情所至，如高山流水，尽可在此一泻千里。

壶随字贵，壶因字传。由于古代文人和紫砂艺人的联袂创作，使紫砂壶渐渐摆脱了工匠气，从而进入了艺术品的行列。文人在其中的主要作用，除了设计壶样，还需撰写砂壶铭。那些阅尽沧桑、看透人生的绝句，其实是他们的另一种风骨。

百姓壶

不能想象，乡下的老茶馆若是消失了，那人们还怎么活下去。

是的，中国乡村的庙宇，是用来供奉神灵的；只有茶馆，才是人们宽慰心灵和洗涤精神的地方。乡坯，这是玩壶一族对乡下人做壶的统称。耍壶者，乡坯也。所谓乡坯，即是工艺粗糙、样式僵板、泥料不够纯正，等等等等。有钱人不屑用手摸它，文人雅士更不屑用正眼瞧它。于是，大量的它们就只能进入百姓的寒舍，乡村的茶坊。

那茶，粗的；那壶，不但粗，还拙呢。窑场上的废壶，瘪的无妨，残的无妨，只要不漏水，拣了来，用久了，一样放出光来，称包浆。几十年，

几百年，那包浆如镜子一般，照见人的前世今生。

村人说，城里小姐生伢，乡下婆娘也生伢。管它什么乡坯不乡坯的，那壶里全是百姓的乐子呢，没有茶叶也成，大麦炒一炒，比茶叶还香呢。一壶一壶喝下去，一样舒心润肺。有时候，人就是一壶茶，人的精气神全在壶里。那壶跟着人的姓名，寿根、春生、坤大、来福、根宝。人叫什么，壶就叫什么。人走了，壶也跟着走，入那黄土，几百年后坟被扒了，壶又重见了天日。壶默默无言，壶不可能说咱几百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黄龙山下某村农民王老二的喝茶生涯持续了一个花甲。他每天清晨起来，去自家地垄拔几把青菜，摘几只茄子、青椒，放进一只弧度很长的竹篮里，搭背在肩上。然后，踩着清晨残月的光亮，去一箭之地的小镇茶馆喝茶。他口袋里并无茶钱，不过无妨，茶喝到一半，他会站起来，把茶壶盖子反盖在壶上，这个约定俗成的动作表明他过一会儿还要回来。他去了哪里呢？老茶客们都知道，他去菜市了，一会儿他把那新鲜的青菜和茄子青椒卖了，他就有了茶钱。农民王老二就这样喝茶，这一壶茶对于他非常重要。太多的风霜、劳累、委屈、不平，都可以被这一壶茶浇却得干干净净。这壶茶一

喝就喝了六十年。有一天王老二喝茶的位置空着了，但没有人占他的位置，好像他还在那儿喝茶，后来许多天，王老二一直没有来。大家终于知道，王老二来不了了。奔赴黄泉的路上，他没有来得及带上那把喝茶的老壶。它一直被冷落在壶架上吃灰尘，后来被一位城里来的先生收走了，说那壶，虽然是乡坯，但上面有一个花甲的包浆呢，这壶应该进博物馆的。于是，农民王老二虽然歿了，但他进博物馆了，这事情一直被王老二的茶友们议论着，最终还是老大不解。

江南乡镇的小巷深处，一年四季都飘着茶香；鼎沸闹市、寻常巷陌的老茶馆更是星罗棋布。无论时代兴衰、王朝变更，壶中沸水依然滚，茶里言语扑面香。太多的王老二把生命里的宝贵年华留在了一壶茶里，泡老了悠悠岁月，恍惚了百年人生。门楣寒伧的老茶馆里，那一排排黑苍的紫砂老壶已经记不清侍候了几代茶客，温暖了多少从风雪驿道而来的寒士，抚慰了多少潦倒失意的心灵，承载了多少普通人的欢愉和惆怅。垒起七星灶，砂壶煮三江；一个砂壶四个杯，风清月朗美紫砂。它支撑着一个乾坤，汇聚着绵绵浩气；记叙着昨夜长风，寄托着人生的念想。

在陶都宜兴的大街小巷，只要你稍加留意，便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式紫砂陶器。一些普通的门楣、寻常的宅第，推门进去，没料想竟是一个叹为观止的紫砂艺术世界。世代相传的壶艺，于平淡中彰显出博大与丰厚，新和旧的故事都在壶里。当你终于领略了宜兴的风土，解读了荆溪的湖山，尤其是从那醉人的茶香里遥想那千年的往事，你才能叩响古老紫砂的门环。

徐风 男，宜兴市文联主席、宜兴市政协常委、民进宜兴市委委员。著有《公民喉舌》、《绝技》、《欲望》、《名角》等作品。



长寿碧桃壶 蒋蓉制

挑尽孤灯孤雁诉 莲心不抵人心苦

——谈“情圣”词宗唐圭璋

III 赵普光

人们对一位学者的关注，往往会因“学”及“人”，或因“人”及“学”，作为后生小子，我则常觉得关注其“人”比其“学”，或许更有意味。这让我想起了已故词宗唐圭璋先生。

中国当代词学大师、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教育家、词人唐圭璋先生（1901—1990）被称为“词林宗师”、“学界泰斗”、“词坛耆宿”。唐先生编著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著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四考》、《元人小令格律》、《词苑丛谈校注》、《宋词纪事》、《词学论丛》等，他一生精心编撰的不朽之作有二十多部，总字数达一千万言之巨，可谓著作等身。特别是他的《全宋词》，举一人之力，积十年之功，更是嘉惠学林。

唐先生的这些学术伟业，当然毋庸后生小子如我者来置喙了。但我总觉得，在他辉煌的学术成就背后，那个时隐时现的人，以及掩藏在更深处的心，也许同样值得关注。捧读唐圭璋先生的词集《梦桐词》时，在学术大师、词学名宿的高大形象之外，一位“情圣”的身影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这里用“情圣”二字来评价唐圭璋，恐怕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侧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先做一解释：要论情之专、情之深、情之苦、情之浓，我觉得在现代以来的文人学者中，极少有人能和唐圭璋先生比。既然如此，称我素所崇敬的词宗唐先生为百年中国学界的“情

圣”，诚不诬也，更非侮也。

—

了解一个人，从其不经意间的细节入手，或许会有更深的发现。之所以会想起用“情圣”来评价唐圭璋先生，源于我对唐先生一个小小细节的注意。

从纪念和回忆唐圭璋先生的文字中我惊奇



唐圭璋

地发现：唐圭璋的很多后学晚辈们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及，他们在拜访先生时，先生总是热情地“执手”而谈。仅举几例。

王兆鹏教授的文章中记道：

座中唐师一直握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叶嘉莹先生回忆说：

记得我与唐先生相晤时，曾并坐在一个长沙发上。先生坐在我的左侧。一见面先生就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以后一直与我执手而谈。

李灵年先生写道：

但他见了我，仍然一如既往，兴奋，亲切，和蔼，拉着我的手，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

陈庆元教授曾回忆：

临行，我对唐老说，将来我还会回来拜望您。唐老久久地拉着我和同群兄的手。

杨宝霖先生记述：

其时唐先生经年抱病，霖恐影响唐先生休息，几次告辞。唐先生兴致弥高，牵衣挽留，霖往往乘3路公共汽车最后一班车回到傅厚岗寓所。

执手交谈，这在现在一般熟悉的师友中都是极少见的动作。我们知道，慕名到唐先生家里拜访的后学，很多人与唐老交往并不多，甚至有的是初次登门，唐老在与他们聊天的时候，都会主动地拉着这些人的手，促膝交谈。

这一细节，引起了我的兴趣。

后来偶然读到唐圭璋先生的一首诗，我似乎觉得自己有可能接近那位老人的内心。1987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秋吟诗会，已八十有七高龄的唐先生即席吟诗：

秋光信是胜春光，桂子风飘满院香。

执教心雄图改革，碧空万里月如霜。

后来人在引用时都说，该诗是唐圭璋先生乐观心情、矍铄精神的写照。但是我却并不认

为如此。细读这首诗就会发现，其前三句和最后一句之间是不协调的，甚至前后有点矛盾。从“春光”、“桂香”、“改革”，转到了“如霜”，显得很突兀。前面的几个意象都是昂扬的、向上的、积极的，但是末尾忽然显出有些凄冷低黯。当然，这是即兴而作，有应景的成分，不能深究，但我却以为这首诗颇有些象征意味：不协调的诗句中无意间泄露了唐先生的矛盾心情，风光的表面下，似乎潜在的是老人孤独的内心。最后一句看似为了叶韵而用“霜”字，或许恰恰显示了老人无法压抑的孤寂凄凉。

“文革”结束之后，随着词学研究日益兴盛起来，慕名来拜访老先生的学者越来越多。应该说八十年代是老先生最风光无限的时候了，可是热闹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寂寞孤独，凄苦无人识的内心。

想到这儿，我忽然似乎意识到，唐老主动“执手”而谈的动作习惯，有着潜在的，肯定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心理——对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渴望，对真情的渴望。

二

这种渴望，源于唐圭璋先生一生对真情的执着，这种执着则源于唐先生生命历程中爱情亲情的易逝与飘零。何以言之？这就不能不从其身世遭际谈起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风云激荡，世事更迭。在这变动的大背景下，唐先生命运之多舛，在百年中国文人中是极罕见的。唐先生是满族旗人，生于庚子年十二月初四，按照阳历是1901年1月23日。7岁丧父，11岁时母亲去世。就他个人早岁遭遇，唐圭璋自述比较简单，只说：“因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就寄养在舅舅家。”其三女唐棣棣的文字则更加详细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听人说，革命党人

抓到满人就砍头，祖母十分害怕，在百般无奈中，只好……带着二姑妈唐俊章、三姑妈唐鸿章和爸爸一起到南京香铺营他们的姨夫家避难。姨夫是汉族，机织为业。在爸爸的姨夫家住了不久，祖母又病逝，就靠二姑妈替人做针线活，爸爸作小贩（常在新街口一代，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附近卖香烟、花生、瓜子等）以维持生计。后来二姑妈出嫁到安庆，三姑妈给郎家做童养媳，爸爸寄居到他舅父家，原来支离破碎的家就彻底地解体了。

唐先生一生下来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好的时候，而人生早年所有的艰辛不幸都被他遇到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早年失怙而后来成名的人很多，如唐圭璋的老师吴梅，如新文学家中的鲁迅、胡适、郁达夫、巴金等等。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大概都没有唐先生的出身这么特殊，都没有他这么曲折，都比不上他受到的痛苦这么巨大。为什么这样说呢？鲁迅、胡适等人虽然早岁丧父，但是都有慈母抚养，给予他们最需要的母爱和家庭的温暖。可是唐圭璋先生丧父之痛还没有摆脱，接着母亲又去世了。不仅如此，他后来一直寄养在别人家里，连最基本的家庭都不复存在了。唐圭璋彻底地被命运抛在了半空中。

说他出身特殊，是因为他是满族旗人。现在说起来，满族血统并没有什么异样啊。为什么那个时候特殊呢？大家别忘了，唐先生的童年正赶上辛亥革命前后，是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满汉种族的冲突，排满仇满的社会情绪，对于一个稚嫩柔弱的少年来说，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太过巨大的危机和压力。也许在这一点上，老舍与唐先生有点相似，但是老舍的父亲毕竟是在与八国联军的交战中战死的，而且老舍还有母亲在堂，还有自己的家，尽管已并不完整了。



唐圭璋与尹孝曾

而这些对于童年和少年的唐圭璋来说，都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唐圭璋先生的生命起点极为不幸。后来抗战期间唐圭璋只身在重庆执教时写的诗句“无家空有泪，谙尽天涯味。万里一灯前，娇儿眠未眠？”恐怕不单单是对三个幼女的思念牵挂，其中所说的“无家空有泪，谙尽天涯味”何尝没有早年无家可归的悲苦记忆的重叠与再现呢？早年的打击（父母双亡）和遭际（家破人亡、寄人篱下），我想那种痛苦的阴影不是后来一度甜美的家庭生活、刻苦的词学研究、名满天下的声誉能取代和消弭的。这种阴影会笼罩一生，常常出现在梦中的。尽管唐先生几乎没有写童年遭遇的诗词，可是我觉得：情感，见之于诗词的，固然深刻，而未形之于文字的，或许更为隐秘痛苦。对于唐圭璋早年的身世之痛，当作如是观。

三

青年唐圭璋有一段极为幸福的姻缘。唐圭璋先生与南京大行宫利济巷内有名的尹家花园里的大小姐尹孝曾结婚。端详他们的合影照，“照片上的尹小姐眉目清秀，虽不是红粉佳人，却

自有那一份大家闺秀的端庄典雅。”

婚姻生活是美满的，这大概也是唐圭璋先生一生中仅有的一段温馨幸福时光了。《梦桐词》里有一首词曾忆及当时的恩爱：

人声悄，夜读每忘疲。多恐过劳偏熄烛，为防寒袞替添衣。催道莫眠迟。（《忆江南》）

这种情景，怎不让人怦然心动。

唐圭璋先生的三女后来记述其父母恩爱温馨的生活时写道：

爸爸喜欢唱昆曲，也会吹箫。每当炎热夏季，夜晚在门前梧桐树荫下纳凉，妈妈总是为他点上蚊烟，坐在一旁替他轻轻扇着扇子，爸爸吹着悠扬悦耳的洞箫，妈妈轻声和唱。

夫妻恩爱相知如胶似漆的情形，一再让唐圭璋不断地追忆：

人眠后，吹笛夜凉天。丽曲新翻同拍节，芸香刚了又重添。谁复羡神仙？（《忆江南》）

唐圭璋先生的同门、挚友王季思先生曾回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唐先生的家庭生活场景：

1930年代寒假，我从温州到南京求职，寄住在圭璋家里将近一个月。当时东南大学已改中央大学，来南京看望师友的同学不少。圭璋夫人患病，两个女儿都还幼小，圭璋除忙于接待宾客外，还得细心照顾夫人和二女。他屋檐外有株梧桐，每听见两个女儿嚷着要爬树时，他就跑到屋檐外，站成骑马式，左手叉腰，右手举拳，装成棵小树的样子，让女儿踩着他的膝盖，攀着他的肩膀爬到他头上去。这个下来，那个又上去。就这样，他慈祥地爱抚了幼女的成长，又减轻了他们对妈妈的纠缠。

唐先生对妻女的热爱、深情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真情，这是真爱。

唐先生终于苦尽甘来了，可是哪曾想，美满生活却因尹孝曾的病逝，永远地成为过去，

散成碎片织成残梦，而梦境只会使醒后的现实更加冰冷凄凉。

唐圭璋妻子尹孝曾病逝的那天，恰是1936年的旧历除夕。当千家万户爆竹声声辞旧岁迎新春的时刻，却正是唐圭璋先生痛不欲生的日子。同样的人间，却有如此迥异的心情。而且每年都要在这个国人极为重视的节日里煎熬着，每到这个日子，唐圭璋先生的丧偶之痛会成倍增加，那凄苦的心情会无限放大。后来唐圭璋有词回忆那痛苦的心情：

西风一箭成迟暮，消得斜阳顾。背人已自不胜愁，那有心情，再系木兰舟。（《虞美人·柳》）

孤独痛苦的折磨，年复一年。唐圭璋的三女唐棣棣曾写道：“安葬妈妈之后，爸爸就忙着要去教课，但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妈妈坟上去，坐在那里吹箫。”“箫声哀怨，四顾凄凉，欲觅难寻，空余双泪凭伊认了。有时碰到节假日，他索性带上几个馒头或烧饼，几本书，一只箫，在坟地上呆上一天。”

“挑尽孤灯孤雁诉，莲心不抵人心苦。”（《蝶恋花》）对亡妻的追怀思念，并没有随时间而淡化，恰恰相反，岁月逐增，痛苦也逐渐地凝聚和沉淀，深入骨髓。笔者在进入南师大不久，曾听老师谈起八十年代初唐圭璋授课时的情形。这情形让人不能不慨叹唐先生的情之专、情之苦。那课堂上，唐老讲授的是苏东坡那首极富盛名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学生们都以期待的眼睛望着，等老师作精

彩的分析。然而，唐圭璋先生在黑板上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句之后，有些颤抖，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只是呆呆地看着板书，喃喃自语：“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生死两茫茫……”然后长叹一声“苦啊！”就再也讲不下去了。看到唐先生的眼睛里浸满了泪花，学生们震惊了，默默地看着老师，体会着苏词中的感情。

我想，这肯定是他们大学期间印象最深的一堂课，也是最精彩的一课。先生不能自己的情感，使得学生真正体察到了此中的深情，这远比任何精彩的理论分析都更加的真实、生动和深刻。

苏词《江城子》中所写的情感，其实也正是唐先生的情感；苏词中的梦境，何尝不是无数次地出现在唐先生梦中。真的情、真的人、真的诗，在那一刻跨越千年，在苏唐两位词人之间、在师生之间、在阴间阳界、在历史现实之间息息相通了。

妻子去世后，唐圭璋先生终其一生未再娶。一般人都难以置信，都会觉得这种痴情，这种相守，这种承诺，只可能出现在理想中，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然而唐先生却用自己的一生讲述着那份爱情，坚守着那份承诺。

四

尹氏去世时正值华年，留下三个孩子。唐圭璋先生承担起了抚养儿女的重担。唐先生的三女儿唐棣棣后来曾写道：“爸爸对妈妈的深挚的爱，倾注到我们姐妹身上，与其说是严父，不如说是慈母更为确切。”

丧偶打击，抚孤重任，是人生的大磨难、大考验。但是谁曾想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慨叹命运的不公了。

笔者曾在南京师大教授曹济平先生家看到唐圭璋先生的遗嘱原件。这份立于1988年11

月9日的遗嘱上写着：

我的爱人尹孝曾于1936年病世，留下三个女儿唐棣华（十岁）、唐棣仪（八岁）和唐棣棣由我一人抚养。1956年棣仪病逝，留下儿女三个：吴寅（六岁）、吴祥（四岁）由我抚养，吴大明（未一岁）由其父抚养。1967年3月棣华病逝，留下一个女儿唐倩竹（十五岁），也由我抚养。1966年5月棣棣与卢德宏结婚后，夫妻俩就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管理任务，在我身边照顾护理我，数十年如一日。

遗嘱接着交代了老人财产的分配问题，几个外孙每人一千元，余下的电视、冰箱及稿费等留给三女儿女婿。后来看到唐圭璋先生的弟子王兆鹏教授所写的《人格风范更无伦：忆唐师》一文才知道，这个冰箱，是老人立遗嘱前刚刚享受到的。王文说：“对于一般城市家庭来说早已是必需品的电冰箱，唐师直到1988年教师节才让我去帮着买回来，要不是江苏省政府领导来看望时见四壁空空，给他一份‘优惠券’，他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享用。”

看到遗嘱，我呆住了，鼻子有些酸酸的，想哭。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唐圭璋先生亲立的这份遗嘱，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代词学大师的命运竟然如此多舛。

人们常说，人生三大不幸是幼年丧怙，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然而这三不幸竟然全降临在唐老一人身上。而且，本该安享的晚年，还要以老迈之身去抚养几个年幼的孙辈。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人生的血泪，都化作了苦酒，酿成了唐圭璋先生的那部《梦桐词》。对于这部词集，唐圭璋先生在致友人的信中有言：

词作通俗，可谓白话词，实不足与前贤相比，由于我身世凄凉——少无父母，中年丧偶，晚

年丧女——所写每聊记梦痕而已。

淡然的话，包含的却是无尽的辛酸和凄凉。让我们随手拈来《梦桐词》中的诗句，细细读来，谁能不惨然恻然：

空濛一镜芳踪杳，谁理沙棠棹。西风吹泪看残荷。无限离愁，却比一江多。（《虞美人·丁丑避地真州》）

忍抛稚子，千里飘零。对一江风，一轮月，一天星。乡关何在，空有魂萦。宿荒村，梦叶难成。问谁相伴，直到天明？但幽阶雨，孤衾泪，薄帷灯。（《行香子·匡山旅舍》）

离愁无数。梦断江南路。一夜寒溪流不住，错认满山风雨。（《清平乐》）

旧游空忆齐梁殿。乱离骨肉散天涯，谁家插得茱萸遍。（《踏莎行·德安重九》）

今宵独卧中庭冷，万里澄辉照泪悬。（《鹧鸪天·铜梁中秋》）

人去远，信来稀。最难细数是归期。何当扫却妖氛净，一夕飞腾到古淮。（《鹧鸪天·登观稼台》）

唐先生的妻子病逝之后，抗战军兴。上述词作都是唐先生在抗战期间忍痛抛下三个孩子，随校辗转避往四川时凄苦心情的写照。骨肉分离，山河破碎，怀念亡妻，思恋儿女，这许多的痛苦怎么挥都挥不去，时时出现在梦境里，并形诸笔端。

当抗战胜利之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唐圭璋欣喜若狂，然而在回到南京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却收到了解聘的通知。于是他失业了。经历近十年的生离死别之后，家庭刚刚团聚，却立刻又陷入了生存的危机。唐先生的心情从“漫卷诗书喜欲狂”，一下子跌入了冰窖。

这种种困难打击，曾给唐圭璋先生内心造成多么巨大的摧残和伤害，恐怕是很少人能够

理解和体会的。人们只看到他辉煌的学术成就，而往往忽略了内心深处的真情、苦情。须知正是因这真情，才会有深沉的词作，才会有辉煌的词学。

五

通观唐圭璋先生的一生，家庭破碎，寄人篱下，早年失怙失恃，中年丧偶，晚年丧女，两次（被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解聘，一度失业。如此巨大而频繁的苦痛与打击，对于唐老的心灵是何等严酷的考验。

这必然对其词学的观念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发现，唐圭璋先生对两宋之际的李清照情有独钟，对身世凄凉的纳兰性德别有幽怀。这都不是偶然的。

王兆鹏教授在1989年曾与先生提起李清照，这引发了唐先生的回忆。唐圭璋先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李清照“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的名句，接着他难以自己，诵起了自作的《忆江南》：“人声悄，夜读每忘疲。多恐过劳偏熄烛，为防寒袭替添衣。催道莫眠迟。”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含着眼泪说：

李清照的沉痛诚挚，我最能理解。我与妻子结婚时25岁，她23岁。那时我在东南大学读书。深夜里她怕我劳累过度，故意把灯吹灭，不让我多看。又怕我受凉，她总是悄悄地把衣服给我披上。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如今“寒深谁复问添衣”。妻子去世时，我36岁，本可以续弦，但我对她的情感实在太深，感情上无法解脱，只好用泪水来洗刷，用词来排解。

什么叫心灵相通，什么叫情感相契，此之谓也。唐圭璋先生那一代人做学问，往往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视研究对象为生命的一部。那是真的学问，更是真的人。他们做研究，其实是用“心”在做，而不是仅仅用“脑”。



随园雪景

唐圭璋对杜甫的独特理解，与其身世亦有着潜在的联系。唐圭璋曾在给友人信中说：

李白无法学，杜甫有法学。……“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宝帘闲挂小银钩”——这不是侧艳小慧，而是真景真情，而是爱情。况蕙风云，真字是词骨，第一要重，第二要拙，第三要大。词不是轻、小、狭、艳，您以为如何？我坚决反对韵文翻译，韵味全失，不独无益，而且有害，既诬前贤，又误后学。

可见，唐先生最看重杜诗的，还是一个“情”字。

也正是对亲情远逝、家庭破碎之痛有着超乎常人的切身体验，所以他才能用超乎常人的热情与爱心去对待别人。学者杨宝霖曾记述了一件事，令人十分感动。1983年杨因为在北京查资料，春节仍需留京，唐圭璋先生写信将杨介绍给北京大学徐兆奎教授。信上这样说道：

伯先仁弟：我的好友杨宝霖同志来京校《全芳备祖》，春节不回东莞故乡。杨君治学，艰苦已极，我深深仰佩，也深深念其在外寂寞，举目无亲，因盼弟与静珍留其再尊处一过春节，就入我来尊处。杨君在我处如家人，想至弟处亦如家人，随茶便饭，寒士本色。我不客气与弟言，望弟亦勿客气待客。附诗一首：

杨君治学滞都门，万里关山劳梦魂。

客舍寂寥谁问讯，敢烦梁孟赐春温。

对于一个因问学而相识的外地青年，唐圭璋先生竟然投入如此的情感，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和感慨唐先生用情之真。

总之，唐圭璋先生对妻子的爱情，对儿孙的亲情，对历代词人的挚情，对后学的热情，几乎都是到了超凡脱俗的程度。如此至性至情，若唐圭璋先生当不起“情圣”二字，还有谁能当得起呢？

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校友，在随园中大楼前草坪上为唐圭璋先生和孙望先生各立了一尊铜像。每次到南京师大文学院上课，课间休息时，我都会驻足良久，默默凝望。此文写完后，我再次漫步随园，不知不觉中又走到了雕像前。凝望铜像，那清癯淡然的面容中蕴藏着丰富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尤其是已经成为历史一部分的那个人的内心，很难！

我走进他了吗？我不禁惑然、惶然……

2011年深秋于槐香室

赵普光 男，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叫回我惊散的唐魂汉魄” ——余光中先生初归南京纪行

III 胡有清

2000年10月3日至7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离开五十一年之后重返南京，从此开始了他频繁的返乡之旅。十一年下来，保守的估计，应该不少于二十次吧。江苏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常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江苏的出版机构为他出版了多种著作，包括我为他编的《余光中诗丛》；他写下了《再登中山陵》、《金陵子弟江湖客》、《钟声说》等诗文，表达了对江苏特别是南京深切的怀念与关切；2008年，他还特地安排在南京度过自己的八十寿辰；2009年，他在为《余光中诗丛》写的总序《长接诗缘》中写道：“两岸开放交流后，我第一次回大陆，是经由北京，其后遍历苏州、厦门、东北与湖南，直到2000年，峰回路转，我的飞机才终于把我放落在禄口机场，交回玄武之湖，紫金之山。接机的主人是胡有清教授。”他在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后说：“这一切，早已超过了九年前在禄口接我的那位主人之份了。以文会友，以诗结缘，十分可感。”而对于我来说，十一年前余先生初归的情景则是那样清晰地定格在记忆中。

—

机场候机厅的电子显示屏上不停地闪烁着“东方航空公司 MU5004——13:45 正点到达”的字样。出港的人群中出现了那虽未谋面但却

已熟知的余光中先生的身影：瘦小，精干，宽额银发，精神矍铄，身边是曾陪伴他走遍世界的爱侣范我存女士。

周围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我们的这位客人，就是曾经以一曲短诗《乡愁》打动海峡两岸多少同胞、世界各地多少炎黄儿女心弦的那位著名诗人，而眼前的这块土地正是他乡愁最真切最深挚的具体对象。先生虽然祖籍是福建，却生于南京，长于南京。二十一岁以前的他，除了几时常去母亲家乡常州武进乡间短住，除了抗战时期曾去四川等地避难，基本是在南京度过。正因为这样，他常说“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把南京列为自己“住得最久的城市”之一。然而1949年初匆匆一别，谁知竟无缘再回来。因此，当我们这次邀请访问南京时，先生迅速回信说：“蒙邀访问石头城，十分感慰。南京不仅是我出世之地，更是我先后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之所在，早应归根回乡一行。”现在，终于在这金秋十月成就了他悬望已久的“初归南京”之行。

汽车在奔驰，余先生目不转睛地观看着窗外，展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一片陌生的情景：宽敞的高速公路，先进的交通指示系统，林立的高楼住宅，……十二年前先生在《还乡》中写道：“四十年后，所有的镜子/都不再认得我了，只怕/更加认生是西湖和太湖/更不提，多菱

多藕的玄武 / 纵使我恍惚还认得那后土 / 根深藤密，那古老的后土 / 千胎万胎一代代怀过 / 还认得出我来吗，还认得出 / 久别了，这远游的龙孙？”如今，又是一个龙年，龙年出生的龙的子孙余光中回来了。但是记忆中的南京在哪里呢？先生的眼里多少有点迷惘。好在很快九华山的古塔出现了，接着，“古鸡鸣寺”的碑石出现了，先生兴奋了，他问到鼓楼还在不在，他说他读书的青年会中学就在附近。说话间车已到了市中心的鼓楼广场，高楼丛中露出鼓楼的红墙玄瓦，路边的大钟亭更是历历在目。我告诉余先生他将下榻的玄武饭店就在前面，饭店就在玄武湖对面。他连声说，太好了。

我们登上了饭店的观光电梯，随着电梯徐徐升起，玄武湖、紫金山也依次缓缓显出全貌。先生住在十七楼，房间正对着玄武湖，满湖风

景尽收眼底，他快步扑到窗前，注视良久，似乎还不过瘾，又把玻璃窗推开，探出头去观望。这时我接通了他在南京的表妹的电话，连喊了几声他才从对湖光山色的沉迷中惊觉过来。接过话筒开心地答道：“回来了，回来了，我已经看见玄武湖、紫金山了。”

二

余先生 1947 年秋到 1949 年初就读于金陵大学外文系，然后远走厦门、香港，最后去台湾。1952 年大陆高校院系调整，金大的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如今的南京大学就设在金大的校址上，余先生自然也是南大的校友，访问母校也就成为他此次南京之行的开篇节目。

4 日上午，余先生夫妇来到母校。南大校友



余光中先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

总会、金大校友会的几位会长热情地接待他们。金大校友会的周会长向余先生介绍了南京大学的历史沿革，余先生注意地听着，不住地点头，他说，我一直想回母校看看，我现在还会唱金大的校歌，金大的校徽和学生证也还保存着。他们回忆起当年求学时的种种情景，谈起一些在台湾和海外校友的情况，沉浸在抚今追昔的情思之中。

我们陪余先生在校园里漫步。在金大时期建筑的图书馆老馆里，他欣喜地发现阅览室当年使用的桌子还没有换掉，那些桌子支板的侧面上统一刻有古朴的“金陵”字样。他马上说，我要在这里照一张像。说着，先生坐到桌前，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像一名虔诚的学生。在当年的学生宿舍楼前，在礼堂前，在老体育馆前，在每一座老金大的建筑前，余光中都驻足停留，仔细地聆听介绍，深情地注视瞻望。他在回忆，在找寻那过往的岁月，他在沉吟，在体验这人生的无限。

下午，余先生访问了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受到众多学者和研究生的欢迎。接着，余光中为研究生作了题为《创作与翻译》的演讲。虽然是假期，但听众之踊跃出乎主办者的预料，以至不得不三迁会场。当先生在讲演开始时说起自己离开母校离开南京已经五十一年时，场内的学子们发出一阵轻轻的感叹。他们知道余光中的名字，喜爱余光中的诗文，但多数可能并不知道余光中是金大的校友，更未想到这位校友已经阔别母校半个世纪。余先生说，在座的同学就是我的学弟学妹，我看见你们，就想起我年轻时在这里读书的情景。我写诗写了好多年，我的诗选序言和一些学者都说是从厦大开始，其实我真正认真写的第一首诗《萨福投海》是

在南京写的。我大二在金大开始翻译英文剧本，说的是白朗宁和他妻子的故事。我对文学的兴趣，对文学的追求是从南京开始的。余先生在讲演中联系自己的创作和翻译实践，深入浅出，中西对举，娓娓道来，不时引起听众热烈的反响。

三

在两天后的生日宴会上，在点燃起七根长烛两根短烛以后，余先生合掌低头许愿，我拿出的“生日礼物”多少有点让人意外，这是（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入学注册的金陵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学生余光中的学籍卡的复印件，那上面有入学时情况的记载，有三个学期修读的课程成绩。这份学籍卡的原件完好地保存在南京大学档案馆。余先生一见，喜上眉梢，爱不释手。这幅景象被在座的一位诗人称作是“当年的绿鬓少年”正同今天的文学大师“隔纸相望”，我想，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是今天的大师正在透过这薄薄的两页纸寻找“昨日之我”更合适吧。

余先生在南京的这几天里经常提到：“我是天生的南京大萝卜。”所谓“南京大萝卜”，这是南京人自嘲也是自豪的口头语，是对自己的城市淳朴憨厚民风的一种形象的标注。由此也不难看出余先生对南京的认同。先生八年前到北京登长城后作的诗中写道：

我不是匆匆的游客，是归魂
正沿着高低回转的山势
归来寻我的命之脉，梦之恨
只为四十年，不，三千里的离恨
比屈原更远，苏武更长

如今，这“归魂”到了朝思暮想的南京。他对我们说，他梦寐以求的是要回来看看玄武湖、中山陵。他还把自己和南北朝时的庾信相比：

“庾信在南京做官，遇侯景之乱，战败逃离，当时三十六岁，去世时六十八岁，他写了《哀江南赋》，始终没有能够再回南京。我隔了五十一年，终于回来，回到南京，回到母校，非常高兴。”先生这次在南京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时间，却得以稍稍补偿半个世纪的乡思之苦。

先生住在玄武饭店，房间和餐厅里都随时可见玄武湖的景色。有天早晨夫妇俩还买票随晨练的人群到公园里散了步。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先生说起来却是情趣盎然。我们理解先生的心情，特地安排先生游览台城。先生在明代的古城墙上漫步，从近处鸟瞰玄武湖，指点着少年时代就熟记于心的梁洲、樱洲、菱洲、环洲、翠洲那几块湖中绿地，不由得喜形于色。去中山陵、去燕子矶回来时，我们也都绕行到湖边，让车缓缓驶过，让先生多看几眼他心爱的玄武。几天时间里，余先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饱览了玄武湖的风光，每一次都是那样专注，每一次都非常动情。

来南京之前余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提出：“今年十月六日，正值重阳节，亦为我生日，若能在南京登高临风，追念母恩，当为最有意义之安排。”这次为了重九在南京登高，先生推迟了去武汉参加余光中暨沙田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行期，使得主办单位将会议的开幕时间推迟了三天。6日这一天，我们早早驱车来到离城二十多公里的栖霞山，不料这天因修路车无法开上山去，而步行时间又不够，只得中途而止。为了尽兴，中午祝寿宴会之后，我们又陪先生去燕子矶。我们登上御碑亭，眼前开阔的长江江面上百舸争流，远处的两座大桥清晰可见，先生意犹未尽，又走下亭去，攀上矶头的石岩凝神眺望江上风光，他连声对我说，我又看到长江了，长江太伟大了！这时我想起了先生《浪

子回头》中的诗句：“浪子已老了，惟山河不变”。他这次到了南京也不止一次说到，长江不可能复制，紫金山不可能复制。故乡山河对余先生这样的游子可以说永远有着无穷的魅力。

正因为登栖霞山“未竟全功”，所以前一天的登中山陵在余先生心中便更添了分量，成为重九登高的重要内容。回台以后他来信说：“中山陵之行亦可谓重九登高矣”，还随信寄来了《再上中山陵》，他在诗中写道：

青琉璃瓦覆盖着花岗石白墙
在高处召我上去
去童年记忆的深处
乡愁隔海的另端
召我，从巍峨的陵门起步
两侧的雪松对矗成柱
是你的流芳吗，松涛隐隐
随风更传来秋桂的清馨
天梯垂三百九十二级
让我昂然向崇高踏进
踏着大钢琴整齐的皓齿
一长排音阶，渐宏渐升
深沉的安魂曲，由低而亢
用脚趾，不是用手指，按弹
一步比一步更加超迈
直到风景全匍匐在下方
世界多壮丽啊，举我到顶点
一回头千万人跟在后面……

读着余先生的诗，我记起那天他来到中山陵时放光的眼神，记起走在长长的墓道上他对两侧高耸的雪松和桧柏的连声称赞，记起先生对三百九十二级台阶和台阶尽处巍峨陵寝的深情瞩望……在祭堂里，先生随着人流耐心地等候；在墓室里，先生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低头注视中山先生的卧像，久久不语；走出墓室来，

他又站到了祭堂中央中山先生的坐像前仔细端详。我想，先生一定是在和长眠在这里的伟人对话。现在读了先生的诗，我们知道，他是在报告：“走失的那孩子，他终于回来看你了”，他是“只为迟归为自己叫魂 / 叫回我惊散的唐魂汉魄”。

四

5日下午，南京地区的部分学者、作家举行余光中先生文学作品研讨会，地点在中山门外古城墙下的月牙湖公园谭月楼。研讨会上六位学者宣读了论文，还有一些学者做了即席发言，分析了余先生的诗歌、散文和理论批评，涉及余先生写作“四度空间”中的三度。短短的两个小时，显然不能让学者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但难得的是，这是大陆召开的第一个余光中作品研讨会，是一次和作家本人面对面的交流。

在热烈的掌声中，余先生即席讲话。他说，我的感想不仅仅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五十一年之后重回南京的这几天，对我心灵的撞击非常之大，今天是个高潮。我所受到的感动，触动我的种种思想、情感，恐怕要花好一段时间来消化，也不是写三首诗、两篇散文所能完成的。

余先生谈到离乡去国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他说，我的大学，前两年在大陆，后两年在台湾。我的感觉，怎么我的少年时代和故乡一下就“过去”了呢，这就促成了我日后写诗也好，写散文也好，在文学评论中的感慨也好，都是从那种失落感引起的，所以在作品中加倍地怀乡，甚至加倍地把中国典故反映到我的作品中。不但在台湾，后来到国外去读书、教书，面对强势的西方文

化的压力，自己更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而我所做的就是抓紧自己的根，接通母体，抓住祖国的语言进行写作。我也一再自白过，我的作品中，基本的一种情调，所有的灵感还都是来自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在我的心里，在我的作品中，是一条主流，像长江黄河一样。五四这个源头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诗经以来的大传统。我认为自屈原以来，我们的国魂诗心，是从那时开始的。

听到这里，我不免想起先生在“总统府”参观时对那些“现在在台湾不可能看到”的近现代史料的流连忘返，想起先生在几次答问中对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奖而非世界文学奖的强调，想起先生在闲谈中对自己被称作“台



余光中夫妇和作者在总统府子超楼前

湾诗人”的揶揄。余先生在高雄中山大学的研究室临窗可以纵观台湾海峡。余先生曾经写道：“杜甫晚年，怀古伤今，坐拥一道江峡：那一带当然是中国神话与历史的回音长廊，经过杜诗题咏，更觉神秘。我的晚年何幸，竟能坐拥一道海峡，船来船去，这一带是东亚通南洋的海关，也是所谓两岸之间无情的天堑，其象征的意义正有待诗人的品题。历史在世纪末的晚霞正艳处，把一位老诗人的白头安顿在此，真是缪思授意的吗？”我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引用了先生的这一段话，我说，我想缪思的这一授意正是中国文学的幸运之处。余先生对这一“无情的天堑”的“品题”，对“中国情结”的抒发和倾诉，不但在精神的空間上为架设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沟通融会的桥梁添砖加瓦，而且也为



在历史的空間上构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承传回响的长廊描龙绣凤。这对于海峡两岸的对话、交流以至最后实现统一无疑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润泽。我们期待着，在新世纪里，余先生的这种“品题”不断产生新的佳作，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交响乐中奏出更加响亮的旋律。

散会以后，天色已晚。先生称赞道：地上有月牙湖，天上有初月，天上的初月跟地上的月牙相映成趣，构成了非常有美感的良辰美景。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月前中秋明月夜里，电视中分别出现北京香港两地朗诵余先生《乡愁》诗的情景，香港是大型晚会，北京是专题节目，余先生就在演播室，那位著名播音员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又一次把余先生的诗句传送到千家万户，召唤起浓得散不开的同胞情谊。二十五年前的中秋之夜，余先生曾经“仰青天，问一面破镜”“何时重圆，八万万人共婵娟？”看看眼前两岸文友欢聚的情景，看看正在为“叫回我惊散的唐魂汉魄”而兴奋的余先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两岸十三亿同胞“千里共婵娟”良辰美景的实现呢？

胡有清 男，全国台联副会长、江苏省台联会长，台盟中央常委、台盟南京市委主委，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

哲人钱钟韩

III 封志成



一

1994年，刚进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读研，每周要到医院接著名哲学家萧焜焘教授到学校授课。一次，经过一病房，萧先生说，钱钟韩先生就住在这个病房。透过房门的玻璃，我看见一位老人正在伏案工作。去学校的路上，萧先生说，钱老不仅是大科学家，也是大哲学家，搞科学研究，要有大成就，必须要有哲学的思维，东大之所以专门成立哲学与科学系，就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当年钱老为这个系的成立是出过大力气的。

十七年过去了，钱老和萧老均已仙逝，但钱老的身影、萧老的谈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当看到如今高校哲学系招不到优秀学生，学生毕业分配困难时，当看到社会大众对哲学公然的漠视时，当听到钱学森在病榻上与总理那段“为何如今大学培养不出一流大师？”的著名对话时，我总想起钱老的身影、萧老的谈话。

6月的一个午后，约了几个东大师友茶叙，其中就有钱老当年在哲科系带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今的叶明教授。席间自然谈到了钱老，我说，钱老作为自然科学家同时能

带哲学方面的研究生，太不可思议了，现在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师，就应该多宣传钱老，学习钱老，提高科学工作者的哲学素养。但现在做得太不够了，钱老去世后的悼词中，也只说他在晚年还从事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指导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没有讲科学的思维方法、哲学的素养对其一生取得成就的影响，介绍钱老的文章很多，但很少有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叶教授说，钱老是哲人，大师通哲，应该是学问之道的实然与应然，他的哲学是在其科学实践中长出的哲学，是达到一定的学问高度后和哲学的自然会通。

二

钱钟韩出身在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5岁开始与堂兄钱钟书等一起接受私塾教育。后来成为文史一代宗师的钱钟书自小便聪颖过人，写文章往往一挥而就，相比之下，钱钟韩的口才和文才均略逊一筹，因而常受长辈的批评，他常觉得家里有一天才，日子真不好过。钱氏家族是名门望族，家庭里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气氛，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导：“读懂了前人的书，

并不就是学习的结果。还要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钱钟韩曾写出一篇自以为有新意的得意习作，却被斥为“这有什么稀奇，你写的观点梁启超早就说过了”，这件事在钱钟韩幼小的心灵里引起强烈的震动，不应去重复别人的思想和走过的道路，而应该努力追求特色和大胆创新。

9岁那年，钱钟韩直接插入“高等小学”。由于缺了四年初小教育，钱钟韩在小学里学得很狼狈，只能勉强应付学校功课。在急剧动荡的社会中，钱钟韩迎来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内战停课或游行罢课，使钱钟韩在家里闲着没事干而开始自学，自学后来逐渐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从初二起就攻读数学专著，特别对整数论问题（如费马定理、哥德巴赫猜想等）很有兴趣，自愿花时间去钻研，到了高中，差不多全部课程都靠自学。他认为，自学比听课的好处就在于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走马观花，亦可以赏花；看懂了可以提高学习的信心，看不懂亦可以摸到课程的难点，从而保持学习的主动性，改变无准备的听课和被动灌输的局面。高中二年级时，学校举行了一次国文、英文、数学三方面的全校竞赛，结果钱钟韩夺得数学第一名，国文、英文第二名，钱钟书夺得国文、英文第一名，钱氏兄弟的优异成绩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

中学毕业后，钱钟韩面临着人生道路的关键选择，按照家庭传统，当然是学文科。然而，他却立志学理工科，因为理工科强调实事求是，注重逻辑思维，比较适合他的口味。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工业的萌芽呼唤更多有为青年学习现代科学技术。1929年，十八岁的钱钟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学里，其自学能力更加成熟，并有意识地追求创新，他把老师当做竞赛的对手，当做赶超的对象，注意他

们的独特见解和治学经验。老师对他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独特风格十分惊讶，常把他的考卷展览出来供同学学习。1933年，钱钟韩以全校第一名和历年平均最优的成绩毕业，同年，考取江苏省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当研究生。

在英留学期间，钱钟韩以出色成绩完成了学业。为准备硕士论文，校方要他做一位教授已开始研究的项目。经过独立研究和实验，钱钟韩认为那位教授所用测量方法有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便提出要修改原先的测量方法并否定已发表的成果，指导教师却要求按原来方法继续做下去，积累数据。钱钟韩宁肯不要学位也不愿迎合权威的错误观点。当钱钟韩得悉中日即将爆发战争时，毅然决定立即回国，结束了游学西欧的生涯，也结束了他二十年的求学生涯。

三

钱钟韩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报国之志，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接受竺可桢的聘请，担任了浙江大学机械系教授。这与他的所学专业电机工程并不对口，抱着知难而进的态度，钱钟韩在机械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电厂设计”，仅凭一本教科书自学、备课、上课。两年后钱钟韩代理系主任，抗日战争条件艰苦，他作为系主任不仅自己要教课，还要设法把其他课程都组织人开出来。他从四面八方临时拉来老师，让他们教熟悉的课程，剩下来没有人教的课，则由自己来对付，又开出了“水轮机”、“汽轮机”、“锅炉”等课。在缺乏信息资料和科研条件的情况下，钱钟韩通过自学补足有关方面的基础知识，拓宽了自己的业务领域，为日后创建机电结合的动力工程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钱钟

韩教授来到中大任教，并于1948年10月始代理工学院院长，与全院师生一起投入反迁校和保卫学校财产的护校斗争中，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初期，面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禁运”，钱钟韩与锅炉专家范从振教授一起，开办汽轮机设计专修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专业设计人才，在极短的时间内试制成功了多种类型、数以万计的汽轮机叶片，满足了电厂修复汽轮机的需要，为反对封锁、恢复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52年，南京工学院成立，钱钟韩出任副院长兼教务长，主持全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53年，针对工业部门急需大量动力工程高级技术人才的状况，钱钟韩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深刻认识到热、电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竭力主张让动力工程学科的学生得到有关热工、电气以及检测仪表等综合的专业知识和联合运行、整体设计方面的训练。于是钱钟韩和他的同事们于1954年将机械工程系的热动力装置专业、电力工程系的发电厂配电网及联合输电系统专业、工业电气化专修科从原系分出，成立动力工程系，创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械、热工、电气相结合的动力工程学科体系。钱钟韩还与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教授共同筹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为中国开创工程热物理学、自动化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随着反右扩大化，钱钟韩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被停止行使副院长的职权。他沉浸到学问中去，对传统教材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思，提出了新颖独到的动力工程学的系统动力观，即应从动态运行和联合系统的观点来把握各项设备的运行特性，充分强调各项设备之间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进一步认识它们联合



198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钱钟书（右）、钱钟韩（中）、钱钟泰（左）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合影。

运行和整体设计的规律。由于钱钟韩和他的同事们不懈努力，南京工学院的热动力类专业声誉日著，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和技术人才，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科研成果，占领了国内热工态学、热工自动化领域的制高点，为我国能源动力工业的发展壮大，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有这一切，奠定了钱钟韩中国电厂热工自动化先驱者的地位。直到现在，东大的热能工程研究所还是我国能源研究方面一支国家学术梯队，并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鉴于钱钟韩突出的科学成就，1980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几乎与此同时，钱钟韩就任南京工学院院长、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主席。七十高龄的钱钟韩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中去。1980年创办自动化研究所，1981年被国务院聘为首届科学评议组成员兼自动控制学科评议组组长。

从1981年起，钱钟韩开始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钱钟韩通过长期科学实践体会到哲学研究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对教学科研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愈到晚年这种认识愈加深，愈加觉得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对

运用科学方法有更高的自觉性，必须促进哲学专业工作者和从事其他专业科学工作者携手合作，共同前进。

1983年以后，德高望重的钱钟韩出任了江苏省政协主席，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他恪尽职守，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很大成绩。他特别提出领导方法的问题，强调决策必须要做正反面的论证，既要有正面的论证，又要有反面的论证，并要形成制度。决策时必须包括一份少数意见（即不同意这个意见的论点），“兼听则明”，领导人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并保护一些爱讲不中听意见的人（事实上他们总是占少数）。这些意见直到今天，仍然显示出真理的光芒。

1985年，钱钟韩接受了美国南加州中华科学家工程学会的“特别奖”，是继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之后得到“特别奖”的第二位中国学者。“特别奖”荣誉证书上有一行字：“您在教学、科研和管理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大概是对钱钟韩科学生涯的一个最好概括。

四

在晚年，钱老特别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他曾经说过：“一般专家解决问题靠系统知识，而我靠的是方法上的突破。”“重要的不是求得一个具体答案，而在于解题的方法。”确实，注重方法论，崇尚辩证法是理解钱老技术思想，解析钱老人生轨迹的一把钥匙，而分析了解钱老独特的思维方式、分析他的科技哲学思想，无疑对后来者继承大师、超越大师有所裨益。

钱老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离不开其独特而曲折的科学道路。江南书香世家的家庭氛围以及私塾教育给他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功底。教

会学校的学习为年青的钱钟韩在“故纸堆”的氛围中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明的大门。在上海交大，工科教育培养了他重视工程结果而不盲目相信数学的治学理念，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或“可能成为一门学科的生长点”，构成了钱钟韩深入学习的起点，钱钟韩开始有意识地将基础知识经过精心选择，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和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学开始，钱钟韩脑子里常装着一些工程问题，提高了自己在吸取知识和捕捉信息方面的敏感性”，“世界上不论什么经典著作，仔细考虑考虑，里面的问题多得很”，这种独特的自学方法使钱钟韩以后开展科研时，比较容易找到突破口，也可避免与其他同行在科研选题上的低水平重复。伦敦大学帝国理工研究院以培养科学“通才”、“全才”而闻名于世，钱钟韩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机、热工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而且受到了开放型科学思想熏陶。在浙大、中大、南工及东大各个时期，钱钟韩都不囿于本专业学科的小天地，吸收不同养分，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

“博采众长，方法搬场与模化”是钱钟韩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机电结合”是钱钟韩的核心科学思想，这一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在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各种具体学科的整合，不同学科间研究方法的借用，可以看到对整体和过程的强调以及对过程的控制。钱钟韩的思维方式中有两个中心环节，一个是“方法搬场”，一个是“模化方法”。

“方法搬场”就是学科间知识与方法的类比移植。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及广博的知识面，能透彻地知晓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各种类型的联系，知晓科技知识本身具有

通用性，各学科之间蕴含有内在联系。当然，这不是要求直接把某一学科的结论照搬到另一学科中去，但是各门学科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通常具有兼容性，只要能透过各门学科的具体内容，看到学科本身的方法和思路，那么一门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就可以设法移到别的学科中去。钱钟韩就是用电工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锅炉和汽轮机的运动问题，并取得累累硕果。

“模化方法”是指科学家在构思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即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同时解决了性质上与此同类的有关问题。模化方法的熟练运用构成了钱钟韩思维方法的另一个特色。钱钟韩认为，从抓事物主要矛盾的哲学观点出发，通过一些简化的模型来研究一个复杂的实物系统的行为，是现代工程研究的重要方法。他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各种理想情况下的理论进行合理修正，提出新的概念，然后由此出发建立起实用的模型。

五

在中国一流科学技术精英的群体中，钱钟韩无疑是一位有着特殊经历、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科学大家。他在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得以启蒙，同时又深受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影响与激励，是那个书香门第、名门望族之中第一个学习科学技术的人；他留学英伦但未获任何学位，归国后却立即被当时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江大学聘为教授；从未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等职务，一直是“正教授”；年仅三十七岁，便就任中央大学工学院代理院长，以后历任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院长，东南大学名誉校长，一直是我国高等学府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

者。在他的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受挫”：1957年他受到错误批判，被迫离开副院长岗位；“文革”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尽折磨与凌辱。政治上的“失意”却造成了他学术上的“得意”，前者使他成为中国工程热物理、热工动力学和热工过程自动化等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后者使他成为中国自动化控制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两次被“打倒”、“靠边站”，两次在中国科学界崛起，两次开创新的学术方向。在科学生涯中，钱钟韩公开发表的个人学术专著和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不多，也没有领衔主持许多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更没有获得任何级别的科学奖励，但他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自动控制学科评议组组长，还担任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钱钟韩受到中国科学技术权威机构的首肯与推崇，得到许多科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们的尊敬与爱戴，成为中国技术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作为一位杰出的技术教育家，也许他“有形”的科学成果并不多，但在他指导帮助下取得的科学成就和发表的学术论著却多得难以统计，受他教诲熏陶和影响“恩泽”的科学工作者几乎遍及中华大地，远及海外。

2002年2月8日，91岁的钱钟韩院士去世了。去世前三天，他和医生说，要把所有增加营养和增强免疫力的药都停掉，“自己知道自已的情况，我最后一本书昨晚完成了，我不想再浪费国家的钱了。”

（本文写作获东南大学叶明教授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封志成 男，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

南京的教堂

III 贾梦玮

自明朝利玛窦到南京传教，特别是上世纪初开始，南京陆续出现了众多的教堂。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那些原因真是不愿多说了，中国，特别是做了十多次废都的南京有太多的兴亡沧桑），现在剩下的老教堂主要有三座：石鼓路天主教堂、基督教莫愁路堂和圣保罗堂。因为它们数量少，因为经历数次磨难而能保留下来，所以弥足珍贵。这三座教堂当然是公共教堂，一些大人物和外籍人员有他们的专属礼拜堂。比如蒋介石皈依基督后在他南京东郊的小红山官邸（现在被称为美龄宫）就专门辟有礼拜室，外国政要有时也和他一起到那里做礼拜，实质上是要有人间的大事商量，谈判。再比如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内也设有礼拜堂，大概是供信教员工做礼拜，一般不会对外开放。

石鼓路天主教堂

石鼓路天主教堂被称为“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今位于南京市白下区石鼓路112号，西邻螺蛳转弯，现在是天主教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是南京市区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天主教堂。它经历了二拆三建，如今站在它的面前，真让人有不胜今昔之感。

南京的天主教，始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

窦到南京传教，那是1600年前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其时虽然首都迁去北京多年，但南京仍是留都，传教士刚到南京时，他们真的是被这座城市的“秀丽和雄伟”镇住了，“它真正到处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了我们的欧洲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们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稠密的人



石鼓路天主教堂正面

口中包括各个阶层；有黎庶，有懂文化的贵族和官吏。后一类在人数上和尊贵上可以和北京的比美，但因皇帝不在这里驻跸，所以当地的官员仍被认为不能与京城相等。然而在整个中国及邻近的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利玛窦中国札记》）与从事其他事业一样，传教同样必须结交城中的权贵。比如魏国公徐弘基（明开国功臣徐达之后），利玛窦曾受邀去他府上做客，地点就在今天的瞻园。徐府某种程度上是南都的权力中心之一，碰到军国大计，各路权贵往往是先集中到徐府议事，所以利玛窦能受邀到徐府做客，实在是件特别荣耀也特别管用的事。利玛窦结识的重要人物还有南京的“地产”状元焦竑，虽然罢职后回故乡南京闲居，但仍享有较高的声誉，是实际上的风雅盟主。辞官做了和尚的李贽其时住在焦竑府上，自然也利玛窦认识了。

“离经叛道”的李贽对异质的天主教抱有好感，虽然对其教义不甚了了。当利玛窦回访他时，李贽按照中国文人的礼数赠送利玛窦折扇一把，上面题了诗一首《赠西人利西泰》，后收录于李贽《焚书》卷六：“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李贽甚至赞叹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太露聪明则太闷闷聩聩者，皆让（逊）之矣”（见《与友人书》，《续焚书》卷一；《答焦满园》，《焚书》卷二）。这么高的评价，出自李贽之口，可见利玛窦给李贽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在利玛窦结交的达官贵人中最有名的当属徐光启，因为他不仅是大明的高官、科学家，还是正式受洗的教徒。利玛窦和南京儒、佛、道三教人士有过多次数聚会和辩论，可见当时南京的文化氛围是较



石鼓路天主教堂内部

活跃和包容的。利玛窦后来因此能一直在中国传教，直到1610年5月11日逝世。他的墓现犹存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今北京市委党校内）。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适逢中意两国建交40周年和意大利中国文化年。为此，两国在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巡回展，纪念这位首次把近代西方科技与艺术成就介绍到中国的欧洲人，他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播下了数学、天文和地理知识的种子，为明代中国开启了一扇科学之窗；并虚心学习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利玛窦等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南京成为中国教区少数几个传教中心之一，并很快在正阳门西营崇礼街（今光华门）购下一中国官员的官邸，在主厅里建起了神坛。这是南京第一座固定的教堂，徐光启等就是在这里受洗为教徒。1610年起，具体负责南京教务的王丰肃神父在此小教堂附近，建造了一座正规的西洋式拱顶结构无梁大圣堂，定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大堂”，1615年落成。后来异址建起的石

鼓路天主教堂仍称为“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大堂”，名称始于此时，如果这样计算它的历史，至今近400年了。当初，堂内正祭台上的无染原罪始胎圣母像（油画），是利玛窦神父通过耶稣会远东分会从日本耶稣会借调来的一位工于丹青的辅理修士华侨倪雅谷为新堂所画。遗憾的是这座新圣堂落成不久，就引起南京诸多保守派官员的强烈不满，终于引发了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有名的1616年“丙辰南京教案”。《南宮署牒》中所载的沈淮《参远夷疏》第一疏中说：“臣初至南京，闻其聚有徒众，营有室庐……其类实繁，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明史沈淮传》中亦记载沈淮之言：“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1617年，圣母大堂被夷为平地。

“南京教案”的风波稍稍平息之后，在南京的神职人员决心在天主教的另一活动场所罗寺



石鼓路天主教堂的钟楼

转弯（今螺丝转弯，明代时为经过佛教寺庙罗寺墙角的小路，后来讹传为螺丝转弯）公所（即如今石鼓路天主教堂所在地）的宅基和其附近的土地上重建一座新的圣母大堂。1630年，新的圣母大堂终于落成；1659年起，升格为中国天主教北部代牧区的教务中心；1685年，成为首任国籍主教罗文藻的主教座堂。多位重要神职人员在这里做长期或短暂居留。如北京教区第一任主教、方济各会会士伊大任主教（Msgr. Bernar dinus della Chiesa, OFM. 1643-1721，意籍），在这儿作过14年长客；1706年11月至1707年3月下旬，康熙帝数次接见并赐宴的教宗克勒孟第十一的特使、后升为枢机的多罗主教（Carlo To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也在此生活了四个多月。这座圣母大堂经受了清政府的长期“教禁”和太平天国的大动荡，居然劫后余生，屹立216个寒暑不倒。反而是到了道光皇帝谕令解除“教禁”的1846年，因受教产纠纷影响，圣母大堂再遭厄运，在李鸿章的暗示下，被地方官员差人拆除，仅留下一间边房维持宗教活动。

1866年11月，经多方交涉，南京的教产问题终于有了结果，罗寺转弯老公所产权得到官方确认，教区又在公所附近买到一块比原先总面积扩大了一倍的土地，公所遂得以扩大。1867年，乘法舰“康克雷德”号到南京的雷通俊神父决定在罗寺转弯重建圣母大堂，这一任务最终由耶稣会辅理修士顾培原（Gausery Jean, S.J. 法籍）实施。堂区占地总面积共5004.1平方米，建筑面积计2642.6平方米，大堂本身面积为600平方米。所有建筑包括神父住院，皆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全部竣工。这座重建的圣母大堂的堂徽是“万福玛利亚”的拉丁文“Ave Maria”一词两个大写字母的艺术书写，现仍镌刻于大堂

基督教莫愁路堂

我第一次访问基督教莫愁路堂正赶上一个晴天，众多义工在堂内堂外尽心地打扫擦拭，蓝天下高耸的哥特式钟塔让我心地澄明。由于大堂周围的空间被占用，莫愁路教堂陷在周围混乱的建筑中间，显得新异而又清新。后来每次经过那里，我总是会留心看看它，看到它的身影，看到教堂对面老明德女中当年建起的房子还静静地在，看到如今的女生从哪里进进出出、叽叽喳喳，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我的心里就有了些许踏实感，每每有莫名的感动。

南京汉西门地区是西方传教士早期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这可能与利玛窦传教有关，明朝天主教罗寺转弯公所，以及它的基础上建立的石鼓路天主教堂就在这一地区。另外，天

正面。圣堂的体形模仿罗马乡村修会教堂式样建造，外观古朴简捷，内部系拱顶结构，无梁，采用四分顶形式和西方古代教堂拱顶结构及光纤色彩的传统手法。由于当年中国建筑技术和材料的限制，该堂的屋顶结构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屋架，下面用曲线的木构件和灰板条模仿罗马风的圆拱作为吊顶，外形几可乱真。从圣堂上空鸟瞰俯视，整个圣堂是一个平躺在地面上的十字。圣堂的弥撒间和更衣所上面是钟楼，钟楼上安置着一口铜钟，高 80 公分，钟口直径 70 公分，全重 400 公斤，钟声悠扬悦耳，是当年法国铸钟师的作品。主教大礼弥撒时所使用的“牧人”权杖，4 节，高 2 米；还有祭台上圣体降福时所用的“圣体发光”，系铜质镀金，和铜钟一样，也显示了法国人的精湛工艺。

寒来暑往，其间还经历了“北伐战争”、“八年沦陷”和“文革”十年动乱的多次破坏和多次修建，这座天主堂还是奇迹般保存了下来，至今已 151 年。教堂在北伐战争中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曾一度改作马厩。1928 年，国民政府拨款 15 万元维修，现在的教堂基本保存了重修后的风貌。门额上的楷字“天主堂”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书。抗战胜利后，这里是天主教中国国籍总主教堂，大主教为于斌，当年为“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授印的好像就是这位大主教，现在教堂里还保留着他使用过的教袍等圣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中止，教堂设施遭受破坏，被交电商场占用，所幸主体建筑保留下来。1980 年 12 月 25 日重新开放。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鼓路天主堂是南京唯一保留下来的罗马风格建筑，在全国也是少见的。罗马，在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似乎都是那么遥远，可又是如此之近。



基督教莫愁路堂正面

平天国失败后，这里的东王府等大面积的建筑被烧成废墟，有砌建新建筑物的空间，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同是位于这一区域的基督教莫愁路堂离石鼓路天主教堂很近，它的源头可追溯到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当年美国北美长老会的韦理夫妇来南京传播基督教；次年，该会的李满夫妇也来南京传教，南京从此有了基督教福音。1884年（清光绪十年），该会传教士在南京四杆子路建成“四根杆子礼拜堂”，据说当时可容纳100人做礼拜。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往往与办教育、医疗同时进行，因此北美长老会在建教堂的同一年建成教会学校明德女中（今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李满在明德女中东面建起一座正规的教堂，叫“耶稣会堂”，可容纳400人。这也是南京最



基督教莫愁路堂钟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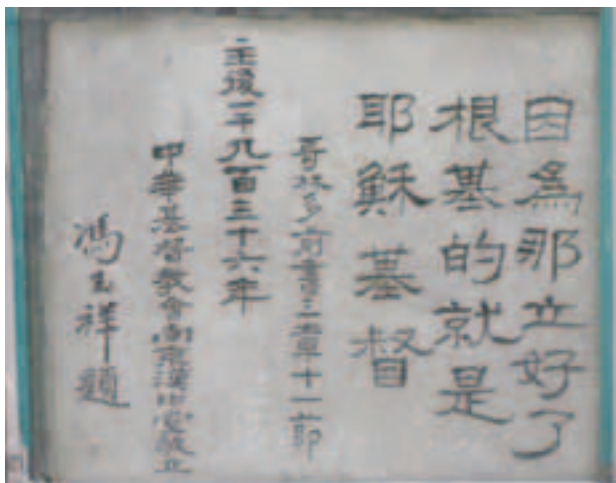


今南京幼儿师范学校内所存原明德女中明德楼

早的基督教教堂。清宣统二年（1910年），聘请山东长老会的孙希圣为该堂牧师，他也是中国首任华人牧师。

1927年（民国十六年），耶稣会堂改名为南京汉中堂。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四根杆子（路）拓宽成莫愁路，汉中堂被拆除。因此在旁边建两层楼布道所（这幢建筑也在1991年被拆除，原址建成南京市基督教大楼）。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鲍忠牧师筹款折合1100两黄金重建汉中堂，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746平方米，可容纳一千多人。汉中堂由金陵大学（该校也由美国北长老会联合其他教会创立）时任校长陈裕光之弟陈裕华长老设计，陈明记营造所建造。基督徒冯玉祥将军在房角石上题写了“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张之江将军题写了“汉中堂”匾额。汉中堂于1936年8月4日下午举行奠基典礼，1938年10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至1942年全部竣工。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汉中堂亦有难民收容所，掩护了不少难民免受日军杀害。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不少是因为躲进了西方人的教堂才存活下来。

1954年，汉中堂更名为莫愁路堂。“文革”



冯玉祥题字

期间，教堂关闭，房产被外单位侵占用。1980年底，恢复礼拜，教堂也按原样进行了修复。

莫愁路堂位于今南京市白下区莫愁路309号，坐东朝西，是一座典型的英国乡村式教堂建筑，总建筑面积为1800平方米。它的设计和构造整体和局部都较为用心，尤其是高耸的钟塔入口及侧窗的尖顶很是醒目。整个建筑的平面呈十字架形，砖木结构，穹隆顶，屋顶上覆以方形水泥平瓦，外墙用清砖，清水勾缝。正立面幕墙由哥特式尖券门和细长尖券窗组成整体饰面，并用白水泥浮雕和白色磨石构成一个大尖拱券，高17米，拱券顶部为星际和十字架组成的图案。殿内有八根人字形柱，木结构屋架由两侧向中央逐级出挑、升高，每级下面有一个圆弧形撑托和一个下垂的装饰物——这种结构方式称为“锤式屋架”，属于英国十六世纪英国都铎王朝的建筑风格。基督教莫愁路堂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市优秀民国建筑。

圣保罗教堂

保罗作为基督教的圣徒，世界上建有多所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堂，比如伦敦圣保罗教堂、

墨尔本圣保罗教堂。中国除了南京的圣保罗教堂外，青岛也建有圣保罗教堂。南京圣保罗堂所在的太平南路民国时期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如今虽然被后起的商业区抢了风头，也还是商家林立；但无论你是步行或是坐车，一般都不会错过圣保罗堂圣异的身影。

南京圣保罗堂是南京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教堂，原属于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副堂建于1912年，主堂建于1921年。

191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季盟济(G.M.B.Gill)牧师在南京马府街赁屋开始传道。1912年，在门帘桥大街购地26亩(今太平南路396号现址)，先建成一座礼拜堂，命名为圣保罗堂(即后来的副堂)。后来，为了建造大堂，季盟济又从美国一位圣公信徒那里征募到一笔捐款。这位信徒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为了纪念他的儿子，祈祷和平，他捐款到中国建立教堂。用这笔捐款建起的圣保罗大堂在圣保罗礼拜堂南边选址，1921动工，按欧洲乡村教堂形式设计，由金陵大学建筑工程师齐兆昌监造，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全部建筑费用包括设备12000美元，折当时币48000银元。1923年正式命名“圣保罗堂”，并举行了隆重的祝圣典礼。原来的礼拜堂改作牧区事务所，内设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和小礼拜堂。本世纪初，建于1912年的小礼拜堂被鉴定为“危房”，2003年拆除，虽然已在原址按原貌重建，但百年建筑被拆除，还是让人稍感遗憾。

历史上圣保罗堂的鼎盛时期是1930年代。由于同道的努力，圣保罗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基金也显著增加，教徒发展到千余人，还派遣堂牧出国深造。教堂附设有学校、诊疗所等。1937年，日寇侵占南京，该堂诊疗所、布道所、书报堂、主日学课屋及部分职员宿舍被焚毁，



大堂钟楼

所幸大堂主体未受破坏。该堂组织，抗战前有董事会，后因抗战解散，1940年1月又重新组织，每月举行董事会一次。1943年3月，该堂被日本宪兵队占领，宗教活动被迫迁到丰富路神召会房屋内进行。主日上午仍然举行圣餐及崇拜，下午借新姚家巷协进会布道所举行晚祈。牧师薪金仅靠自己在校外兼课收入维持，女传道则离职去沪谋生。由于日寇暴虐，有些牧师因传道被扣留，教徒见此大都不敢参加宗教活动。抗战胜利后，收回太平路和白下路两处教产，由傅、汤二位牧师清理堂址，重建大门，修葺房屋，种植花木，勉强恢复大堂主体旧貌。1945年9月16日举行洁净圣殿礼，主日崇拜等，恢复了一切事工。儿童崇拜、儿童主日学、

唱诗班、男女传道服务团，妇女聚会、青年团契、圣经班等均完全恢复。到解放初，教徒仍在二三百人之间。

圣保罗堂在抗战前，设有乡村分堂两所，一所在江宁县东流镇，一所在江宁县汤山镇。后来东流、汤山教堂被日寇彻底炸毁。

圣保罗堂本是南京基督教圣公会的礼拜堂，1958年南京教会合并，实行联合礼拜，保留圣保罗堂为南京四所主教堂之一，改称太平路堂。“文革”期间为工厂占用。1984年4月，大堂及部分房产归还南京三自爱国会，在尽量恢复和保留原来建筑外观和内部结构的条件下做了维修。1985年7月28日，重新正式开堂，圣保罗堂的钟声在沉寂二十年后被重新敲响。

如今的圣保罗堂主堂现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仍保持了当年的模样，外观属于较为地道的哥特式，内在结构用中国传统的构架取代了哥特式的尖券交叉拱。只是周边土地被其他单位、居民占用，原来的26亩，现只剩下4亩。

建造该堂的建筑材料为就地取材，墙体用南京旧城墙砖磨光砌筑，窗座、门扇、墙中部环箍、钟楼顶屋、城堡式的垛堞和封盖，以及内柱脚、拱座，为采自镇江高资山的白石切割打磨而成。堂内的读经台、讲座台、洗礼池、圣坛和栏杆柱等也都是用白石磨光砌制。墙上的环箍、拱座内侧石面上缮写了经文，并贴上金箔。高耸的钟塔内悬挂两米直径钟一口。当年钟声宏亮，远近可闻。

站在圣保罗高耸的钟塔之下，人显得如此弱小。如今教堂钟楼已完全被爬山虎四面裹起，

枝蔓粗壮，古意盎然。据教堂人员介绍，上面的那口大钟为德国造，这样的大钟南京还剩两口，另一大钟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礼拜堂内，前几年德国原制造厂还派人来看过。我特别想登上钟楼看看那口钟，但因钟塔内的楼梯损坏，未能如愿。接待我的牧师说，他的理想是在今圣保罗堂的旁边再造一座更为宏伟的圣保罗大堂，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制造，不受外国人的节制。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希望他的理想能够实现。

贾梦玮 男，《钟山》杂志社主编。



原样重建的副堂



佛光山一角

佛光禅行

III 范文丽

偶然的机缘，得以参加 2011 年“国际青年生命禅学营”促成的台湾佛光山七日之旅，第一次踏上这个遥想多年的美丽宝岛，也第一次亲身感知“人间佛教”。

下午一点多的航班从南京出发，经香港转机。带着一身晚霞登上高雄的飞机时，心中略感激动：即将抵达被誉为“南台佛都”的佛光山，会是怎样一番气象呢？

飞机误点，抵达高雄已是晚上十点多，不

大的机场里稍显空荡，过了安检门之后，马上就看到了佛光青年团的接机队伍，得知我们是来自南大的团队后，队伍爆发一声欢呼：“你们终于来啦！期待好久了！”工作人员都是佛光青年，不过二十上下的年纪，统一穿着禅学营的蓝色制服，脖子上系着红色薄围巾。应该是忙了不只一天了，脸上略有疲惫，但眉宇间笑容荡漾。后来知道，禅学营秉承以年轻人接待年轻人的理念，从各个小队的“小队辅”到大

会的主持人、同声传译人员，均为佛光青年团的成员。“接下来的七天，有任何需要，在路上随便拦下一个红色围巾就可以了，他们会为你解决任何问题！”

大包小包的行李被“红围巾”们提上了车，我们也在十一点左右到达了佛光山，在报到处，又一次领受了欢呼和掌声。在佛光山的七天，这种欢呼和掌声时时伴随，每走到一个新的地点，总会有人列队迎接，离开时则以莲花手势挥别。到宿舍时已近凌晨，十六人间的上下铺宿舍，住了大概十二人，提前到的都已经睡下。简单的洗漱之后，爬上床，倦意袭来，迅速进入梦乡。五点多钟，门外传来打板起床的声音，佛光山的七天之旅正式开始了。

人间佛光山

禅学营的活动一共七天，前四天在佛光山本山，后三天则是环岛参学，行程排得十分紧凑，自由活动的时间非常少，只有第一天上午有短暂的自由参访时间。所以，用过早餐之后，我便约了几位同行友人，提上相机，迫不及待地走出挂单的云居楼，在雾气氤氲中，四处观访起来。

佛光山始建于1967年，本是一片荒山，由排列形似莲花五瓣的五座小山组成。西边山上的大悲殿是佛光山的第一座建筑，是当时星云法师带领弟子胼手胝足搭建而成。如今五座山上均已建起各种殿堂、楼阁，东山上地藏殿、大佛城、大智殿、男众学部；西山上有宝桥、大悲殿、东方佛教学院、中国佛教学院女众学部；中间的山供信徒朝山礼佛，包括放生池、不二门、净土洞窟、宝藏馆、朝山会馆及大雄宝殿；西南边是峨嵋金顶，建有普贤殿、佛光精舍、

大慈育幼院；还有一座山是普门中学，为社会教育区。

佛光山在整体规划上，非常注意“人间”理念的落实：山中各处设有石桌石椅，可供信徒休憩，佛光茶则为烈日炎炎下的佛光山带来诸多清凉；新建的佛陀纪念馆前面广场两侧均有回廊相连，碰上阴雨天，访客可以从回廊直接走到纪念馆；多数建筑均有无障碍通行设施，方便广大众生亲近佛法。

走在佛光山上，可观大佛庄严，可闻鸟鸣啾啾，可感竹风清幽，可见信众虔心。虽然佛光山倡导“人间”佛教，山上美术馆、电视台、幼儿园、中学一应俱全，但是佛光本山出家众的生活仍然保持着很浓厚的丛林气息。我们组的带队法师刚刚从佛学院毕业，闲聊中得知，修学期间，为了保证有一个安静的修习环境，师父们很少允许上网，也不配备手机，生活尽量保持简朴。在佛光山的大小山路上，不时会碰见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法师们，远远地看过去，有恍若隔世之感。人间佛教可看做是佛教社会化的过程，佛教教化社会的同时，也会为社会所化。而后者，可能成就佛教，也可能伤害佛教。为了让寺中出家众有一个清静的修习环境，星云大师曾在1997年宣告封山，三年之后在社会要求之下才重开山门。我想，佛光山之所以能在“人间佛教”的环境中，继续保持源流清净，不迷失于人间，应归功于这种对传统的坚持、对佛教本身的坚持。

禅与生命

与安静和缓的法师们相比，我们参加禅学营的青年们，实在是给佛光山带来了诸多喧闹。今年是国际青年夏令营的第二年，150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员及佛光青年参与此次活动，开营之后，山上处处可见身着天蓝色或者粉红色制服的青年。禅学营的课程排得很紧，形式多样。佛教礼仪、禅宗渊源、佛光菜根谭等基础课程被安排在前两天，后面又陆续有“传播学对青年的成长意义”、“生命教育”、“人间佛教面面观”等专题讲座，课程中间穿插着寓教于乐的佛馆寻宝游戏和分组座谈时的禅坐体验。

生命禅学营主张以禅来关怀生命，这里的生命不仅指我们单独的个体，也指其他所有的众生，还包括众生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所以，禅学营的一个主旨是环保。佛光山在护生、保育自然、垃圾处理等方面都有许多的努力。禅学营期间，环保理念落实在每一个小细节之上：初到佛光山，我们每人领到一个小小的水杯，所有活动场所基本不再提供一次性的纸杯；佛殿中，供佛不再用点燃的香火，而改用花灯代替；吃饭的时候，吃不掉的先退掉，收下来的就要全部吃光，要用最后一片菜叶把碗里的汤汁擦干净然后吃掉；所有的垃圾回收处均有明确的分类，塑料、纸盒、垃圾分别收取，透明的大袋子里面几乎没有错放的垃圾；平时吃完饼干，法师会教我们把塑料包装纸叠成小方块再进行回收，因为这样可以节省空间……许多的细节，似乎有些琐碎，但是大家都在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所以佛光山上地面洁净，空气清新，有“人间净土”之气象。

除了孜孜于环境的保护外，佛光山还开设了美术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种学校、老人院等福利社会的机构，并且举办各种修道会，以造福人间。几天的行程中，对这些机构均有所接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兰阳仁爱之家是一所老人院，倡导“成功老化”，“有尊严地老去”，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佛光山正门

提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乐园。现代社会中，老人空巢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而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则将迎来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但是，当今社会对老人的关注太少，“赡养”老人的呼告多数只停留在物质方面，而忽视了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许多老人，子女不能环绕左右，又无法通过工作来实现意义，只能在回忆、等待和虚无感中度过。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提供了多好的物质条件，老人们的生活质量都是十分低下的。兰阳仁爱之家意识到这一点，除了生活上的照料外，很注重老人们的精神生活，举办各种活动、游戏，并且让老人在书法、绘画、刺绣、手工制作等创作性的活动中收获意义，感受生命新的春天。此外，仁爱之家还开办日托班，居住在附近的老人们在子女上班的时间里可以前来聚会或参加各类活动。这不仅给老人们提供了身心休闲的场所，也为家有老人的子女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老人们的生活质量体现着一个社会的修养和良心，而兰阳仁爱之家的模式则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都市佛教

禅学营后三天，一千余名学员沿东西海岸一共三条游览线，驱车从岛的南边游览至北边，



佛光山僧众

最后落脚于宜兰佛光大学。这三天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长途巴士上度过，从车窗往外看，可见农舍楼房，莲叶田田，槟榔店满地开花，空中则常常乌云低垂，一副山雨欲来的景象。吃饭和住宿都是在佛光山的各个分道场，也因此对闹市之中的佛教道场略有接触，第一次见识建在办公大楼上的寺庙。

台北道场坐落在台北松山火车站旁，位于闹市区的一栋十四层的高楼中，四楼之上均属佛光山使用，内设佛堂、禅堂、斋堂、会议厅、佛光缘美术馆，同时，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人间文教基金会、佛光大学筹备处、香海文化公司、如是我闻文化公司以及人间卫视电视台，都在这里设有办公室。道场的楼下就是车水马龙、叫卖声声。抵达之前，事先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纵向发展”的道场，但还是被周围的喧闹震了一下，同行友人感慨：“在这个地方修行，可真需要定力。”宜兰的兰阳别院采取的也是台北道场的形式，占据一整栋的十二层高楼。其前身是雷音寺，位于宜兰市的北门口，为星云大师早期弘法的道场，里面从佛堂到人间大学的教室，各类设施齐全。

佛陀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在佛光山的七天，我逐渐对其人间佛教实践有了一个模糊的感知，其音乐弘法的实践让人印

象尤为深刻。星云大师在台湾地区弘法之初，就成立了佛教歌咏队，将佛门音乐推广给大众，同时也创作了许多曼妙的歌曲，来接引青年的热情和信仰。在这次的禅学营活动中，除了星云大师作词的大会主题曲《和谐》时时响起之外，我们在许多时候可以看到佛光山弘法事业中的音乐流淌。佛光山现任主持心培法师的讲座“人生处世的智慧”全部通过歌曲的方式进行，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都述说着一个人生哲理，小小的人生哲理自有其高远的境界，而音乐则让这些略显艰深的诗词和道理面目温和，易于接受。佛光青年歌咏队的“人间音缘”演唱会则展示了其扎实的音乐功底和活泼的弘法形式，也让我们看到了佛光山音乐弘法的未来。走在各个道场中，不时可以听到各种佛光曲目，仿佛在诉说着佛光山的前世今生。

但是，相较于佛光山本山的清净幽雅，这身处闹市之中的道场，这处处响起的各种歌声，烟火味明显重了许多。在台北、宜兰两个道场乘电梯前往佛堂参拜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既赞叹于佛光人的智慧和灵巧，也深感人间佛教的发展有其艰难之处。

星云大师曾说，“欲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牛马”。在人间佛教的道路上，这位当年无处安身的年轻僧人跋涉了几十年，从不知所措的困境之中，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一步步崛起，终于到今天成就一代弘法基业的大师。他的经历，让人赞叹，也让人思索。何止佛教需要“人间化”？我们所有的事业，若不能以众生的福祉为导向，又岂能走得更高更远？

范文丽 女，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张充和在美国

III 王尧



张充和在美国家中接待作者

当我站在张充和先生身边，看她为一幅字落款盖章时，我有点时空恍惚的感觉。这位九十八岁老人曾经的种种传奇，落在宣纸上而成书画之美。张先生的书桌上，有几卷折叠好的字，其中一幅是完整的隶书《石门颂》，我爱不释手。先生见状，说这是我练字写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想要这幅字。先生便补了落款，盖章时说：“我盖的章都有些歪，盖得正的就不是我的。”在场的孔海立、章小东夫妇都笑说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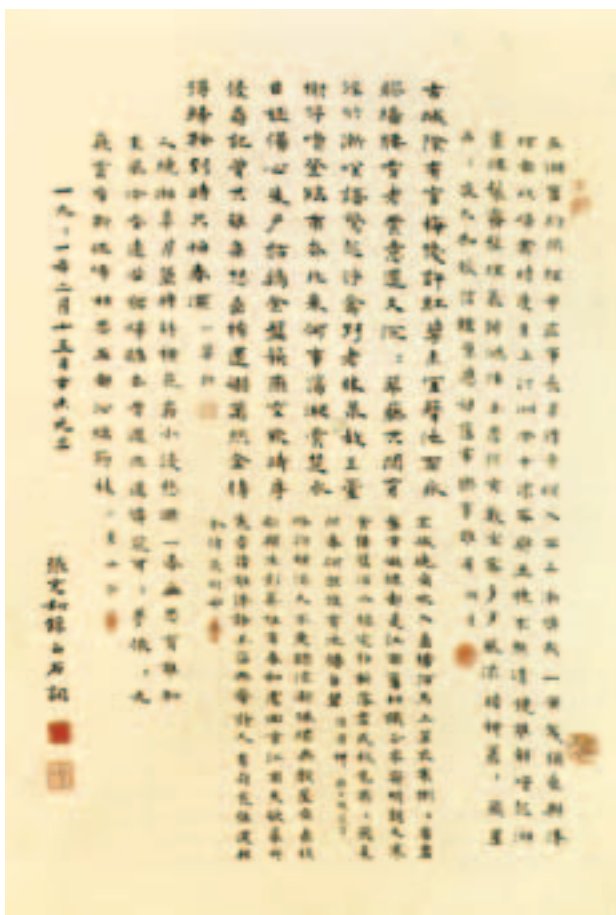
2009年初夏，孔海立教授讲学途经苏州，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他父辈那一代文人，耳熟能详的孔罗荪、巴金、靳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说到筹备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活动，我这才知道海立夫人章小东是靳以先生的女公子，因此便说到小东的“苏州姨妈”张充和先生，说到张家所在的苏州九如巷。张先生曾在北京、苏州两地举办过书画展，我错过了观赏的机会。在网上看过她的几幅字，觉得今人写不出来了。我问海立，能否求到张先生的字，海立说没有问题。我想请张先生写“三槐堂”，季进想请先生写“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海立爽快答应了，我和季进喜出望外。10月，海立夫妇回国，把这

两幅字带到了苏州。张先生很少写大字，这两幅字是做匾额用的，写小了不合适。这一年张先生97岁，两幅字古朴，力透纸背。小东说，写好这两幅字时，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正巧到张家，见了张先生的题字，赶紧拍了照，收在新近出版的《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中。

“合肥四姐妹”，是这些年来一个雅俗共赏的人物话题。三姐妹走了，张充和先生还在写字唱昆曲。有人说张先生是“民国最后一个才女”，此话大致不错。这些年我们常常用“最后一个”这样的措辞来形容人文学科大师的不再，这是一个压迫着我们无法喘息的问题。自然科学之外，人文学科的大师，少数像钱钟书先生这样贯通中西，多数都与“国学”有关。晚清以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缝隙越来越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转型，但那仍然是一个有文化传统做底子的时代，即使是那些“五四人”如胡适如鲁迅，其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新时代，仍然有旧传统，仍然有旧文人。但这样一个状况在四十年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了。只以学问论，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曾经听小说家叶兆言说，他父亲比较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学问，说三十年代的觉得二十年代的学问好，四十年代的觉得

三十年代的好，五十年代的觉得四十年代的好。这是个“等差级数”。但是，学问只是一项指标，学问之外，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地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退化了。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实际上我们的生长背景是如此残缺。张充和先生这一代或者前后一代，可以不做知识分子，但可以做文人。其中的佼佼者，既做知识分子也做文人，这自然是少数。做知识分子要骨气，做文人要底气。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张充和先生才因此成为“最后一个”。张先生的荣光，是在文化衰败的背景上发出的。诗书画和昆曲，在张充和先生那里不是技艺，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无疑，张充和先生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她传承了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和一种生存方式，至少再次提醒我们缺少什么。

当年张充和先生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点：张充和有专业“特长”，胡适先生等不拘一格。这次和张先生闲话时，她又说到这个故事。她到了北大以后，见到胡适，胡先生说，你的数学不好，要补补。她紧张地去了教务处，问如何补数学。教务处答曰：胡先生胡说。你已经考进来了，不需要补数学。她笑着对我说，如果补数学，她就不上大学了。张充和先生小时候受的旧式教育，做对子、写诗，没有学数学。此事，在今天也颇有意思。中国高考，也给有“特长”的考生加分，本意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许多考生，原本没有特长，为了高考，便去故意发展特长。当年张充和，并不是因为学不好数学才去发展“国文”这一“特



张充和手书《白石词》

长”的。现在高考的乱象之一，就是本末倒置。这些年报考艺术类的特别多，原因就在于艺术类的文化成绩可以减低。一大批没有艺术特长文化成绩也有缺陷的学生便去报考艺术类。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文化，如何艺术？

教育功利化了，“特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如此，“修养”这个关键词也就从教育的词典上消失。张充和先生到美国后，长期在大学讲授中国书法、昆曲。美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这类课程。大学课程设置，有专业和非专业门类之分，非专业的应该多为通识类课程，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依赖通识课程。而多年来，非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一直意识形态化或者工具化。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与此不无关系。我所在的学

校，曾经招收过一届昆曲本科专业学生，用社会资源办学，最终悲壮地结束。关于人文教育，我们一直缺少大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所以，一些教育理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汉字的魅力不必多说，如果不书写，我们能否体会和传承汉字之美？这也是今天教育的危机之一。且不说理工科教学，在有关规定和检查制度中，中文系的教学都竭力要求使用PPT，虽然有所方便，但工具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教育的价值。大学教学中，板书这个环节逐渐消失了，连中文系的师生都不再写字而是打字，而是使用PPT，汉字的命运会如何？如果有这么一天，只要会写字就是书法家，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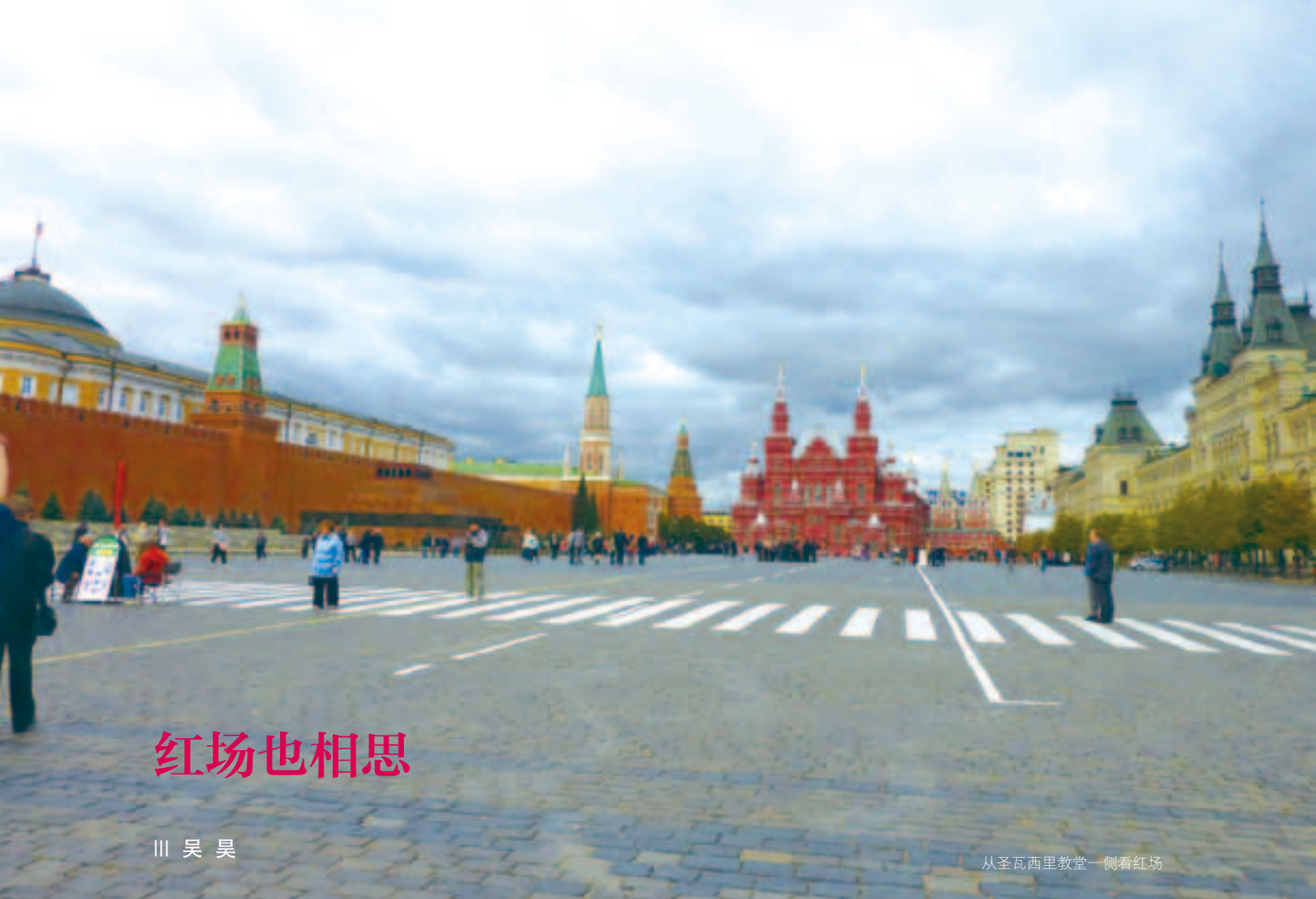
张充和先生的传奇故事，还与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她的故事中，有胡适之、张大千、沈尹默、章士钊、沈从文、卞之琳等师友。说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会令我们肃然起敬。沈从文先生是张充和先生的三姐夫，到美国访问时就住在张家的楼上。张先生说，沈从文在楼上写了许多字，便翻出一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的册子，告诉我这是沈先生的字。她又说到自己的书法老师沈尹默先生。我在海立、小东的美国寓所见到一幅沈尹默先生为靳以先生写的小楷长卷，觉得张先生的小字受她老师的影响。张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起两位沈先生的书法，她说很有趣，沈尹默先生写了一辈子的书法，但不练书法的沈从文先生的书法价格都赶上沈尹默先生了。我问两人的差别在哪里。她说她老师的书法当然好，但缺少变化，沈从文先生大胆、有生气。张充和先生住加州时，胡适先生常常到他们家读书写字。说到一些细节时，张先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张先生是一个有自己的文化圈的文人，一个有成就的人常常都是这样。他们那一代人，各自有自己的

文化圈子。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我觉得张充和先生至今仍然生活在她那个文化圈中。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是上海鲁迅博物馆主办的，小东也想请张充和先生为博物馆题字，先生说，我和鲁迅先生没有关系，就不写吧。张先生这句话让我沉思良久。

在谈到张充和先生时，大家有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婚恋。当年叶圣陶先生说，谁娶了张家的姐妹，都会幸福。想娶张充和的人大概不少，现在被说到的是诗人卞之琳先生的苦恋。但大家往往忽略其他。张充和先生的夫婿傅汉思先生是著名汉学家，我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详情，但肯定是幸福伴侣。傅汉思先生病危的几个月，搬到楼下住，张先生在楼下照顾了六个月，当年张先生已经九十好几，这就是“老伴”。楼下茶几上的一本书，夹了一张纸条，张先生翻开来给我看，是张先生和傅先生的合影。张先生说，汉思走了。神情落寞惆怅。

张充和先生说，在苏州时她常常骑自行车去天赐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930至1933年间，她从合肥回到苏州，再从苏州出发去北京。从九如巷出来，是五卅路南，左拐便是十梓街1号，那地方以前叫天赐庄，是东吴大学校园。我们问张先生是否想回苏州，再去天赐庄。她说想啊，心脏没有问题，但不知道能不能坐那么长时间飞机。她说她睡眠很好，但要分几个时间段休息，有时会在沙发上睡几个小时，醒来看书，再睡。她说她常常疑神疑鬼，晚上睡觉要开灯。过了一會兒，她又说“疑神疑鬼”。我们都笑了。我想，人到了这个境界，并不完全与现实有关。

王尧 男，苏州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



红场也相思

III 吴昊

从圣瓦西里教堂一侧看红场

第一次去莫斯科的人，总想到红场去看一看。是的，那里确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没有去红场就不算去过莫斯科，如同没有到天安门就不算到过北京一样。

红场形成于15世纪末期，初名“托尔格”，意为集市，之后还曾叫过“圣三一广场”和“烽火广场”的名字，直至1662年才被称为红场。不过此红非彼红，与颜色无关，在当时的古俄语中是“美丽的广场”的意思。到了现代俄语中，“红色”沿用了古词，而“美丽”则有了自己独立的与红同根的派生新词，也就产生了这样的偏差。不过它的这一中文译名却是歪打正着、神形兼备：不仅与其四周建筑物的主体色

调完全吻合，也与当年人们心目中的红色“麦加”名实相符。

红场的地面很独特，全部由条石铺成。信步红场，就有了一种丈量世纪交替的历史厚重感。关于红场的大小，有两组不同的数据：一为长330米，宽70米，面积有23100平方米；一是长690米，宽130米，近91000平方米。其实，两组数据都对，无非是测量者对红场界线的划分各有不同，后一组是各取所长，将红场四周的一些建筑和瓦西里斜坡等也算了进去。友善的中国游客一般比较认同后一种计法，并感叹这也只有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呀！

环红场皆名胜也。

红场的东侧是中央百货商场，即简称古姆的原国营百货商场。“古姆”就是国营、百货、商场这三个单词第一个字母连在一起的读音。如今的商场当然已经不是国营的了，不过其所有者将“国营”换成了同样是Г（格）打头的“中央”一词，这样既符合了实际情况，又留住了古姆这一传统品牌。这个建成于1893年，由俄国建筑大师波梅兰兹设计的商场更像一个宫殿，三纵三横、富丽堂皇。其营业面积达两万五千平方米，一个个精品店比肩接踵，有的出售琳琅满目的国际名牌商品，有的出售品种繁多的俄罗斯特色纪念品。其中最具当地风格的，笔者以为是一种大半个人高，形似“三八大盖”的“步枪”，弹药数量：三公升，杀伤力：四十度，型号：伏特加。在“三八大盖”已封箱入库的今天，唯独这种“三八步枪”在俄罗斯仍具有一定的杀伤力。这座极具欧洲古典风格的米黄色建筑与旁边色彩瑰丽的喀山圣母圣像小教堂和谐地组成了红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南侧是圣瓦西里教堂。相信你看到这座教堂时，一定会被它独特的建筑风格所吸引。教堂是为了纪念1552年伊万雷帝亲率15万大军攻克且吞并喀山汗国而建，于1561年6月29日（俄历）封顶。之所以又称为圣母帡幪教堂，是因为攻破喀山那天正好是东正教的圣母帡幪日。整个教堂由九座小教堂组成，中央教堂和它四周的八座小教堂各具特色，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仿佛把你带入了一个童话的世界，真不愧为石制的诗、立体的画。这一艺术杰作是由巴尔马和波斯特尼克设计的，并留下一段令人叹息的传说。相传在教堂建成之后，伊万雷帝大大赏赐了这两位设计师，并问他们是否能够建出更美丽的教堂？两人自然当仁不让，表示只要有充足的材料和时间就一定能够造出更



古姆



耶稣圣像塔楼

漂亮的教堂来。伊万雷帝听后，当场并未多说什么，只是让他们退下，但随即便命人将两位设计师的眼睛给挖掉了。原来，伊成雷帝是想让圣瓦西里教堂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教堂。教堂前还有一座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雕像，建于1818年，由马尔托斯完成，向我们讲述了1612年这两位俄罗斯民族英雄率领诺夫哥罗德的第二民军击退波兰侵略、解放莫斯科的一段历史。站着的平民米宁挥动着右手，双目凝视着坐着的波扎尔斯基公爵，好像在说，请带领我们赶走侵略者吧！雕像原安放在红场的中间地带，后因要给阅兵和游行让道，1930年时被移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马尔托斯是一位能工巧匠，在雕像下的浮雕上他把自己和两个儿子的形象

也刻了进去，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俄罗斯人民另一场反抗外国侵略军的战斗——1812年的反法战争。雕像斜前方还有一个宣谕台，过去曾是宣读历代沙皇诏书、宣判重犯及施刑的地方。苏里科夫一幅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的名作就是画的这个地方。包括圣瓦西里教堂在内的东正教的所有教堂最具特色的是其高高在上的穹顶。对这一代表性造型的形容，莫过于一个俗气得大不敬、形象得忘不了的比喻：“洋葱头”。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从物质到精神，这拔地而起、直指云天的“洋葱头”，早已融入了伏尔加文化的滔滔长河之中，成了一飞冲天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图腾。这种精神，不仅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的侵略者，还在列宾的油画上呼之欲出，在普希金的诗歌里浅吟低唱，在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中流泻奔涌，在乌兰诺娃的脚尖下飞舞灵动……

西侧与红场比邻的是克里姆林宫。克宫其实就是一座城堡，我们今天看到的克里姆林宫基本上是十五世纪中叶的建筑格局，占地27.5公顷，由二十个塔楼连接着总长2235米的红色围墙。这里既是东正教的圣地，又是世俗权力的中心。如今这儿被分为两部分，北半边的主人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南半边的主人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矗立在红场上的塔楼从南向北分别是耶稣圣像塔楼、枢密院塔楼和尼古拉塔楼。所有塔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红场上的耶稣圣像塔楼（“斯巴斯”塔楼），建于1491年，是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奥·索拉里的杰作。1625年，塔楼上安装了自鸣钟；现在塔楼上的自鸣钟是1851年装上去的，表盘直径有6.12米，每15分钟就会发出悦耳的钟声，似乎在提醒人们，历史从未停止过！1935年至1937年间，苏联领导人下令在耶稣圣像塔楼、尼古

拉等五个塔楼上各镶上了一颗红宝石制造的红五星。每到夜晚红星便闪闪发光，也似乎在指引俄罗斯人民前进的方向。枢密院塔楼的前面坐落着由休谢夫设计的列宁墓，于1930年竣工，用红色花岗岩和黑色长条石建成，庄严肃穆，仅一块墓前碑就有六十吨重，是红场上最重要的建筑之一。走进列宁墓，你会看到平躺在水晶棺中的列宁遗体，身上覆盖着苏联国旗，脸和手都由特制的灯光照着，清晰而安详。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列宁的遗体曾经离开过列宁墓。那是在二战时期，莫斯科一度有失守的危险，于是在1941年7月1日深夜列宁的遗体被运往秋明，直到1945年3月23日战争胜利前夕才运了回来。列宁墓是否迁出红场，曾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叶利钦执政时未能作出决定，普京上任总统之后，一锤定音：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有智慧来处理这



圣瓦西里教堂

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后代，也许到时自然而然意见就统一了。是的，在很多去留取舍的问题上，如果会出现争议，如果会造成种族之间或民族内部的矛盾或伤害时，保持现状无疑是最理智和最科学的态度。在列宁墓与克宫红墙之间，还塑有十二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墓碑，从左到右分别是苏斯洛夫、斯大林、加里宁、安德罗波夫、捷尔仁斯基、勃列日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契尔年科。每个墓碑都是一根柱子，柱子上刻有他们的头像。他们笔直地站立在那里，仿佛与安葬在红墙下的苏联英雄加加林一起守卫着他们身后的克里姆林宫……

北边是国家历史博物馆，红砖白顶，也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这里原本是莫斯科大学建的小校舍，1875年至1881年被休尔布特和塞米诺夫修建的红砖建筑物所取代，并成为历史



朱可夫元帅雕像

博物馆。馆里展品和档案丰富多样，有各种古币、文物、武器、服饰、农具、家什，还有历史地图、民俗绘画，向人们展示了从石器时代到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的全部历史。在博物馆的北边，是1995年竖立的二战期间苏军最优秀将领之一的朱可夫元帅塑像。正是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指挥了列宁格勒战役、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等重大战役，为打败法西斯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站在红场中间，环顾四周，你不难发现俄罗斯历史的足迹：十五世纪的克宫红墙和三大塔楼、十六世纪的宣谕台和圣瓦西里教堂、十九世纪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雕像和历史博物馆、二十世纪的列宁墓。是的，红场就是俄罗斯历史的见证人。在这里，蒙古可汗的骑兵曾跃马扬鞭、弯弓射箭，开始了对俄罗斯各公国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在这里，德米特里大公曾指点江山，大败20万蒙古军队，获得了“顿河王”的美称；在这里，伊万雷帝曾站在塔楼上窥视过广场上贵族和民众的一举一动，稍有风吹草动，便剑拔弩张，大肆杀戮；在这里，波兰入侵者曾安营扎寨、蓄势待发，让波兰王子瓦迪斯瓦夫当上了俄国的沙皇；也是在这里，农民起义首领拉辛曾英勇就义，彼得大帝曾亲自监督处决叛军首领，拿破仑曾横刀立马；还是在这里，革命军从尼古拉塔楼攻入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宣告了苏联的成立，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并领导了苏联人民取得二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里，克宫上飘扬的镰刀和铁锤被换成了白蓝红的三色旗，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相继上下红场的观礼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检阅了军队……

驻足红场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与我们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历史不算悠久，当公元862



夜色中的红场

年它的第一个朝代——留里克王朝在诺夫哥罗德刚创立的时候，我国已经进入了大唐盛世。1462年，伊万三世建立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当时领土只有43万平方公里，然而到了1533年，仅经过伊万三世和其子瓦西里三世两代人的打拼，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就迅速扩张到280万平方公里，一跃而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在其后的380年中，俄国总是不停地受到侵略和不停地向外扩张，并经历了从留里克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和从莫斯科公国到沙皇俄国再到俄罗斯帝国的转变。到1914年俄罗斯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领土总面积已达2280万平方公里，占据了半个欧洲和三分之一的亚洲。接下来，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赢得了二战的胜利，成为超级大国。再接下来，苏联解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俄罗斯联邦……

今天的俄罗斯，在经过休克疗法、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的阵痛之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充满自信、发展良好、潜能巨大的区域性强国。我们可以预计，即使俄罗斯政坛因其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而变得有些沸沸扬扬，但只要不突发意外，现任总理的普京将于明年当选并出任总统，而且会在这一职务上一直工作到2024年。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其政治的可预测性对国家的发展要明显优于不可预测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时普京应该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斯托雷平的遗愿，把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让自己国民自豪、让世界各国尊重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驻足红场难免会发出苏联不知何处去，红场依旧笑春风的感慨！这一切，又怎能不令人相思般地思之想之？！

吴昊 男，俄罗斯五洲世纪集团公司总裁，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出版文集《外面的世界》等。

埃菲尔铁塔与匈奴王

III 申赋渔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对埃菲尔铁塔这样用钢铁架起来的東西，我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它却是巴黎的象征。

刚下飞机，进入戴高乐机场，满墙的宣传画上，都是这大而无当的东西。到巴黎的第一天，本想避开这个铁塔的，可还是没能绕过去。你根本没办法避开它。

经过铁塔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停留，而是急速地穿过它，直奔后面的战神广场。铁塔底下人山人海，四条脚下，肤色各异的游

客，排着四条蜿蜒如长蛇的队伍，等待上塔。他们都是为了这塔的名声而来，颇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登铁塔枉来法”的意思。

丑是有侵略性的。当丑以一种高大的形式，让你日日仰望时，你就会被他打败，被它征服，并为它赞叹。埃菲尔铁塔就是这么一个建筑。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只要你到了巴黎，就不可能逃离它的阴影。无论你在巴黎的哪一处街头，只要视野略微开阔，你抬起头来，就会看到它那直插苍穹的铁的尖顶。这样的丑甚至有着强烈的传染性。今天，跟

它大同小异的丑陋的塔，已遍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东京，在上海，还在我所居住的南京，都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叫做电视塔。然而，这样的东西，放在这些城市，并没有太多地显出它的丑来。因为它下面的城市建筑，也是一样的单调、丑陋，那些有着传统美感的建筑，已经完全被淹没了。既然城市的建筑就是这般无从说起，你就不会为了一个电视塔而有更多的不快。

可是如果你走进巴黎这个城市，你就会为她遗憾了。因为埃菲尔铁塔，真的大煞风景。这个怪物在刚刚竖立的时候，莫泊桑就厌恶地说道，巴黎最好的去处是在这铁塔的二楼，这是唯一看不到这东西的地方。

然而铁塔这个地方，倒真跟巴黎有深厚的渊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公元前52年，巴黎人在康慕洛勒纳斯的指挥下，在今天埃菲尔铁塔下的塞纳河畔，跟恺撒的罗马军队，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巴黎人被恺撒的副手拉频弩斯彻底打败。巴黎被置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但巴黎也从此由西岱岛上的一个小渔村，走进了历史的大视野。

恺撒征服高卢的这一年，是中国汉宣帝甘露二年。这一年，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请求归顺称臣。继续对抗汉朝的北匈奴王郅支单于，远逃西域，后来被汉将陈汤斩杀在万里之外，并留下一句充满霸气，并流传至今的严肃告诫：“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公元前53年，对法国来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被希腊人称为凯尔特人，被罗马人称为高卢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在这里创造了十分辉煌的文明。但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文明竟淹没在了历史的洪荒当中。但从此之

后，他们将不再被淹没。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年也是时运的转折点。如果从公元前200年，汉朝第一个皇帝，高祖刘邦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这一奇耻大辱算起，他们已经与匈奴人厮杀了150年。现在，匈奴人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们向汉朝拱手称臣。对于这个转折点，汉朝皇帝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确保匈奴人驯服而不生异心，他甚至把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女王昭君，嫁与匈奴王为妻。

在此之后，匈奴人不再成为汉朝的威胁，要么投降，要么西逃。西逃的匈奴人，从伊犁河跑到锡尔河，从顿河走到多瑙河，最后，又来到塞纳河。他们终于成了罗马人的威胁。

公元451年，匈奴王阿提拉带着40万大军，锋芒直指巴黎。巴黎一个名叫热纳维耶芙的15岁修女站了出来，她告诉惊惶失措的巴黎人，你们如果向上帝祈求保佑，并留在城里，阿提拉就不会来。

阿提拉没有来。人民欢呼雀跃。教会把这个小姑娘封为圣徒。后来的人们，把热纳维耶芙尊为巴黎的保护神，并为她修建了著名的圣热纳维耶芙修道院。它就是今天的巴黎“先贤祠”。

先贤祠已不再是修道院。法国政府在1791年把它改为专门存放“自由法国时代伟人遗骸”的场所。自从1885年雨果的灵柩停放在此之后，它就已经不带宗教色彩。然而，我们依然能在四壁的巨幅油画上，看到热纳维耶芙的一生。我站在《阿提拉的进军》壁画前，长久地沉默。我仿佛穿过了时光的隧道，回到了历史现场。谁会想到，就是这个阿提拉，他联系着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法国，虽然是用一种比较蛮横的方式。

绕道而去的匈奴人，在马恩河畔的沙隆，与罗马军队展开生死决战。

我从巴黎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经过了沙隆。沙隆是一座小城，凸现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小城的边上，流着静静的马恩河。河的两岸立着许多高大的白杨树，在风中，树叶被吹得猎猎作响。树影婆娑之中，隐约看到一个突然隆起的小山包。这便是当地人所谓的“阿提拉营地”了。如果在它的周围细细查看，依然还能看到1500多年前激战后的遗迹。

公元451年的9月20日，仅仅一天时间，双方就在此战死了十五万人。匈奴人战败了。然而第二年，他们又卷土重来，并且兵临罗马城下。匈奴人的攻击，给西罗马帝国带来致命的伤害。气息奄奄的西罗马，在苟延残喘了二十年之后，訇然倒下。

西罗马灭亡了，高卢解开了身上的束缚。现在，我们可以把这里叫做法国了。因为法兰克人来了。高卢的名字，从此要改作“法兰西”了。

我之所以选择公元前52年这一个时间节点，是因为这个节点连接了法国与中国。匈奴人由此逐渐西迁，直至到达巴黎附近。罗马人由此将高卢变成它的一个行省。最后，西迁的匈奴人，经过500年的长途跋涉，又在巴黎附近的沙隆，重创罗马军队，直接造成了数十年之后法兰西的诞生。

历史如同一根绵长而复杂的链条，它环环相扣。历史又像一个相依为命的大家庭，他们呼吸相连。在匈奴人大战罗马之时，法兰克人的首领墨洛维曾加入联军为罗马人奋战。数十年之后，他的孙子克洛维，又从罗马人手里夺过高卢，并成为法国第一任国王。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是“上帝之鞭”阿提拉催生了法兰西。

强大的匈奴慢慢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一个叫法兰克的国家开始崛起。

当法兰克的首领克洛维占领巴黎的时候，那个祈祷阿提拉不来攻打巴黎城的修女热纳维



塞纳河

耶芙还健在。不过这一次，她没能阻止法兰克人。而巴黎的命运也由此改变。克洛维进入巴黎之后，立即看上了这个城市。他在巴黎修建了法国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作为自己与妻子日后的灵寝。克洛维在511年去世，第二年，热纳维耶芙去世。人们把他们葬在同一个教堂——今天的先贤祠。在这里，至今还能看到克洛维的陵墓和热纳维耶芙的圣骨。

让我们还是回到埃菲尔铁塔的底下。现在，我已经穿过铁塔。我没有去排队。我对登塔远眺没有兴趣。我已经走到铁塔后面的一块宽阔的空地。公元前52年，罗马人与巴黎人的战斗，一直从塞纳河边漫延到这里。面对强大的罗马人，巴黎人一个个倒下，可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年迈的康慕洛勒纳斯带领他的战士，全部战死。

空地现在叫做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我本以为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战死此地的高卢英雄康慕洛勒纳斯，然而精通法语的朋友告诉我，MARS是指罗马人的战神。不可能用这个名称来纪念高卢英雄，当然，也不是纪念那个打败了巴黎人的罗马将军拉频弩斯。他曾是恺撒最为得力和倚重的副将，然而他还是背叛了恺撒，站到了恺撒在罗马的对手庞培的那一边。对于罗马人与高卢人，他都不重要。

或许它只是一个名字。它曾是军事学院学员们的操场。也许是为了鼓舞学员们的斗志，取了这个响亮的名字。

然而，丑陋的埃菲尔铁塔却是一个不能抹去的纪念。它纪念的不只是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而是一个时代。1889年的法国已成为欧洲的灵魂，也是世界的霸主。

埃菲尔铁塔用了250万个铆钉，7300吨钢铁，所有零件都是在工厂做好，然后现场组装，组装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



先贤祠门头上的雕塑

中国人尤其是要为之惊叹的——就在埃菲尔铁塔的旁边，中国馆里展示的铁器还是犁头、镰刀、斧头和剪子。

不过，今天的埃菲尔铁塔所象征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属于它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法国，我去了阿尔萨斯、勃艮第、普罗旺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所有这些地方，都宁静美好，然而却缺少蓬勃的激情。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代表着逝去荣光的埃菲尔铁塔，也许正代表着法国。它高高地耸立在古典优雅的巴黎，它用一种独特的姿态，宣示着自己的存在。它不肯湮没在历史当中，又难以挑战未来。

法国人，把他们的历史保存得很好，让我轻易地就能穿梭其中。我的思绪不断地在他们的历史与现实当中闪回。而在每一个闪回里，我都会想起中国。我会相互参照，并在心里得出一个意见。而这个意见，又总带有一个中国人的偏见。这是不自觉的。

可是，谁没有偏见呢？

申赋渔 男，专栏作家，南京日报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孙犁编辑奖，中国报纸副刊金、银、铜奖等。著有《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阴——中国人的节气》等。

矗立在美丽金鸡湖畔的东方之门

III 乾宁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一座建筑，能够代言一座城市的形象、理想与荣耀，让城市为之骄傲，世界为之聚焦。东方之门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标，承载着苏州城古老的文明与未来的辉煌。

东方之门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座落于苏州工业园区，西近姑苏老城区，东临金鸡湖，雄伟特立，地位无匹。作为一座门型多功能的超



级城市综合体，其单体建筑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总高度 301.8 米，共 88 层，门洞高 246 米，跨度 68 米，为世界最大的门形建筑，也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超高层建筑之一，将整个姑苏城尽收眼底。竣工后，将拥有“世界第一门”、“中国第一大高楼”、“中国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建筑”、“中国单位用钢量最大的建筑”以及“中国最高的苏式园林”、“中国最深的私家酒窖”、“中国最高的过街天河”、“中国最高无边际泳池”八大之最，成为千年古城苏州全新的世界级地标。

东方之门与长三角关系紧密，尽得中国经济发动机之地利。苏州轻轨一号线、六号线将与东方之门地下商场无缝连接，直达全城。沪宁高速、苏嘉杭高速、机场快速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环绕，直达上海、杭州、南京，迅捷于长三角各地。

东方之门是拥有着凌驾于城市之巅的圈层生活。大型名品购物中心、中外美食之都、奢华康莱德酒店、顶级豪装府第东方华府和东方公馆、5A 甲级写字楼、旅游观光、会议中心、娱乐中心、博物馆与中国文化街，十大业态，交相辉映，互融共生，构就一代盛世的繁荣。

东方之门有一支优秀的团队。作为核心人

物——董事长杨休，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古文物鉴定家、收藏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到的艺术视角描绘了东方之门宏伟蓝图。在他的指挥棒下，汇集了英国 RMJM 建筑设计集团、高力国际、康莱德酒店、世邦魏理仕等全球十二大顶尖团队，共同奏响东方之门这一华丽乐章。

“没有信仰的建筑是苍白的”。东方之门从

古城著名的水陆城门的形式中获得灵感，以灰色作为整个建筑的基调，与古典园林的黛瓦白墙相呼应，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并透过三条优美的抛物线生动地表现出吴文化刚柔相济的地方性格，体现了对苏州古城深刻的理解与洞悉。

姑苏城三千年的文化沉淀将在这里得到传承与发扬！

征稿启事

《雅集》是由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主办，面向海内外发行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刊物。本刊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认同为宗旨，以近百年为时期、江苏地域为特色，兼具文化性、统战性和可读性。本刊主要栏目有特稿、历史遗韵、江苏城记、文苑菁华、历史剪影、艺术人生、艺术立场、文化论坛、传统文化、人物春秋、此岸彼岸等。

本刊长期向广大读者、作者征稿，内容主要包括：

- 一、有关江苏的文化名人、历史文化事件的文章；
- 二、有关展现江苏文化底蕴和文化建设成果的文章；
- 三、有关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或感悟性文章；
- 四、江苏籍作者写的有关港澳台及海外的人、事、物、论等方面的文章。

【投稿须知】

- 1、来稿确保原创首投，如因版权问题带来的一切责任由投稿人自负。
- 2、稿件尽可能采用 Word 格式。每篇稿件后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个人简介、详细通信地址及邮编、电子邮箱及手机等联系方式，以便奉寄稿酬，及时沟通。
- 3、编辑有对来稿作必要的编辑、修改的权利。
- 4、文稿字数要求 2500 字至 6000 字，尽量提供高质量图片（jpg 或 tif 格式，A4 大小，300dpi），力求图文并茂。

【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yajijs@163.com

联系人：吉编辑 电话：025-84287248

《雅集》编辑部

生正逢时

——关于《雅集》之二

III 周和平



一

《雅集》创刊发行，遇上了好的机缘。

《雅集》甫出，正逢第七次全国中华文化学院工作会议暨“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论坛在我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饱学之士，汇聚金陵，会场内外，众议成林、高论迭出。《雅集》乘此良机出炉，适逢其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同志以其特有的政论家的激情，在大会上对《雅集》给予热情鼓励，称之为“秀丽之美与阳刚之气的结合，是可以看、值得存的好刊物”。小文口才文才了得，佳作连连，对《雅集》热情鼓励，让我们深受鼓舞。

《雅集》遇上的最大时运，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全会以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和行动，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

对江苏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规划。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罗志军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文化人才队伍强的文化强省，更好地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笔者聆听报告，顿时增添几分责任感，思考如何运用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的优势，为江苏文化强省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办好《雅集》，是当时最直接的一个念头。

二

《雅集》引起了不少关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热情鼓励。这里摘抄几则短信：

“《雅集》收到，有品位。”

“杂志如明月清风，让人感到心朗气清。”

“《雅集》是一本好期刊，很期待下一期。”

“《雅集》已通阅，设计精美，选文恰当，

图文搭配相宜。”

“《雅集》很雅，放在床头，随时翻阅。”

“《雅集》，真是集雅文雅事雅人于一体，从内容到形式都透着风雅和雅致。”

也有诚恳的批评和建议：

“个别文章冗长，或有旧作之感。”

“虽格调不错，思路还可宽泛些。”

“精美之下，还要有思想，方可走远走高。”

“《雅集》偶见错讹，虽瑕不掩瑜，但稍稍用心，便可避免。”

“定位应以近百年为期，百年江苏，百年文化，百年学人……”

对我们来说，精当的批评和真诚的鼓励同样重要。想到郑板桥的两句诗，“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此之谓也。

三

《雅集》随着我们进入高堂，亦步入民间。

我们把刊物送到了高淳县桤溪村，大学生村官、镇村干部、乡村医生、老师拿到刊物，欢喜不已，不忍释手。

我们把刊物送到泗洪县雪枫学校的老师手里，老师们说，这是他们教师节收到的最好礼物。

我们还把刊物送给了参加我院组织的“两岸三地中学生走进南京”、“情系中国心”活动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同样珍视。

最让我们欣喜的是《雅集》送给了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是当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七十多载潜心于学术、艺术研究，

在传统经史研究和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明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贡献，精通诗、书、画、乐，尽得中国文化之精髓，取得举世无双的成就。温家宝总理盛赞饶先生学贯中西、学艺双馨；季羨林先生曾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饶先生同我院是有缘的，他为我院题写的“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院名，与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院名合成双璧，恐再无二。加上在《雅集》创刊号上，刊登了吴为山君写饶先生的文章，因此，我们期望饶先生能看到我们的刊物。10月19日，我们拜托的香港林健忠先生，在参加“饶宗颐星”命名仪式时，将《雅集》送给了饶先生，同时送上了我们的问候。这也遂了我们的一个心愿。

四

《雅集》装帧设计，颇获好评。

设计者朱赢椿先生，先前并不知其大名，但其设计的《不裁》一书获德国莱比锡书展“世界最美的书”，是早就听说的。直到这次《雅集》合作以后，才知道他在业内享有大名。朱先生有他的设计理念，他说“更愿意做带有东方特质的，带有浓浓禅意的，温文尔雅的书。”

《雅集》封面设计初稿出来，便觉得淡雅素净，颇具神韵。但对封面图案并无定论。

此时，便登门请教著名画家宋玉麟先生。宋先生是科班设计出身——“文革”前的上

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其识见高迈，眼力不凡，一见封面清样，脱口而出：就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图案。

于是，封面成了现在的样子。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玉麟先生是学舞美专业的，现在则成了国画大家；朱赢椿先生是学国画的，现在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大成。

这类例子在艺术史上屡见不鲜，只是机缘巧合，我们碰上了。

五

《竹林七贤》砖刻图，是1960年4月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中出土的。这在中国的艺术史和史学界是颇有影响的一件事，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南朝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产生了顾恺之等影响深远的大画家，“传神阿堵”、“点睛之笔”都是产生于当时的典故。但可惜六朝的画作并没留下，现在看到的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卷》等都系后世摹本。而《竹林七贤》砖刻图的出现，提供了当时的实物例证。

《雅集》出来以后，人们问得最多的便是，“竹林七贤”怎么有八个人，还有一人是谁呢？

除“竹林七贤”外，另外一人为荣启期，这幅砖刻图也有称之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高士”，他是所谓“知足者”的代表，亦是“七贤”们的人生楷模。将这样一位旷达之士与“七贤”画

在一起，似乎并不难理解。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竹林七贤”，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鲁迅先生说“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余秋雨先生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见《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易中天先生则称他们所代表的魏晋风度的价值取向是“向往自由，渴望真情，漠视世俗，服从内心，热爱自然”（见《中国智慧》）。

“竹林七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

六

本刊物，带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变化和惊喜。

其中，我们最感欣慰的是两件事：

其一，创刊以后，本刊来稿源源不断，此乃保证质量之根本。

其二，在省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本刊经费得到初步落实。

这些，也正应了题目：生正逢时。

周和平 男，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本刊编委会主任。